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一〇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論文

平路小說中的性別與空間

——以《東方之東》《婆娑之島》為中心



指導教授：陳芳明 教授

研究生：林逸潔 撰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致謝辭

感謝平路老師用生命創作，以筆下的文字展示她呼吸的溫度，講起話來總是舒緩的她，卻在作品中展現了強韌的信念。

感謝陳芳明老師一路寬厚以待，數度在關鍵時刻為這份論文調整方向；感謝口考委員郝譽翔老師與王鈺婷老師，精準指出篇章斷裂不足之處；感謝崔師與翠雲師當年督促我重返校園，沒有妳們的關愛，這場旅程不會開啟；感謝感謝碩班同學一路陪伴，在家庭工作學業三頭奔忙的我，迷糊又怠懶，若非你們體貼關懷，這趟旅程難以完全；感謝敬清學長在討論過程裡清晰的邏輯與創意的思考，感謝芷瑜學妹在口考現場的溫柔相伴。

感謝同事們提供學術上的建議，從相關書籍推介到英文翻譯，點點滴滴，我銘記在心；感謝年輕的學生從不吝於為我平凡的研究生生涯喝采，你們為大考奮鬥的樣貌，莫名激勵著中年讀書的我。

感謝朋友們，幫忙查資料借錄音筆討論格式小眉角，縱容我以討論研究主題為理由跑台南找美食喝咖啡，沒有你們，我的生命是乾枯的。

感謝親愛的爸媽與公婆，用最大的愛包容我的怪想法，寬容我將理應陪伴你們的時間，挪用至你們陌生的領域；感謝最理解我的妹妹，你總能熨貼我莫名的焦躁；感謝女兒們慎重對待家裡四處堆放的資料，以及總是皺著眉頭對著螢幕的母親，真誠地為我每日回報的論文字數擔憂與歡喜。

感謝Y在生活與精神上的支持，雖然你總說自己不懂文學，但你讓我的生命像一首美麗的詩。

論文淺薄不足一觀，然厚載眾人的期望、鼓勵，使其也有了重量。

摘要

平路小說創作多元，不管在議題與手法上皆勇於挑戰，然而，細讀其小說創作，會發現某些信念與母題重複出現，其中有一條重要的主軸是扣合著對台灣的關懷，此外，以新歷史主義的精神創作，迂迴對抗原本由官方掌握的歷史，亦是平路拿手的藝術手法。

本論文以平路小說創作脈絡為基礎，以《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兩本長篇小說作為討論中心，將其並置對讀。兩書創作時間相近，雖各自獨立，但創作手法隱然相似，內容亦有可相互闡發補充的特殊性。本論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研究方法，並回顧相關研究成果。第二章，提出兩書中「以多元斷裂的敘事對抗單一線性敘事」、「在歷史的縫隙中想像」、「以邊緣解構中心」的寫作手法，確認其新歷史主義的寫作精神；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空間」與「性別」的論述。在第三章、第四章分別梳理文本中出現的「空間意涵」與「性別政治」，以「地理空間」與「概念性空間」兩大塊面討論書中出現的多重空間，及其背後豐富的意涵；以「角色隱喻」、「書寫與對話」，及「人物之間的隱形關聯」三個面向梳理人物之間的關係，且透過性別、種族等設定，討論國家的認同與衝突。第五章結論，整理《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在藝術手法與主題思想，說明兩書既有高度相似性，也有其開創性。

關鍵詞：平路、空間、性別、新歷史主義

Abstract

Having written a diversity of novels, Ping Lu is daring to take challenges, be it in issues or in writing strategies. However, if we closely read her novels, we would find some beliefs and themes recurring, especially a deep concern for Taiwan as a main line. In addition, writing with the spirit of New Historicism in order to confront the official history, which used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authorities, is also an artistic strategy Ping Lu is good at.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thread of thoughts in Ping Lu's novel-writing, centering its discussion on two of her novels *East & Beyond* and *Island Formosa* by juxtaposing them. The two books were written closely in time. Although they are separate works, their writing strategies are seemingly alike, and their contents have the specialty to interpret and supplement each other.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tion, illustrates the research motive and methods, and reviews the results of related studies. In chapter two, I explore the writ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fighting against the singular, linear narration with diverse, broken narration," "imagining in the cracks of history" and "peripherals deconstructing the core" to confirm the spirit of New Historicism in her writing. Based on this, I present discourses of space and gender. In chapter three and four, I respectively organize the "connotations of space" and "gender politics" in the texts, and discuss the multitude of space appearing in both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space" and "ideological space." I go on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of characters," "writing versus dialogue," and the "invi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characters," and also explore identity and conflicts of nation through the setting of gender and race. In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I summarize the artistic strategies and main ideas of *East & Beyond* and *Island Formosa* before concluding that both novels share high similarity while having their own innovative originality.

Key Words: Ping Lu, Space, Gender, New Historicism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4
一、以討論平路作品為主的學術論文.....	4
二、以討論平路作品為主的學位論文.....	7
三、分析結論.....	1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目標.....	12
第二章 《東方之東》與《婆婆之島》的新歷史主義體現	15
第一節 以多重斷裂的敘事對抗單一線性敘事.....	16
一、多元敘事角度.....	17
二、可拆解重組的形式結構.....	19
三、男／女敘事腔調的調動.....	22
第二節 在歷史的縫隙中想像.....	25
一、歷史真實.....	26
二、文學想像.....	34
第三節 以邊緣解構中心.....	45
第四節 小結.....	49
一、多變的形式使解構閱讀更加可能.....	49
二、採取歷史縫隙與論述邊緣作為內容.....	50
三、選擇的題材與當代社會演變的關聯.....	50
第三章 《東方之東》與《婆婆之島》中的空間意涵	52
第一節 地理空間.....	54
一、台灣——充滿眷戀與回憶的空間.....	54
二、北京——古典與現實矛盾衝突的空間.....	58
三、阿姆斯特丹——面向海洋與冒險的空間.....	60
四、澳門——文化混融的空間.....	61
五、島嶼與海洋.....	63
第二節 概念空間.....	68
一、政治空間.....	68
二、情欲空間.....	74
三、家屋.....	77
第三節 小結.....	85

第四章《東方之東》與《婆婆之島》中的性別政治	88
第一節 角色隱喻	88
一、跨國婚戀的男與女	89
二、繼承又對抗的父與子	98
三、中國、台灣與西方	102
第二節 書寫與對話	110
第三節 人物之間的隱形關係	117
第四節 小結	119
第五章 結論	121
一、藝術創作手法的沿續與創新	121
二、島嶼向外的想像與向內的回歸	123
三、研究的局限與展望	125
參考文獻	12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平路創作頗豐，在小說、散文、評論中皆有出色表現，王德威曾說平路是「當代女作家中，少數自覺的形式主義者」¹，肯定平路不斷在形式內容上的創新與嘗試，無論政治歷史書寫、女性情慾書寫與科幻推理，都有豐碩的成果。平路早年旅居國外的背景，使她的早期作品將目光放在旅美人士的迷途與回望；其迷離身世驅使她深入探索自我與父母關係，也影響她對於女性角色的細膩描畫。但她不受限於傳統女性作家的既定印象，也不安於任何一次成功的創作模式，始終勇於在下一部作品拋出新的議題、嘗試探索新形式的可能。多元的嘗試使讀者不易簡單定義平路的創作風格，然而，這些嘗試都成為她創作的養分，影響她後期的創作的主題意識與寫作策略。

平路這樣一個多變且求新的作家，分析其小說創作歷程，可以發現她在內容與形式上的發展有其脈絡可循，其關注議題與視角亦有階段性轉變。在平路多元的小說創作中，引人注目的是作為一個女性寫作者，她對於政治歷史的投入與關注，深入閱讀其創作底蘊，會發現平路的關懷視角始終是台灣這塊土地，王德威認為「平路創作的方式五花八門，但她對台灣的關懷始終如一。如何想像或銘記台灣經驗，成為她作品中最值得探勘的線索」²，平路早期小說多以海外華人為題材，寫其生命困境時的同時，也流露對於台灣故土的眷戀與迷惘，這與她身為外省籍第二代的身份有關，其作品〈玉米田之死〉、〈在巨星的年代〉為此類作品代表，〈玉米田之死〉可視為平路關注政治的開端，與〈在巨星的年代〉中的男性角色，同樣情牽故土，最終皆毅然放棄當年的美國夢土返回台灣；其科幻作品〈台灣奇蹟〉、〈驚夢曲〉則是平路以科幻手法為台灣經驗作記錄，異軍突起，以看似荒謬冷硬的科技未來，叩問當時喧嘩熱鬧的台灣，究竟要往何處走，手法雖是科幻的，關心的仍是身處世界邊緣的台灣。

平路曾深情的表示：「身在國外，反而更確定我是以台灣為參考座標在度量事物的意義。就彷彿出航，不管船開得多遠，回頭張望，眼裡永遠是看到這

¹ 王德威，〈想像台灣的方法—平路論〉，《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 20 家》（台北：麥田，2002 年），頁 91-112

² 王德威，〈想像台灣的方法—平路論〉，頁 91-112

座島的身影，我離不開它的航道」³，對於這島嶼的深情也真切地在《婆娑之島》與《東方之東》這兩部小說中表露無遺，更深深打動了筆者。

另一方面，多年來，台灣的歷史在黨國單一口徑的論述中，製造了大量的樣板歷史、官方說法，筆者求學成長的背景即橫跨戒嚴與解嚴，曾身處眾人膜拜宏偉大歷史的荒謬現場，也歷經整個社會在大歷史崩解歷程中的混亂徬徨。但解構單一中央的過程並不是目的，而是開放解讀空間給每一個個體，尊重個體參與歷史、解讀歷史的必然性，因此筆者對於新歷史主義的寫作手法特別的關注。

平路創作中有一條非常吸引人的路線，她以其獨到的眼光，從歷史的空隙、斷裂處尋找事件的另一種解讀方式，創造其不同於官方說法的意義與象徵。從《百齡箋》、《行道天涯》中大膽選擇以依偎在「民族救星」、「民國之父」身邊的女性作為主角，讓站在歷史中卻一再被忽視的「她」發聲，突破男性強調功業的大歷史，將過往塑造的完人形象請下神壇，還原至肉體凡身；《何日君再來》則以家喻戶曉的大明星之死為小說主題，藉由多重書信、手稿日記、八卦傳聞、醫學報告等敘述，讓不能說真話的「她」有許多的可能，間接碰觸了政府權力掌控與兩岸敵對關係下不能說的秘密。這些作品融合新歷史主義和女性議題，勇敢挑戰以龐雜的歷史為背景的小說創作，直接從眾所矚目的名女人入手，由核心瓦解單一的論述，由個人身體情慾對抗黨國政治規範，由陰性書寫顛覆父系文化對發言權的獨攬。

平路在作品中不斷嘗試與官方正史對話，為了創作，她大量閱讀大寫的history，然而，進入文學創作中，則以小人物、女性角色或沒有發言權的邊緣角色重述歷史，確保歷史不被掌權者掌控、定義，這是平路對於小說的使命感。

總上所述，平路對於台灣島嶼的關懷，及挑戰傳統歷史的寫作手法，對於筆者來說充滿吸引力，在閱讀平路的過程裡，筆者進一步把目光集中在《婆娑之島》與《東方之東》這兩本長篇小說。

《婆娑之島》與《東方之東》意欲重新建構討論的歷史分為兩股脈絡，一為荷鄭時期的台灣，一為現下的台灣國際局勢，是兩個台灣創作者較少碰觸的切入點。

³ 盛浩偉，〈想像過去，創生未來——專訪平路〉，《文訊》327期（2013年1月），頁38

長期處於被殖民角色的台灣，在解嚴前後，史筆所不能書寫的都交到小說家的文筆，而台灣在歷史重建的歷程中，小說創作「重點在於恢復被殖民者的我族歷史，特別著重在日本殖民史、國民黨戒嚴史、二二八史、白色恐怖史的重述」⁴，解嚴後台灣作家對於台灣歷史政治書寫的涉入，以二二八事件為重要指標，李喬《埋冤一九四七》以寫實手法敘述二二八事件；陳燁的《泥河》是女作家第一部碰觸二二八事件的長篇小說，環繞著二二八事件寫家族幽暗歷史；施叔青的《三世人》、李昂的《迷園》與《彩妝血祭》皆分別以不同的方式碰觸二二八事件⁵，陳玉慧《海神家族》以二二八事件在家族變遷中穿針引線，林耀德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以原住民的眼光切入二二八這個日子。

至於白色恐怖史、黨外運動史的重述，則有陳映真〈山路〉、〈趙南棟〉、藍博洲《藤纏樹》、《台北戀人》；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談黨外運動時期的女性與政治；張亦絢《永別書》在白色恐怖的成長史裡交錯書寫族群與性別的認同……，不可否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書寫常有重疊連續之處⁶，也都是台灣解嚴後文學、歷史與政治所關注的重要面向。施叔青《行過洛津》與陳玉慧《幸福之葉》、《china》，則將背景設定在清領時期，以陰性角色的追尋重建臺灣於清領時期的繁華歷史。

與上述小說創作相較，平路長篇小說《婆娑之島》與《東方之東》雖然各有著墨處，卻都選擇以荷鄭時期的台灣作為切入點，字裏行間流露出對於大航海時代的遼闊想像，值得玩味。此外，兩者皆以另類的發聲位置書寫台灣歷史、觀看台灣處境，不管是《東方之東》敏惠藉鄭芝龍父子的故事寫台灣的抉

⁴ 陳建忠〈歷史敘事與想像（不）共同體：論兩岸「新歷史小說」的敘事策略與批判話語〉，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第五屆東南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2006年10月）

⁵ 根據洪英雪《文學、歷史、政治與性別——二二八小說研究》整理，1987年8月至1999年期間，台灣國內發表的二二八小說數量有四十三本，2000年至2006年則有十七本，可見解嚴初期，對於平反二二八有很高的渴望。

⁶ 葉石濤：「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連在一起，分不清楚了」，莊紫蓉訪問葉石濤，引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1年3月7日，網站連結：

http://www.twcenter.org.tw/thematic_series/character_series/taiwan_litterateur_interview/b01_13101/b01_13101_1。此外，洪英雪分析林雙不編《二二八台灣小說選》及許俊雅編《無語的春天》，認為「不管從歷史上或文學上，不少學者、作者談論這兩個歷史時段或說歷史事件時，經常是一種連貫性的敘述」，洪英雪《文學、歷史、政治與性別——二二八小說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6年12月），頁14。

擇與命運，或是《婆娑之島》從荷蘭末任總督揆一及美國高層官員看台灣處境，採取特殊的觀看視角，除了在創作上手法巧妙之外，也暗示了真實現況中，台灣一再被外力觀看牽動的為難，書中雖是透過遙遠的彼端發聲，卻反而更能讀到平路對島嶼處境的深切關懷。小說中亦討論兩岸關係或台中美關係，皆為台灣現實處境中不能迴避的思考，可以看出平路不耽溺於情感，理性思維的部分，其創作除了療過往的傷，更有意藉此觀台灣的現在與未來⁷。

仔細梳理平路小說創作脈絡，可以注意到《婆娑之島》與《東方之東》這兩部作品創作時間相距不到兩年時間，創作背景也相似⁸，雖各自獨立，但創作手法隱然相似，且內容有可相互補充的特殊性。

歸納以上原因，筆者希望能在前行者對平路政治歷史創作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將目光放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上，希望能夠透過對於兩部作品的文本梳理，整理其內在聯繫，分析其創作策略與關注的議題。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以討論平路作品為主的學術論文

關於平路作品的學術論文數量與品質均有相當份量，以下僅就與主題最為相關的幾篇加以概述：

南方朔〈重塑革命者的血肉和心情——從馬奎茲《迷宮中的將軍》到平路的《行道天涯》〉⁹，認為在「東方主義論述」、「殖民主義論述」的強勢書寫下，平路對於孫中山的重新書寫，帶著同情的理解，一如馬奎斯以失敗的革命者波利瓦將軍為本所寫的《迷宮中的將軍》，都是為第三世界重建歷史意識的努力。

⁷ 平路自述：「我希望盡可能在每個交叉點上，都折射出跟台灣相關的命運，雖然寫的是過去的故事，卻隱喻台灣的現在，甚是未來」，出自盛浩偉〈想像過去，創生未來——專訪平路〉，頁 37

⁸ 皆創作於平路旅居香港時期，以同時間創作集結的《香港已成往事》中，有相關〈程念慈〉、〈尋人啟事〉等篇章，皆能反映當時平路關心的主題。

⁹ 南方朔，〈重塑革命者的血肉和心情——從馬奎茲《迷宮中的將軍》到平路的《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6 期（1995 年 4 月），頁 154-157

楊照〈歷史的聖潔門背後——評平路長篇小說《行道天涯》〉¹⁰肯定平路用愛情來改寫革命，讓革命大歷史與個人小敘事衝突頹頹，凝視孫中山被迫北上的最後一段路，以及宋慶齡老年的寡居生活，以擺脫舊的偉人形象。但楊照也發現為了與舊敘述「劃清界線」，為了找到宋慶齡被過去歷史忽略的女性生命，平路似乎過分擴張宋慶齡的少女愛戀文藝腔。

林耀德〈孫中山／波利瓦VS.宋慶齡／平路——評《行道天涯》〉¹¹認為平路筆下的孫中山與馬奎斯筆下的西蒙·玻利瓦將軍非常接近，兩位作者閱讀大量史料，但呈現的是超越史料的生命個體。然而，林耀德也認為小說開始書寫之後，寫作主體便不斷消失，平路在為宋慶齡塑形的時刻，平路也被宋慶齡的形象所吸收與映現。

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¹²，以《行道天涯》為例，說明台灣女性作家在脫離戒嚴體制後，如何以文字挑戰中國大論述，認為平路的書寫策略是將重點刻意放在小歷史上，設計兩種平行的故事敘述，藉此相互投射人物如何產生差異，產生了諷刺的意味。

王德威〈想像台灣的方法——平路論〉¹³，此文除了自文學史的角度觀察平路文本的創作背景，與過往文學潮流、前輩作家的關聯性，以及其創作與當代文壇潮流的離合外，特別提出平路的創作是以對台灣故土的感情為出發點，而開展出政治、性別等議題。文中亦特別針對《行道天涯》論述其得失。

劉亮雅〈平路《百齡箋》中的性別、書寫和記憶〉¹⁴，梳理《百齡箋》一書中的不同篇章，提出性別、書寫和記憶是該書的主要議題，小說中男性與女性

¹⁰ 楊照，〈歷史的聖潔門背後——評平路長篇小說《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第11卷第6期（1995年4月），頁158-160

¹¹ 林耀德，〈孫中山／波利瓦 VS.宋慶齡／平路——評《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第11卷第6期（1995年4月），頁161-162

¹² 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131-150

¹³ 王德威，〈想像台灣的方法——平路論〉

¹⁴ 劉亮雅，〈平路《百齡箋》中的性別、書寫和記憶〉，《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台北：九歌，2001年），頁197-227

不同的書寫位置以及對記憶的不同處理方式，引人思考性別與權力、虛擬與真實、書寫與記憶的複雜關係，也關心人們將如何書寫台灣記憶與歷史。

郝譽翔〈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論平路小說之「謎」〉¹⁵，由平路早期政治小說中的故鄉／身世之謎談起，進入家國論述的迷宮，再用女性情愛記憶打造寫作的歧路花園以重寫男性的神話與歷史，完成了女性書寫「傷逝的週期」，認為平路意在用語言破除語言的魔障，透過女性視角找到歷史的縫隙。

梅家玲〈「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¹⁶，分析平路如何從對女性與鄉土想像、性別化國家主體糾葛的反思，到男女兩性於創造／書寫議題的辯論，思辨如何由「他」的故事走向「她」的故事。討論平路小說中的家國歷史書寫中女性論述的角色，肯定平路以迂迴曲折的方式，為「她」的故事尋找另一個出路，迴避男女競爭敘事的爭鋒。

沈乃慧〈島嶼的憂鬱夢境：評析平路的後現代台灣意象〉¹⁷，針對平路後現代作品中，〈驚夢曲〉、〈台灣奇蹟〉、〈島嶼的名字〉和〈虛擬台灣〉等四篇具有寓言性質的作品，討論平路小說中的台灣意象。四篇小說分別以不同的角度書寫台灣，以〈驚夢曲〉、〈島嶼的名字〉寫失落的台灣記憶、以〈臺灣奇蹟〉寫世界台灣化的狂想，至於〈虛擬台灣〉則是台海關係的未來預言，充分表露了平路對台灣的牽掛與焦慮。沈乃慧認為對平路而言，過去的台灣是甜美的記憶，而對台灣的未來則充滿不安與疑懼。

¹⁵ 郝譽翔，〈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論平路小說之「謎」〉，《東華人文學報》第四期（2002年7月），頁163-180

¹⁶ 梅家玲，〈「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〇、九〇年代台灣小說論》（台北：麥田出版，2004年），頁227-265

¹⁷ 沈乃慧，〈島嶼的憂鬱夢境：評析平路的後現代台灣意象〉《花大中文學報》第1期（2006年12月），頁289-307

簡瑛瑛、吳桂枝〈華語語系女性歷史書寫與跨文化再現：從施叔青《台灣三部曲》到平路《婆娑之島》〉¹⁸，以華語語系理論框架，將施叔青與平路定義為「文化回歸」的女作家，分析其作品《台灣三部曲》、《婆娑之島》，採用多重敘事的寫作策略，再現後殖民跨文化混雜性的在地化歷史。針對研究者對於施叔青與平路的歷史書寫，提煉出幾個雷同的評論：如「以小搏大」、「據邊緣反中心」、「以感性對抗理性」、「女性抗拒男性」等，開創出女性（新）歷史書寫的新局。文中略提及《東方之東》，但並未深究。

二、以討論平路作品為主的學位論文

唐毓麗《平路小說研究》¹⁹，這是第一本全面探討平路小說的學位論文，對平路作品做大致上的分期與分類，從移民者生活心境談起，並從科幻、政治歷史、女性書寫三方面說明平路的實驗風格。論文詳實豐富，完整地為平路的多元書寫確立幾條清楚的路線。

王鈺婷《身體、性別、政治與歷史—以《行道天涯》和《自傳的小說》為考察對象》²⁰，從「政治性別」、「再現策略」、「集體記憶」、「情慾書寫」幾個層面切入，探討平路《行道天涯》與李昂《自傳的小說》中身體、性別、政治與歷史之間的關係，認為兩者皆以「政治名女性」的重新書寫來拆解政治與偉人神話，一者為當權者的名女性宋慶齡，一者為台灣反對黨的名女性謝雪紅。兩者在男性書寫裡被過份神聖化或妖魔化都顯示男性體制再現女性樣貌的權力，王鈺婷肯定兩位作家挑戰單一敘事，重建女性書寫的用心。

楊翠《鄉土與記憶—七〇年代以來台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²¹，以時間意識與空間結構為焦點，討論解嚴（一九七〇年）之後的三十年間，台灣女性創作者在小說中如何打破男性定於一尊的線性歷史。本論文既從事文

¹⁸ 簡瑛瑛、吳桂枝，〈華語語系女性歷史書寫與跨文化再現：從施叔青《台灣三部曲》到平路《婆娑之島》〉，《台灣學誌》第12期（2015年10月），頁1-15

¹⁹ 唐毓麗，《平路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²⁰ 王鈺婷，《身體、性別、政治與歷史—以《行道天涯》和《自傳的小說》為考察對象》（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²¹ 楊翠，《鄉土與記憶—七〇年代以來台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本內部分析，又嘗試將文本置於歷史情境中詮釋，討論思想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分別從以下幾個角度切入：女性小說家筆下的鄉土（本土鄉土與眷村小說）、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圖像，以及如何以政治名女人挑戰大敘述的男性政治史。其中特別提及平路與李昂的政治名女人書寫，認為解構名女人意味著解構性別政治的父權論述，以及解構國家機器的威權論述，提出平路傾向以當權者或被半神格化的女性為主角，透過記憶、愛情、死亡與救贖等相關主題來鋪展演繹。為首位細膩梳理平路名女人系列的論者，認為平路這三部小說，一方面解構歷史，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九九〇年代以前台灣歷史書寫與父權／威權體制的親密關係。

吳淑芳《文學想像與歷史的重建—平路小說研究》²²，從「鄉土小說與台灣歷史的連結」、「科幻小說與台灣歷史的再探索」，以及「女性小說的文學想像與史實再造」三個層面，討論平路文學想像與歷史重建的意圖。

吳培毓《平路小說研究》²³，本篇論文以閱讀整理平路小說創作文本的方式，討論平路分別以移民寫鄉土情懷、以科幻思考科技問題、以後設為知識型文學的寫作、藉由名女人的書寫掌握自己女性的聲音，以及分析平路小說中「缺乏愛」的女子。

林秀蘭《論李昂、平路與朱天心的記憶書寫》²⁴，細緻地從李昂、平路與朱天心三個人的族群背景、生長時代開始分析，梳理文本，比對三人在「話語記憶」、「身體記憶」與「戀物記憶」三個面向中，在記憶書寫呈現的不同樣貌。其中「身體記憶」裡的「身體情慾與感官的記憶」，「戀物記憶」中對於飲食與器物的闡釋，對於筆者於空間部分的分析多有啟發。

²² 吳淑芳，《文學想像與歷史的重建—平路小說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²³ 吳培毓，《平路小說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論文，2006年）

²⁴ 林秀蘭，《論李昂、平路與朱天心的記憶書寫》（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鄧美華《平路小說對人生困境的省思——從自身經驗出發》²⁵，由平路生命經驗出發，探討平路生命中的困境與作品間的對應關係。從平路的童年經驗討論小說〈繭〉、〈妒魔〉、〈婚期〉，以其女性身份書寫的困境討論其《行到天涯》、〈百齡箋〉，以及面對死亡與流離的困境連結其小說〈郝大師傳奇〉、〈紅塵五注〉，研究方向獨特，但主題與討論作品較駁雜，論述也比較片段。

郭蔚真，《平路小說女性書寫之研究》²⁶，以平路小說中女性的形象、情慾與困境三方向切入，從女兒、情人、妻子與母親等四種形象探討長久以來被社會邊緣化的女性地位；且透過文本分析女性情慾的焦慮與陷溺，以及女性長期在社會框架中找尋自我認同，認為平路小說中的女性不管處何種身分，都無法有效的擺脫舊有觀念。

陳韋賓《平路小說國族性別的權力解構研究—兼及其書寫形式》²⁷，分國族、性別與寫作形式三面向，探討平路小說中一貫拆解權力符碼的特色；透過平路的寫作背景、文本兩個角度解讀其作品。論文中梳理平路小說文本，說明平路敘事觀點除了男性敘事與女性敘事之作外，尚有兩人以上的敘事者同時並陳的多重敘事觀點；亦提出平路於性別書寫上，初期女性佔據強勢的主導地位，後期的女性則受制於男性，但是對女性的情慾描寫更加細膩。

陳芹漪《平路、李昂小說中的「政治女性」書寫研究》²⁸，選擇以平路與李昂小說中幾位具代表性的政治女性為主軸，針對平路《行道天涯》中的宋慶齡、《百齡箋》的宋美齡、《何日君再來》的鄧麗君以及李昂〈北港香爐人人

²⁵ 鄧美華，《平路小說對人生困境的省思——從自身經驗出發》（台北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²⁶ 郭蔚真，《平路小說女性書寫之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²⁷ 陳韋賓，《平路小說國族性別的權力解構研究—兼及其書寫形式》（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²⁸ 陳芹漪，《平路、李昂小說中的「政治女性」書寫研究》（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插〉的林麗姿、《自傳の小說》的謝雪紅進行研究，從而討論作家同中有異的書寫策略。

李芳璇《平路女性書寫之研究》²⁹，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平路在小說、評論、散文各方面的寫作裡的敘事策略。對於女性主義的流派整理詳實，對於平路作品內容討論亦豐富，但稍微駁雜，且無法緊密扣合女性主義理論。

黃柏維《從《行道天涯》到《何日君再來》—平路小說的新歷史書寫》³⁰，對於新歷史主義有非常完整的介紹。選擇海登·懷特歷史著述理論和史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形觀點，分析《行道天涯》與《何日君再來》，觀察小說中歷史人物呈現的形象，歷史與人物主體的關係，認為平路選擇貼近父權政治和社會制度去批判質疑、試圖改變，而非摧毀。

林欣筠《論平路、李昂、虹影新歷史小說的書寫策略》³¹，以《行道天涯》、〈百齡箋〉、《自傳の小說》與《K》小說文本為研究重心，從虛實相間的歷史圖像、歷史小說的慾望敘事、歷史敘事下的空間語境，分析三位作家的新歷史小說的書寫策略。

徐仁鴻《平路家國書寫的研究》³²，本論文從平路生命歷程對照其小說與散文創作，以及許多外緣資料，建立其家國書寫的寫作源頭，研究中有些篇章略提及《婆娑之島》與《東方之東》內容大要，未深入分析兩書在家國書寫的呈現。

²⁹ 李芳璇，《平路女性書寫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2010年）

³⁰ 黃柏維，《從《行道天涯》到《何日君再來》—平路小說的新歷史書寫》（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³¹ 林欣筠，《論平路、李昂、虹影新歷史小說的書寫策略》（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³² 徐仁鴻，《平路家國書寫的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張襄君《從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平路小說中的空間》³³，則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強調空間裡的權力，分析平路小說中的空間如何凸顯女性的主體性與困境，將平路小說中的空間分為形上空間、物理空間、身體空間與社會空間，但整體來說，本論文較偏重女性與文學性，與空間的連結性並不是非常緊密。值得一提的論文其中一小節中分析《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裡「自由自在的空間」，認為平路近期不再強調性別差異，反倒更重視自我實現

林韻芳《平路小說的台灣歷史想像——以《婆娑之島》為主》³⁴，運用新歷史主義觀點和後殖民書寫探討《婆娑之島》的藝術表現，從其寫作脈絡勾勒作者建構台灣歷史小說的意圖。雖以《婆娑之島》為研究對象，然而真正對於《婆娑之島》文本的分析僅集中在第五章「《婆娑之島》的藝術表現」，稍嫌不足，應可以有更多發揮之處。

以上為較接近本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除此之外尚有蔡淑芬《解嚴前後台灣女性作家的吶喊與救贖——以郭良蕙、聶華苓、李昂、平路作品為例》³⁵、黃清順《臺灣小說的後設之路——「後設小說」的理論建構與在臺發展》³⁶、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作為文本觀察》³⁷，皆有足資借鑑之處，研究者多面的研究角度，說明平路在女性寫作、政治歷史及後設小說創作上皆有相當成果。

³³ 張襄君，《從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平路小說中的空間》（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4年）

³⁴ 林韻芳，《平路小說的台灣歷史想像——以《婆娑之島》為主》（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2015年）

³⁵ 蔡淑芬，《解嚴前後台灣女性作家的吶喊與救贖——以郭良蕙、聶華苓、李昂、平路作品為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

³⁶ 黃清順，《臺灣小說的後設之路——「後設小說」的理論建構與在臺發展》（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³⁷ 王國安，《台灣現代小說的發展——從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做文本觀察》（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三、分析結論

綜觀以上研究，足見平路作品量與質俱有一定水準，其勇於嘗試、多元介入的創作特質，留給後人許多討論空間，其中，學界對於其「女性」、「歷史」以及「科幻」、「後設」等主題書寫，更是饒富興趣。

不少研究者皆著力於平路新歷史主義的書寫，其中簡瑛瑛、吳桂枝〈華語語系女性歷史書寫與跨文化再現：從施叔青《台灣三部曲》到平路《婆娑之島》〉與林韻芳《平路小說的台灣歷史想像——以《婆娑之島》為主》，兩篇論文皆論及《婆娑之島》藉由新歷史寫作建構台灣歷史的意圖，然對於文本的梳理較為缺乏。

在性別議題上，梅家玲《「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與陳韋賓《平路小說國族性別的權力解構研究——兼及其書寫形式》對於平路小說中男女聲腔皆有獨到見解，也討論平路如何藉此解構權力符碼、連結國族議題。不少論文討論重心為平路名女人系列，對於如何以性別議題切入政治與歷史的重新解讀，有細膩的梳理。

此外，除了張襄君的論文《從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平路小說中的空間》針對平路小說中的空間討論之外，林欣筠與楊翠的論文也對平路小說中空間語境有所著墨。

綜上所述，「新歷史主義」、「空間」與「性別政治」誠然為研究平路小說創作的關鍵字，然而，受限於作品發表時間，學界專注於《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兩本著作的討論尚不多，且僅集中於個別內容主題的分析，並未將兩者整合討論。筆者認為這兩本著作不僅在題材上有疊合處、寫作手法類似，且出版時間相近，可以作為同一個時期的創作合併深入討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目標

平路的政治歷史的小說創作已有一定的累積數量，本論文期望在平路相關作品的基礎上，以平路《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為研究中心，以文獻分析法，對文本進行分析、歸納，針對「新歷史主義體現」「空間意涵」與「性別政治」三個面向切入。

其一，新歷史主義提出「文本的歷史性」(the textuality of the histories)，強調文學作品與當時社會與文化相互影響，文學作品中必然有其社會性、歷史性；以及「歷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認為歷史是敘述出來的

(History is always narrated)，受限於書寫者的歷史語境 (Context) 以及歷史關懷。其中，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系譜學提供了新歷史主義重要的思考方向，強調歷史並非依賴線性的發展，所謂連續不斷的歷史其實是虛構的，因為在不同階段的歷史變化中，存在著太多的斷裂、空隙；此外，歷史並非由單一觀點建立的，而是以許多複數的方式進行，因此他並不特別重視所謂的主流歷史，反而重視被掩蓋、被遮蔽的歷史事件³⁸。《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無疑為平路涉足歷史書寫的再次嘗試，因此，本論文將在對於新歷史主義的理解基礎上，檢視文本，探討兩部小說如何體現新歷史主義。

其二，《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裡出現許多對於空間的書寫，書中人物大多擁有跨國移動的經驗，書中人物在情感上的相遇與理念上的碰撞，都帶著相異空間的背景，書中分別出現了台灣、北京、澳門、荷蘭幾個地理空間，也可以歸納出政治空間、情欲空間、家屋等概念空間。近代人文學科學者的空間論述，強調空間受到各種社會權力機制運作的影響，看似客觀存在的空間，參雜著文化、政治的形塑與敘述，「空間裡瀰漫著社會關係；它不僅被社會關係支持，也生產社會關係和被社會關係所生產」³⁹，空間因而被建構，也因此在無形中影響活動其中的人，建構其認同與思想。此外，傳統歷史書寫依循連續性的線性時間，對於空間的看重亦可視為對傳統線性時間書寫的一種挑戰。

因此，筆者期望透過文本梳理，分析《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出現的空間，及其背後的寓意。

其三，筆者注意到《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人物關係，常常是跨種族、跨國界的，因此其互動超越單純普遍的人性，隱含其文化、認同與族群之間的衝擊。對於人物角色這個面向，本論文關注的不在於平路如何塑造筆下角色的關係，而是關注平路如何透過筆下角色的關係，針對國際關係、世代與階級之間的想法進行辯證與對話。希望透過梳理文本，分析平路如何透過角色的設定、人物展開的語言對話與書寫，隱喻家國處境，以充滿感情的筆觸，引發讀者關注台灣在複雜的兩岸關係、台中美關係中的艱難處境，且以重複的關鍵概念加強人物之間的隱形連結。

³⁸ 陳芳明，〈傅柯與新歷史主義〉，《文訊》雜誌 344 期 (2014 年 6 月)，頁 8

³⁹ 昂希·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著，王志弘譯，〈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3 年)，頁 20-21

在此構想下，本論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研究動機，藉由文獻回溯整理，確認研究方法與目標。

第二章《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的新歷史主義體現

梳理文本，提出平路「以多重斷裂的敘事對抗單一線性敘事」、「在歷史的縫隙中想像」、「以邊緣解構中心」，確認平路的新歷史寫作路線，進而延伸《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對於「空間」與「性別」議題的思考。

傳統歷史論述著重線性時間，著重男性掌權者的大敘事，然而，書中以空間解構傳統歷史下的時間，以性別所衍伸的男女關係與父權結構對抗固著的大敘事，亦彰顯新歷史主義的精神。

在此思考脈絡下，將於接下來的兩章分述討論「空間」與「性別」。

第三章《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的空間意涵

書中以空間書寫化解傳統歷史的單一線性時間，本章透過「地理空間」與「概念空間」兩個面向，仔細梳理文中的跨國跨時空間，以及其象徵的空間意涵。其中「地理空間」討論兩書中出現的台北、北京、阿姆斯特丹、澳門等地，以及充滿象徵意味的島嶼與海洋；「概念空間」則將兩書中空間歸納出政治空間、情欲空間與家屋三個小子題，以此為討論焦點。

第四章《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的性別政治

書中重要的人物關係暗含性別政治，透過跨國婚戀的男女關係、既繼承又對抗的父子關係，以及不同國族的角色相互觀看的方式，試圖討論國家關係與歷史命題。此外，分析人物之間的書寫與對話，以及兩書中可作為參照的隱形關係。

第五章 結論

總結前文，歸納平路《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的藝術手法與思想內涵，討論其於平路小說中的意義。

第二章 《東方之東》與《婆婆之島》的新歷史主義 體現

傳統歷史的書寫掌握在官方手上，標準定型的單一線性思維，認為歷史有進步性、連續性，且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演變。八〇年代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挑戰原有的思維，「新歷史主義是一種注重文化審理的新的『歷史詩學』，它所恢復的歷史維度不再是線性發展、連續性，而是通過歷史的碎片尋找歷史寓言和文化象徵」⁴⁰，「不再重視舊歷史主義強調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謂偉大人物及宏偉敘事，而是將一些軼聞趣事和普通人（非政治人物、領袖人物）作為分析對象」⁴¹，其書寫與詮釋思考歷史的多面性，原先大寫的、單數的「歷史」

（History）受到挑戰，被眾多小寫的、複數的「歷史」（histories）所取代，歷史不再是官方認定輸出的單一解釋，具有被不斷闡釋的文本性。

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後，隨著原本黨國體制的鉗制鬆綁，多元的政治話語、議題討論陸續出現，風起雲湧。台灣作家以文學的筆，直接對抗國民政府所建立的國族神話，揭露國民政府遮掩塗抹的歷史樣貌，以往被官方刻意營造的政治神話與歷史記憶逐漸崩解，重構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一黨專政時期與黨外運動的對抗衝突，成為解嚴後臺灣作家筆下常見的題材。

陳建忠認為台灣的後殖民歷史小說重點在於恢復被殖民者的我族歷史，出發點是為了抵抗歷史消音、重建歷史記憶，因此特別著重在日本殖民史、國民黨戒嚴史、二二八史、白色恐怖史的重述。⁴²解嚴之初，臺灣作家的目光多集中於被嚴重扭曲的二二八史、白色恐怖史的重建，如何讓被黨國消音改寫的歷史恢復本來面貌，是文學家與歷史學家所關注的議題，陳燁的《泥河》既寫被幽魂纏繞的家族，也寫被二二八過往籠罩的台灣家族；李昂《彩妝血祭》、《自傳の小説》透過情欲顛覆，寫在台灣長期被壓抑的黨外運動及左派份子。

莊雅仲在《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裡清楚說明：

⁴⁰ 王岳川，〈格林布拉特的理論〉，《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58

⁴¹ 王岳川，〈格林布拉特的理論〉，《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頁159

⁴² 陳建忠，〈歷史敘事與想像（不）共同體：論兩岸「新歷史小說」的敘事策略與批判話語〉，《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台灣號）（2007年4月），頁360

曾經，台灣認同是戒嚴時代異議人士用來反抗國民黨有關大中華民族霸權的抵禦機制，台灣認同的概念提供了一個另類空間，以抵抗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認同一開始就是反抗論述，存於述說歷史、民族、人民、土地、民主、族群與現代性的另類敘事。⁴³

台灣的歷史記憶被反覆刷洗上色，最終都是為了洗去台灣不同於殖民／統治母國的事實，因此，「台灣認同」這樣一個中性的字眼，在統治者的眼中就是強烈的對抗姿態，悲情的過往，使得重寫臺灣歷史的創作免不了淚水與控訴。

王德威認為相較於聲嘶力竭的控訴、悲劇的重現，平路的歷史書寫路徑一貫維持語調抒情，在篤定的情感裡有著知性的省思：

「書寫」台灣在今天早成顯學；淚水與喧囂往往成為重溯歷史、控訴不義的不二法門。面對政經現象劇變的家園，平路顯然意識到這樣書寫方式的不足。一反涕淚飄零的模式，她的敘述往往多了一分省思或諷刺的層次。⁴⁴

平路除了顛覆官方所塗抹的歷史，更有意重建被忽略消滅的歷史，傾向以多重斷裂的敘事對抗單一線性敘事、在歷史的縫隙中想像、以邊緣解構中心等藝術手法，體現新歷史主義的精神。

第一節 以多重斷裂的敘事對抗單一線性敘事

平路八〇年代的作品以〈玉米田之死〉、《椿哥》、〈郝大師傳奇〉、〈在巨星的年代〉為代表，敘事者皆為男性。吳培毓曾指出《行道天涯》是平路創作的分水嶺，之後平路的作品中出現了女性的聲音以及自己的聲音，認為她藉由為無法發聲的女性說出自己的故事，也掌握了自己的聲音⁴⁵。筆者仔細比對平路長篇作品，認為平路在《人工智慧紀事》中，已有透過女機器人為自

⁴³ 莊雅仲，《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學，2013年），頁116

⁴⁴ 王德威〈序論：想像台灣的方式〉，收於《禁書啟示錄》（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頁12

⁴⁵ 吳培毓，《平路小說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班，2006年）

己作品中找到女性聲音的試探，此外，同時期的平路，與男作家張系國合作《捕諜人》，平路既為一個虛構的角色發言，也扮演自己女作家的角色，這部作品似乎為平路開啟多聲調敘事的寫作方向，之後的《行道天涯》有宋慶齡的主聲調、孫中山的次聲調外，還有珍珍的第三聲調；《何日君再來》的敘事更為複雜，敘述者除了調查員「我」、女明星不斷變動塗改的自述手稿，還有劇本、歌詞、各方證詞證物，眾聲喧嘩，彼此補充也彼此抗衡，顯示真理或歷史皆非越辯越明，也從來不僅是一種官方的樣貌。

以下就分別以多元敘事角度、小說結構安排、男女敘事聲腔來說明兩本小說中如何以多重斷裂的敘事對抗單一線性敘事。

一、多元敘事角度

平路的長篇小說多半採用數名人物的視角呈現不同事件，但敘事變換並不複雜，敘事者多半為清楚的二至三人，通常透過形式的篇章分段以區分不同視角，在固定段落裡則固定在單一人物的視角裡，調動意識流的手法，充分敞開人物的內心世界。

《東方之東》裡敏惠為主敘事者，她自述心境及與他人的互動，情節透過她的感知與思緒前進。同時間，敏惠筆下的故事則採用全景掌握的非聚焦敘事，故事中順治和鄭芝龍各懷心事，互相揣測，都在敏惠的掌握之中。與之平行的敘事者謙一透過書信，在看似平行的對話中回應／補足敏惠故事的空白，至於尚軍和小美的真實情緒則是讀者難以掌握的，僅能透過敏惠、謙一片段的描述中揣測。

《婆娑之島》採用兩條敘事手法，分別由「他」和揆一說話，平路透過意識流的方式，進入兩人的思緒，縱容他們毫不遮掩的情緒，不清楚指明事件發生年月日，而是透過記憶與書寫，將斷裂的時間連綴起來。

敘事者大致是與觀察者吻合的，但在某些段落，透露了敘述者另有其人：

揆一難以預見有一天，在熱蘭遮的舊址，與他無關的頭像，刻著他的名放在大廳一隅。⁴⁶

他們身邊，河流嗚咽著，沿河的樹蛙在高唱。寬尾鳳蝶在草叢間飛舞，

⁴⁶ 平路，《婆娑之島》，頁 285

貝殼發出奇幻的螢彩……，他們身邊是大河的分支，但他卻無從知悉，多年以後，那條河流的分支將改道注入臺江，造成「臺江內海」淤積，而大員港埋沒在污泥中，船舶進港的水道看不見了……⁴⁷

這些段落原本只侷限在揆一的視野，卻不著痕跡加入後見者的全知觀點，拉大敘事的歷史縱深，無形中增加滄桑感。

兩書在敘事時間上，隱隱然有一個進行方向，《東方之東》開始於謙一失蹤，時間順著敏惠尋夫的歷程，結束於無功而返；《婆娑之島》中兩個相隔三百年多年的男人，從事件終局回憶生命的歷程，以敘事者當下的生活帶入回憶。但時間與事件都是模糊的，某些事件甚至互相滲透，如《東方之東》的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時間都是尚軍離開的那一天，兩章的敘述亦著重於敏惠與尚軍終於跨出最後一道防線，發生性關係的前後；《婆娑之島》中對於島嶼富庶的物產在不同的章節中出現，有時出現在青春少壯的回憶中，有時夾雜在後期圍城困途的敘述中，有時則與娜娜豐腴的性愛敘事內容交纏。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皆非由單一敘事者發聲，不管由虛構人物回溯歷史或是由真實人物發聲，意圖破壞統一的觀點，此外，穿插回憶、書寫的片段，以敘事者的意識流動來連綴事件，而非以明確的編年時間，除了能夠更加細膩展現人物意識與情緒的流動外，也挑戰官方嚴謹的歷史書寫方式。

除了明顯可見的敘事者已有多重角度外，人物閱讀的報導、引用的史料，也增加敘事角度。《婆娑之島》中運用「媒體評論」、「立法院質詢稿」的不同形式，提供對於凱德磊案的多種角度；運用巴達維亞評議會的「報告」、「判決」，說明荷蘭殖民官方歷史裡不同立場的衝突。

平路自己說道：

只有你把多重的聲音並陳的時候，才比較有可能呈現真實，而且這也可謂是一種民主程序。以前都是官修前代史，歷史是被朝廷、史家以及許多政治因素所武斷、所震懾，歷史判定忠奸好壞，判定誰是楷模、誰是模範，而那其實才真的是磨滅個人。⁴⁸

⁴⁷ 平路，《婆娑之島》，頁 113

⁴⁸ 蔡淑樺採訪整理，〈以小說拼寫傳奇——平路專訪〉，收錄於《何日君再來》，（台北：印刻，2002年），頁 246

對比一般歷史書寫對於人物資料、事件時間的清晰明確，《婆娑之島》與《東方之東》中歷史與新聞事件的輪廓是模糊的，更重視的是人物的內心感受。利用多元敘事角度，平路提供不同人物解讀歷史以及彼此對話的可能，除了多重敘事者，作者也透過敘事時序的變換，提供頓挫，破壞過分流暢統一的線性敘事。

二、可拆解重組的形式結構

多重角度的敘事技巧符合平路真實與虛構交錯的寫作方向，經過多次的訓練，顯然已成為平路熟練的寫作技巧，進一步影響小說結構，發展出工整的形式架構。在《行道天涯》裡就有一定的規律：《行道天涯》前一到五十章裡，單數章是以孫文為主的男性敘述、偶數章則分別是宋慶齡與珍珍。後十章則是以珍珍為首、孫文其次，再次為宋慶齡，三者輪流敘事。《何日君再來》以探員的報告、女明星手稿為兩條敘事線，並且穿插證詞證物，互相補足卻也互相辯證，提供多方視角。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兩書敘事皆以今昔兩線並行，透過一個小動作連結不同敘事線，讓敘事線維持可以互相獨立又可以彼此補足的關係。

《東方之東》有兩條故事線：一寫當代台灣女子敏惠與台商丈夫謙一在兩岸通商之後的問題，二寫改朝換代之際順治皇帝與鄭氏父子三方的拉扯，由敏惠擔任第二條線的敘事者，讓兩條故事線巧妙縮合；《婆娑之島》同樣也是兩條故事線，一為荷蘭最後一任總督揆一回憶其在台灣種種，及其保台戰爭失利的過程，一為當代國際政治事件，藉由一樁台美間諜案，寫台／中／美之間的複雜關係，本來平行的兩條線，由美國國務院官員「他」偶然翻閱揆一化名 C.E.S. 所著《被貽誤的台灣》一書，讓兩條故事有了具體的聯繫。

接下來進一步說明小說章節安排，分析其小說架構：

《東方之東》中主要的敘事者是女性角色敏惠，以敏惠揭開序幕，讓敏惠說自己的故事、說自己在北京遇見的男人、述說丈夫謙一的種種；丈夫謙一未能寄出的信與敏惠的敘事平行，各說各話，但在內容上卻又互相解答，一直到小說最後，敏惠才收到謙一的信，開始最初也是最後的對話。

《東方之東》中的小說結構，分為「序幕」、「北京出現的男人」、「她正在寫的故事」、「信」、「尾聲」幾個部分，除「尾聲」外，其餘幾個部分皆以數字（之一、之二、之三……）區分章節，篇章名稱標示不同主題，不同主題穿插敘事。

「序幕」共有三章，內容為現在進行式，參雜過去的回憶，先架構故事的背景——丈夫失蹤後，妻子到北京尋夫——也勾勒兩人在婚後的空間、兩人分居兩地的空間。

「北京出現的男人」共有八章，是敏惠在北京的故事，以回憶的方式敘事，時間開始不規則的跳躍，主要是回憶與尚軍從認識到分開的故事，但不時會跳出來評論當時的情緒：

當時，亂哄哄的大廳裡，她繞過那堆網在一起的皮箱，先去櫃臺問有沒有留言。櫃臺說去後面查一查……「當時，你下車，一手推大廳的旋轉門走進來，走路的樣子特好看」，而後來她知道，尚軍在嘴巴甜的時候，說話通常沒有那麼可靠。那時候在大廳裡，她隱約覺得隔著茶几也坐著人。⁴⁹

「當時」的時間是兩人初相遇那一天，「後來」的時間是在兩個人相處一段時間之後，「那時候」這個時間又回到兩人初遇那一天。敘事時間快速變換跳動，但大致仍順著順時敘事的時間軸前進。

尚軍是這段故事裡的主要角色，這個部分除了講兩人的故事，亦藉由敏惠與尚軍的對話，談兩人的過往、台灣與大陸的不同觀點與歷史，其中，敏惠與尚軍分享自己的小說創作，連結到「她正在寫的故事」這個次主軸。

「她正在寫的故事」是書中書，共有四章，是敏惠所寫的故事，內容是鄭芝龍與順治皇帝三百年前在北京發生的對話，這個部分穿插著敏惠與尚軍在讀故事的對話，對歷史的評論隱隱投射現下兩岸難解的習題。

「信」的部分是敏惠謙一夫妻以書信對話，「信」（之一）至（之四）是謙一的自白，寫他失蹤的緣由，如何解讀夫妻的感情，與父親複雜的情緒，

「信（之四）」，謙一終於詳述另一個女人小美，以及她讓謙一陷入愛戀的緣由，謙一失蹤的謎底才真正揭曉。「信（之五）」是敏惠寫給謙一的回信，至此兩條各自的敘述才真正有交流，敏惠完整梳理自己和謙一的情感脈絡，也為整個故事作結。

「尾聲」非常簡短，敘述敏惠放棄尋夫，離開中國。最末以海基會毫無感情的官方宣告作結。

⁴⁹ 平路，《東方之東》，頁 85

平路小說的章節安排展現其精巧設計，這樣的小說章節安排，利於重組拆解，以多元的方式閱讀。一種閱讀方式是傳統順著頁碼往下讀，另一種是以目錄中的類別閱讀，會發現每一個類別都能自成一個故事，例如：順序閱讀

「信」這個類別，也可以讀到一個完整的故事，跨類別結合之後亦有互相參照之妙。

《婆娑之島》的小說章節形式與《東方之東》相似，差別在於，《東方之東》順時間敘述，首尾以大陸官方的宣告性文字連結；《婆娑之島》全書皆以回憶為主，「序曲」以兩人現在的狀況入手，再倒敘過往，與「尾聲」中兩人分述自身故事的「始」與「終」。除了「序曲」與「尾聲」之外，「他」與揆一兩者敘述分章輪流出現，「他」的部分為偶數章，揆一的部分則是通過奇數章，架構井然有序：

「他」	揆一
序曲	
默契	金色的河流
說法（之一）	塵世的夢鄉
青春（之一）	文明的盡頭
青春（之二）	島嶼的經營
說法（之二）	劫難的淵藪
比喻（之一）	貽誤的時機
說法（之三）	圍城的黃昏
青春（之三）	圍城的暗夜
比喻（之二）	沈浮的命運
比喻（之三）	滄桑的歲月
說法（之四）	
尾聲	

透過分析表可以看出，章節名稱刻意以不同風格的命名區隔兩人敘事區塊，全書結構非常整齊。

但兩個敘事區塊又非截然區隔，揆一的敘事內容隱約連結到美國國務院官員「他」敘事的章節名稱，例如：揆一藉由書寫提出自己的「說法」，也意識

到公司與教會需要卸責的「說法」；以文明中男女互動如何一步步試探，才能有的「默契」，對比揆一與娜娜初相見時不用言語的身體契合；揆一回憶自己剛進入公司的「青春」，還有精力旺盛的年紀裡在福爾摩沙這塊土地上感受的活力與歡愛；揆一自忖「他依稀記得那個隱喻，是警告嗎？替這島嶼命名的葡萄牙選手，風浪中撞上暗礁，回航的船隻擱淺，困在沙洲上找不到歸路」⁵⁰，則呼應章節的「比喻」。

由於兩個敘事者的年代相距三百年，因此兩人的分敘能夠各自獨立閱讀，若是依傳統方式按照頁碼依序閱讀，會隱隱在跳動的兩個時代兩個敘事者的跳動中，讀到一條隱然連接呼應的線。

除此之外，兩個看似平行的故事內容也有內在聯繫。林韻芳將兩個故事結構並列，發現：

兩個故事是用類似的情節架構去組織、鋪敘而成的，平路是有意識地進行寫作。雖然故事事件並非呈現順敘排列，看似鬆散的打散在各章，無章法隨筆敘事，但單一故事主軸內每個人物的生活事件卻是緊湊的連貫。⁵¹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篇章安排為可拆解重組、多線前進的多元小說結構，創造閱讀的樂趣，也在形式上體現新歷史主義所提出的「歷史文本化」，創造更多被解釋的空間。

三、男／女敘事腔調的調動

早期平路的創作中多採男性或中性的敘事者，至《五印封緘》較明顯涉及女性議題，之後的《行道天涯》、《百齡箋》、《凝脂溫泉》、《何日君再來》皆有非常鮮明的女性敘事者，關心的也是女性議題。

陳韋賓認為：

平路作品中除《玉米田之死》中〈蘭〉、〈愛玉〉及《五印封箋》中的同名短篇為女性敘事者外，其他篇章的敘事者全為男性，但在《紅塵五

⁵⁰ 平路，《婆娑之島》，頁 107

⁵¹ 林韻芳，《平路小說的台灣歷史想像——以《婆娑之島》為主》，頁 98

注》中，男性敘事者卻急遽的消滅，讓位於女性敘事者。此後平路的作品對女性有了更多的關注，在性別敘事上也不再是一面倒的男性獨大，而有了「眾聲喧嘩」的呈現。⁵²

對於這樣的轉變，平路自己的說法：

也許那時的男性聲音對我而言較自在，自己看自己常會失焦……也許那時的男性聲音對我而言較自在，可以隱藏自己。後來我覺得女性的聲音較可以自在地發出，可能那些年間我原先的拘束、拘謹較放開了。期間的因素很多，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也是個問號。⁵³

對此，陳韋賓提出另一種解釋，認為「早期對國族論述的著重，藉由將男主角陰性化的書寫以製造高度反差的文學手法，或許也是平路在有意無意間選擇男性敘述觀點的可能性之一」⁵⁴，范銘如也認為當時海外女作家在寫作時，其男女聲腔的調動與其代表的意圖有關：

即使比男作家多用女性主角，海外女作家有此二分法：運用女性主義探討個人的、小我的、觸及性別、種族與階級等具體的社會問題，男性主角則隱含著國族寓言，統攝海外華人，甚至全部中國人的整體性命運。我們因而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當海外女作家表達她們對母國的思慕與渴望時，敘述中則以男性身份代言。⁵⁵

平路早期旅居美國時期的小說創作，明顯有此傾向。將之拿來印證《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寫作，亦有相通之處：《東方之東》裡談的是家事，選擇一對夫妻作對話的兩造，圍繞的多半是愛情與過往；《婆娑之島》裡雖然談

⁵² 陳韋賓，〈平路小說國族與性別的權力結構研究——兼及其書寫形式〉，頁 42

⁵³ 蔡淑華採訪整理：〈以小說拼貼傳奇——平路專訪〉，《何日君再來》（台北：印刻文學，2002 年），頁 243-244

⁵⁴ 陳韋賓，〈平路小說國族與性別的權力結構研究——兼及其書寫形式〉，頁 42

⁵⁵ 范銘如，〈由愛出走——八、九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書版，2002 年），頁 112

愛情，但作為敘事者的兩位男性，回憶中有更直接的政治歷史資料，關懷台灣的過去歷史與未來命運。

平路許多小說都是由男性和女性的角度分別敘述，例如：《行道天涯》、《何日君再來》與《東方之東》，製造性別對話，或者藉此突顯兩性難以對話、難以真正互相理解。

《東方之東》以敏惠為主要敘事者，謙一則透過信件成為與之對話的敘事者，對於兩人身處的情愛困境，男女有不同的解讀。除此之外，小說中還安排了敏惠所寫的故事，讓故事中的鄭芝龍與順治皇帝有機會說話，然而，這創作中的創作，其敘事者究竟是誰呢？順治與鄭芝龍的敘事究竟是男性視角，還是女性視角？平路以巧妙不著痕跡的方式後設拆解，留下讓人玩味的空間。

《婆娑之島》中，娜娜與羅洛萊的影響清晰可見，卻又是毫無話語權、無法發聲的女性，沈默的女性讓某些不對等關係呈現，象徵台灣的難以自我表述，有賴西方帝國的憐憫與眷戀。

對此，平路自己有更積極的說法，在以女性聲音顛覆男性話語之後，她進一步肯定即便沈默的女性，仍然有力量。平路在訪談中自述：

我想嘗試一種更素樸的方式，畢竟對於以前小說「手藝」，我已經很熟悉了，所以想做一點新嘗試，而不是重複自己習慣的方式。另外我想問的是：難道女性沒有說話，就代表被壓迫了嗎？⁵⁶

即便神秘的娜娜從頭到尾不發一語，她的力量卻掌控了表面的男性發言，甚至象徵性地造就了揆一最後的退敗。

「或許這裡面也隱藏了我對台灣的期許：我們或許是柔弱的、或許是沒有聲音的，但不代表我們沒有力量，也不代表無法在未來走出新局。」⁵⁷

對抗歷史中心，平路從 History 到 Herstory，意圖賦予弱勢的女性、失敗者、弱勢政權也有說話的可能，能夠說自己的故事。

對於平路男女敘事聲腔的調動，筆者有一個大膽的假設，認為此脈絡與平路個人身世背景有關，平路從小面對母親哀嘆她那個早夭的男嬰，恨不得自己

⁵⁶ 葉佳怡〈你的未來包括所有過去：平路談新作《婆娑之島》〉，《自由時報》（2012年10月1日），<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619195>

⁵⁷ 同上註

代替那個男嬰死去，家中說不出的詭譎氛圍，讓她是一個既乖巧壓抑但是又急切想要找到另一個發聲管道的女兒。最初平路必須藉由男性或中性的角色，嘗試在男性父權的歷史政治領土上，爭取一席之地，而後關注女性議題，從小說到散文，都能讀到平路對於自己／女性聲音的追尋，《坦露的心》揭露她奇特的身世，從書中回溯她知曉身世，走向與母親、與自己的和解，應是 2007 年左右，對應平路的小說創作，在此之後，平路小說中男女敘事聲調變得比較活潑自在《東方之東》中敘事者為謙一（男性）、敏惠（女性），《婆娑之島》中敘事者為揆一（男性）、「他」（男性），《黑水》敘事者為佳珍（女性）、「她」（女性）。⁵⁸筆者認為這雖非平路有意識為之，然而對於將書寫視為生命追尋的重要管道的平路來說，書寫與自身生命的互相關照，自然反映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上。

第二節 在歷史的縫隙中想像

過去的官方歷史書寫常讓人誤以為歷史是連續的、統一的，傅柯提醒我們必須要對這種統一性和連續性打個問號，因為這種統一性和連續性往往是經過闡釋後的結果。⁵⁹為了達到完美的單一線性歷史，題材必然經過選擇與重組，而選擇就意味著遮蔽與抹除。

傅柯也認為：

所有的「知識」，其實都浸透了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它們是反映特定文化特徵的語言表述，在這些語言表述的背後，毫無例外地都有某種「權力」、「權威」之手在操縱控制。⁶⁰

⁵⁸ 筆者曾於 2019 年 2 月 16 日書展講座向平路請教這個假設的可能性，平路非常謙遜回應：

「我想你看得比我更清楚，作為一個創作者，對於自己理解一定沒有旁邊的人來得更清楚，米蘭昆德拉曾有一個講題『人們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當花豹自以為看清自己身上的每一處花紋，自以為自己的樣貌就是這樣，上帝就會發笑了。」

⁵⁹ 盛寧，《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6 年），頁 90

⁶⁰ 盛寧，《新歷史主義》，頁 85

因此，新歷史主義強調對以往歷史重新闡釋、重新改寫的必要性⁶¹，透過再現過往被遮蔽扭曲的歷史事件人物，重新審視歷史的多元可能性。

平路重史料，只要觸及相關背景，必然做足功課，小說中的歷史、新聞事件於她而言，並非只是放到小說中創造某些時代風情的道具、背景，而是她意欲藉此返還重建的時空；然而，相較於一般歷史小說中縝密堆砌的大量史料，平路的歷史創作又顯得輕盈抒情，她往往只選擇少數切入點，還原的不是大場面大時代，而是在那個時空中，人物做了什麼選擇。

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可以看到真實與虛構的交錯，小說中觸及的過往歷史集中在大航海時代的台灣，關注的新聞／當代歷史則是與台灣休戚相關的美中台關係與兩岸關係。

一、歷史真實

《婆娑之島》與《東方之東》中關注的歷史集中在「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早期台灣教科書中對於荷鄭時期台灣歷史的篇幅不多，自外於大航海時代的風起雲湧，強調的是漢人移墾、鄭成功擊退荷蘭人，將鄭氏父子三代的歷史放入明末變局與清初疆域征戰，不論降或戰，評判的標準皆為忠君大節。

這樣的史觀隨著台灣歷史學家曹永和在一九九〇年提出「臺灣島史」概念有所改變，曹永和認為應該將台灣島作為研究主體，才能架構一個結構性、總體性和全球性的台灣史觀：

過去的臺灣史研究，不曾看清臺灣島本身即是一個獨立的歷史舞台。歷史是由人、時、空三個因素互動交織而成的，臺灣史研究應重視海島台灣的地理特性，並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中加以探考，以建立區域總體史的臺灣新史學。⁶²

臺灣的地理位置位於東亞縱向群島的中心點，東臨太平洋，西鄰歐亞大陸，南有東南亞橫向群島，為東亞地域族群移動的重要通道，十六世紀歐洲海權列強的「地理大發現」後，海權的擴張與爭逐，更將臺灣捲入世界強權的爭奪，島

⁶¹ 盛寧，《新歷史主義》，頁 63

⁶²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台北市：中研院臺史所，2010 年 10 月），頁 159

嶼的主權因此數度易主。「台灣島史」以地理為入手，盡可能在中國史觀與漢人史觀之間找到台灣島嶼歷史裡能夠涵括的最大範圍，也強調其海島的地理型態，使得台灣在荷蘭、明鄭時期有著鮮明的海洋性格。

致力於荷據時期台灣歷史小說創作的陳耀昌，便肯定台灣在大航海時期的角色：

最近，學者與小說家紛紛認為，對於大航海時代的一些人物，如汪直、鄭芝龍、揆一等，我們應該跳脫過去中原史觀，而以世界史的眼光去評價。臺灣的歷史，一開始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所以臺灣史上的人物，有不少應該是世界級的，但被一些漢人沙文主義的學者做小了，連帶也把臺灣做小了。⁶³

這樣的史觀發展方向，除了歷史回溯時間軸的必然，也藉由納入那段荷人、漢人和西拉雅族人共存競爭的歷史，稀釋台灣與中國連結的密度，更藉由將台灣放在大航海時期遼闊的空間中，重塑台灣是大海子民的民族認同，突破被定位為大陸邊緣的命運。解嚴的影響，突破固有的思考模式，歷史學界如曹永和等人有意識地推動，原本以漢人為中心的台灣史觀逐漸挪移，轉變為關注台灣的海洋性格，不再僅有「失去中國大陸領土」一種史觀，也思考台灣在世界史上應有的位置與方向。

許倬雲認為這樣的歷史關注方向，有以下的意義：

不僅將台海歷史的前段有了交待，而其更重要的貢獻是將台灣歷史放在世界史的格局中，討論西太平洋的海權競爭。台灣歷史是今日台灣的「顯學」，可是大多研究者的角度，大致限於「本土」的視野，此書則是從國際的視野，陳述台灣早期的情形。台灣歷史研究，如果都能從本土的樊圃自拔，當可將今日的台灣意識，擴大其胸襟，則於台灣今後定位及與人相處之道，更知道其中的分際。⁶⁴

⁶³ 陳耀昌，〈從《婆娑之島》一窺「平路式幽默」〉，收錄於平路《婆娑之島》，頁34

⁶⁴ 許倬雲推薦序，收於湯錦台，《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台北：大雁文化，2011年11月初版），頁4

從許倬雲這段話裡，可以讀到，書寫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不僅僅在於建立台灣本土的歷史論述，更期盼超越「本土視野」，建立台灣的國際視野。

同樣的期許也從戴寶村的文字裡得到呼應：

台灣的歷史一直以來擺盪在海權與陸權之間，海權使得台灣與國際接軌，促使台灣躍上國際舞台，憑藉獨特的地利戰略位置與特有的產物，發展出獨特的海洋歷史文化。陸權性格的統治者，將台灣陸封在島嶼之中，壓抑、防範台灣深具的島國條件與海洋子民的天性，使得原本開放、熱情、冒險、奮鬥、進取的海洋性格被扭曲為狹隘的島嶼心態，以致自我邊陲化，失去主體性。21世紀新的海洋時代來臨，台灣應該擺脫被發現、被殖民役使的宿命，重新「自我發現」與「自我定位」，脫陸入海，以海為路，積極利用這片屬於海洋台灣的「藍色國土」，延伸連結世界，從而邁向海洋立國，建構一個真正的海洋國家。⁶⁵

小說創作的眼光與歷史界史觀的轉變與創新，相互呼應，這十年來，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文史資料以更豐富多元的方式出現⁶⁶，筆者相信這個現象並非偶然，誠如范銘如對於空間、身份與敘事關係的闡釋：

國家與領土聯繫起來必須牽涉到對風景原型的認同。自然環境在國族大義下被召喚，一方面自然化國家與領土間的紐帶，另一方面更透過視覺性技術將國家記憶賦予具體而親切熟悉的形象引導我們進入國家敘述，形構集體身份的表徵。換言之，在建構國族身份的種種技術中，領土此一原本隸屬於自然地理的絕對空間經由符號系統轉化成為某種足以投射個人或家族命脈的風景原型。⁶⁷

⁶⁵ 戴寶村，〈擺盪於海路之間的台灣歷史〉，《海洋台灣歷史論集》（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8年6月），頁36

⁶⁶ 除了文史資料外，近十年來小說創作背景設定為大航海時代，且涉及鄭氏父子與台灣者不少，例如：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紀》、朱和之《逐鹿之海》、林克明《天涯海角熱蘭遮》。台灣集資開發的桌遊《王辰之戰》以1592中日韓的衝突為背景，《海賊對決》以大航海時代各國傳奇海賊為背景，皆加入了鄭芝龍的角色。

⁶⁷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頁77

小說創作的自然環境背景，必然關乎創作者關懷的家國樣貌，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我們可以看到平路的關注轉向十六、十七世紀的臺灣，用的不是明末清初的中國政權眼光，而是大航海時期的國際眼光，書中頻頻提及的鄭氏父子海上霸權、荷蘭統治時期，以及鄭成功與荷蘭對決的熱蘭遮之役，皆為多年來國民政府教育中所忽略淡化的歷史，然而翻閱近代臺灣史，那卻是臺灣與世界、臺灣與大陸關係的重要轉折，在這段重要的時間裡，這塊土地不僅僅是換一個統治者，臺灣的海洋冒險歷史也告沈寂，轉向與大陸的聯結，原本往大海的四方想像，侷限在臺灣海峽，侷限在與一個大陸的單一思考。

彷彿在呼應這樣的社會氛圍的變化，平路提到：

那個時代令我炫惑，因為那時蒙昧初開，混沌不明，世界有各種可能，所有冒險者、探險者都會發揮最大的想像力。這是大航海時代與過去的分野，大航海時代之前，人們習慣安土重遷、船的續航力不足，所以人們的想像力局限於陸地；大航海時代之後，屬於海洋的想像力完全被開啟，人們汲汲於探索未知，世界產生劇變，譬如說，從此多了傳染病，各地原住民面臨殖民者侵門踏戶……總而言之，那是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68

閱讀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平路將眼光集中在鄭氏父子所牽動的兩個政權：消滅明朝以致鄭氏父子決裂的清朝，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建立的殖民政權。為了跳脫過去漢人中心、陸地中心、中國中心的史觀，平路借重台灣近代教育不常提及的西方史料，創作所參照的真實書籍《熱蘭遮城日誌》、《被遺誤的台灣》、《巴達維亞城日記》，書名直接出現在小說裡，書中人物敏惠在講故事時，以作者的身份強調自己的故事是照實寫，以《熱蘭遮城日誌》詳細的記實內容為證。

敏惠說：「你看，我可都是照實寫，照《熱蘭遮城日誌》的記載，隨便一個月，從大陸運貨來台灣的商船超過一百艘，台灣輸出去的貨物值幾百萬的荷蘭盾……譬如這一年，一六三八，一月二日抵達大員就有兩艘帆船，一艘從廈門來，上面有四百擔砂糖；另一艘載來蠶絲，還有黃

⁶⁸ 盛浩偉，〈想像過去，創生未來：專訪平路〉，《文訊雜誌》（2013年1月），頁33

金、水銀。⁶⁹

敏惠還特意說明當時的老師如何在《巴達維亞城日記》講義上圈出「一官」⁷⁰的名字，解釋當時十六、七世紀的西方人與台灣之間的交流。

《婆娑之島》對揆一的形象塑造大致是基準於《被遺誤的台灣》一書，《被遺誤的台灣》一書詳細的說明台江之役與鄭成功對峙時，荷蘭守軍的內部決策始末，同時曝光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總部官員的可惡顛預，造成在台灣荷蘭守軍孤立無援。內容立場鮮明，充滿個人的主觀情緒⁷¹，然而佐以相關的會議紀錄與相關文件，對當時的局勢提供了不少珍貴的資料。

另外，十九世紀教會史家甘為霖牧師所留下的《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立場與《被遺誤的台灣》類似，傾向同情揆一，強力批判揆一的政敵：

很明顯的，由於富爾堡對揆一的仇恨、巴爾維亞當局被錯誤資訊所誤導，以及克蘭克和卡烏的自私作為，導致福爾摩沙可恥地遭到忽視，進而喪失了。如果後兩人能堅守他們的崗位，事情可能會有很不一樣的結局。

勇敢的長官⁷²和部分評議員事後遭到殘酷的處置，檢察官韋那提(Philibert Vernatti)起草一份驚人的起訴書來控告他們，讓揆一嚐盡苦頭。⁷³

揆一不再僅是不敵反清復明義軍的番邦領導者，而是曾在福爾摩沙耕耘多年，受制於母國政治鬥爭，英勇保衛殖民地卻挫敗的悲劇英雄。

時間拉到當代，兩書分別藉由小說形式討論對現今台灣最重要的外交關係：「美中台三角關係」與「兩岸關係」。

⁶⁹ 平路，《東方之東》，頁 146

⁷⁰ 鄭芝龍，小名「一官」，歐洲文獻都以「Iquan」稱呼鄭芝龍。

⁷¹ 文中出現立場非常鮮明的文字，如：「雖然在國姓爺來犯之前和攻打期間，揆一長官及其評議會確實表現得一如可敬的男子漢，但一切都是枉然，他們全然逃不開在巴達維亞遭受究責問罪及逮捕下獄的命運」。揆一(C.E.S)原著；林野文譯，《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將決戰始末記》(台北：前衛，2011年)，頁 208

⁷² 此長官指揆一

⁷³ 甘為霖英譯、李雄揮漢譯，翁佳音校訂，〈揆一長官時代〉，《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台北市：前衛，校訂新版，2017年9月)，頁 144-145

其中，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歷史要回溯至國共內戰。國共戰爭中失利的國民黨政府被迫來到台灣，在台灣建立政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對峙，美國為了圍堵蘇俄及其代表的共產主義，將身處第一島鏈的台灣納入防禦體系，於一九五四年與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韓戰爆發，台灣角色更形重要。然而七〇年代美國陷入越戰泥淖中，美國政治轉向，一九七八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一九七九年尼克森總統與中國正式建交，美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美國仍以各種非官方的形式與台灣保持實質聯繫，其中美國國會於一九七九年制定了《台灣關係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其條款內對台灣安全的承諾，如第二條（b）款第（4）項：「任何試圖以和平手段以外之方式，包括經濟抵制或禁運，決定台灣之未來，將被認為乃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之一項威脅，為美國所嚴重關切」，⁷⁴然而內容仍有其模糊處，美方並沒有解釋將以「何種方式」關切，以及何謂「嚴重關切」。

鄧小平於一九九二年發表南方談話，決定中國「改革開放」的方針，中國改革開放使得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和最大投資國，中國則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和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二〇〇八年美國陷入金融危機，中國在那段時間快速成長，奠定國際重要位置，於二〇一〇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美國更加重視中國的盟友角色。

二〇〇一年美國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美國發起全球反恐戰爭，布希政府傾向與中國政府合作，此外，為了將北韓導向正式外交的軌道，美國期望借助中國的力量，二〇〇三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美，美中合作日趨密切。

台灣於二〇〇〇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陳水扁擔任總統，不管是「廢除國家統一綱領」、二〇〇二年提出「一邊一國」論，二〇〇三年台灣立法院通過公投法，二〇〇四台灣首次公投⁷⁵，都觸動美中敏感的神經，當時小布希

⁷⁴ 《台灣關係法》，原文為「to consider any effort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aiwan by other than peaceful means, including by boycotts or embargoes, a threat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rea and of grave concern to the United States;」，引自美國在台協會網站 <https://www.ait.org.tw/zhtw/our-relationship-zh/policy-history-zh/key-u-s-foreign-policy-documents-region-zh/taiwan-relations-act-zh/>

⁷⁵ 2004年 1月16日陳水扁總統宣布 3月20日舉行總統大選時同時舉行兩項公民投票，分別為：（一）台灣人民堅持台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共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你是不是同意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二）你是

政府對於陳水扁政權一再挑起海峽兩岸緊張的話語表達不滿，曾表示台灣是「麻煩製造者」。

回顧台灣、中國與美國七十年來的三角關係，定位不清，曖昧難明，且隨著國際局勢而變化，台灣由於地理位置與歷史糾葛，戰後多年來夾在兩個大國之間，無法掌控自身命運，一般國家若是希望能夠保有自身主體性，首重自身發展，然而，對台灣而言，單純的內修國政並不足以達成這樣的目標，美國與中國實力消長與競合關係，對台灣有決定性的影響。

《婆娑之島》以撲朔迷離的凱德磊案為切入點，藉此突顯美中台關係的矛盾與曖昧。凱德磊（Donald W. Keyser）生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一九六五年畢業於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主修政治學及俄羅斯區域研究，於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攻讀博士，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年主修俄羅斯區域研究及俄羅斯語，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主修中國區域研究及中文學習。⁷⁶

他於一九七二年進入美國國務院服務，曾擔任與東亞事務相關的高階職位、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副局長等職位，對東亞事務瞭如指掌，熟悉兩岸問題。自一九九〇年以來，他一直是高級外交人員，自一九九八至二〇〇四年擔任華盛頓大使級任務。二〇〇三年，凱德磊擔任國務院副首席助理國務卿（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Pacific Affairs），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其妻（Margaret P. Lyons）於中央情報局任職（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在經歷三十二年的外交職業生涯後，凱德磊於二〇〇四年九月從美國國務院退休。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專注於美國對東亞的政策，特別是中國，台灣，香港，日本和朝鮮半島。他精通中文，熟練掌握日語，俄語和法語。⁷⁷

二〇〇四年九月四日，凱德磊與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駐美中將特派員黃光勳（Michael Hung），以及台灣國安局駐美人員程念慈（Isabelle Cheng）於美國東岸波多馬克河（Potomac River）旁的登陸餐廳（Indigo Landing Restaurant）會面，並交付六頁美國政府「重要文件」，被一旁埋伏許久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帶回偵訊，程念慈配合調

不是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協商談判，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謀求兩岸的共識與人民的福祉？

⁷⁶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aparc.fsi.stanford.edu/people/Don_Keyser

⁷⁷ https://aparc.fsi.stanford.edu/people/Don_Keyser

查，交出大批由她傳回國安局並經由黃光勳簽核的機密電報，於同年九月十五日起訴，經過長時間的偵查訴訟，凱德磊以「隱匿行程罪」起訴，判刑一年又一天。

此案喧騰一時，在當時引發廣泛的討論，《婆娑之島》中的「他」即為凱德磊，沒有姓名僅以隱晦的「羅洛萊」稱呼的女孩，即為台灣國安局駐美人員程念慈。

美中台關係的複雜根源於兩岸分治的背景。由於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兩岸分治將近七十年，在現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中國大陸、並在九〇年代陸續將香港和澳門納入主權範圍，而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範圍則為台澎金馬地區。然而，雙方於法理上皆主張擁有全中國之主權，成為兩岸之間以及國際政治上的難題。

兩岸關係數度起伏，早期國共兩黨武力對峙，勢不兩立，後轉而以外交手段爭奪國際地位，早年台灣在美國的支持下擁有優勢，七〇年代兩岸力量翻轉，中美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台灣的外交空間遭受到擠壓。一九八七年後開放大陸探親，兩岸民間交流日趨頻繁，兩岸關係趨於和緩；然而解嚴後兩岸政治體制的差距，加上多年分治影響國家認同，日益滋長的台灣主體意識與中國統一意識形成對立，在台灣內部的傾中力量與本土力量也各有堅持，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堅持不放棄以武力統一，對台灣形成極大的壓力，近年來統獨議題始終是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的敏感議題。

自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公布了「關於鼓勵台灣投資的規定」，為台商赴中國投資提供了法律保障與政策條件，大批具備地緣與文化優勢的台灣人跨海工作、投資；因應需求，台灣政府自一九九〇年一月正式公布《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有條件開放台商間接對大陸投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台商對大陸投資的發展。

根據中國商務部原來的統計，截至 2008 年底，累計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金額為 476.60 億美元，佔所有外商直接投資金額 5.59%，台商名列中國第五大外商，次於港澳、英屬維京群島、日本及美國。然而，加計台商經英屬維京群島及開曼群島轉投資中國的金額後，本研究估計，累計台商對中國直接投資金額為 1,222.85 億美元，佔所有外商直接投資金額

14.34%，台商名列中國第二大外商，僅次於港澳商。⁷⁸

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台商、兩岸分隔夫妻的新聞時有所聞，島內大量台商家庭選擇全家移居大陸或者夫妻分居兩岸，衍生許多相關的議題。台商家庭的女性配偶作為兩岸流動家庭轉變的重要經驗者，不管是選擇分偶或是隨丈夫移居大陸，都面對極大的衝擊。對此已有不少研究提出討論⁷⁹，顯然是當時台灣重要的社會議題。

二、文學想像

「寫作小說一開始的動機，是因為我對那個傳奇故事很有興趣。對我而言，主要的關注是個人，個人是如此被誤解而沒有說話的餘地。」⁸⁰，這段話雖是平路針對《何日君再來》的創作動機而言，卻也可以解釋平路選擇書寫歷史／真實人物內心的態度。

現實與虛構並非截然二分的，端看記憶與話語權如何角力，當下的新聞、事件是如此，新聞、事件所累積成的歷史亦是如此，這是平路所關心的主題，因此選擇以各種方式介入已然被確認的「真實」或「歷史」，去探問這看似已固定的歷史板塊中，是否有被忽略、被隱蔽的縫隙，不被聽見的聲音。這固然與平路寫作喜好有關，在其身世曝光後，她也曾自問：是否因為自己謎樣的身世，讓她無意中在追尋那被隱蔽的歷史。

王國安認為「平路在建構主體時，是建構也解構的，所以在其中，平路其實也藉由各類語言，文字形式的『不確定性』，表現出虛實相生、真假難辨之感」⁸¹，平路對於創作中虛構與真實的拿捏，原則就在於不違背史實的虛構：

⁷⁸ 童振源、洪家科，〈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1988-2008 年〉（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2009 年 1 月），頁 7-8

⁷⁹ 王君琳〈流動的家：大陸台商女性配偶的家生活與認同〉，（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沙儷伶，〈轉變的家—兩岸分偶家庭之初探〉（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陳麗惠，〈大陸台商妻子兩岸婚姻生活經驗之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輔導教學碩士班，2003 年）。方毓秀，〈台商在台妻子教養信念及參與子女學習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彭曉筠，〈外派人員在台家庭適應歷程之研究---以赴大陸工作者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2006 年）。

⁸⁰ 蔡淑華採訪紀錄〈以小說拼寫傳奇—平路專訪〉，收於平路《何日君再來》，頁 245

⁸¹ 王國安，《臺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頁 301

史實之間的空間，就是虛構的空間……我所有想像虛構的都是在史料的縫隙之間，因為有縫隙，所以有娜娜，所以有揆一的心境，只要有史料的部分，我就不去違反他，所以我有一個自負之處，只要牽涉到史料的地方，就沒有違背它。⁸²

小說中處處印證平路的寫作策略，平路安排揆一年輕時在巴達維亞的小酒館裡與一官（鄭芝龍）有短暫的交會，從揆一的眼中，一官對福爾摩沙那個島似乎有著不一樣的感情，這樣的會面無從證實，卻也非毫無可能，在此加上一筆，讓揆一與這對父子的命運縱橫交叉，增加歷史的厚度，也讓書中人物無不（代替作者）對台灣投注千絲萬縷的情感。

依據可見的官方資料，可以讀到揆一反覆為自己喊冤，直言批判巴達維亞評議會中懦弱的小人、勇於落井下石怯於抵抗的官員，強調福爾摩沙的重要性，以及原本可以守住的殖民地台灣落入鄭成功之手。

可以確定的是揆一肯定福爾摩沙對東印度公司的重要性，認為巴達維亞評議會的錯誤決策導致失去島嶼，然而，在有限的史料中，讀不到揆一對台灣的無名眷戀，在小說中，平路在《被貽誤的台灣》一書中的史料與觀點基礎上，為揆一寫了一封封不寄的信，構建他對台灣土地的深情，虛構對西拉雅女子娜娜的愛戀，以此支撐這份揆一對台灣的濃烈情感。

相較於近年來亦著力於大航海時代台灣歷史創作的陳耀昌、朱和之、巴代等人，平路在《婆娑之島》、《東方之東》調動的歷史資料重量是比較少的，她刻意消去許多真實歷史人物的角色，選擇深入少數歷史人物的內心，因此，書中只剩下揆一的絮絮叨叨，以及鄭芝龍與順治的對話，藉此創造更大的歷史空隙，提供更多的想像與創造。

至於《婆娑之島》中美國官員「他」的敘事奠基於二〇〇四年爆發的凱德磊案，除了新聞媒體轉述美方調查報告，亦有背後帶有不同政治色彩的評論說法，比起距今已三百多年的大航海時期，年代更靠近，理應更清晰，卻因為牽涉現實美中台政治，反倒眾說紛紜、撲朔迷離。

⁸² 平路 2018 年 10 月 26 日演講，於台大台文所，講題「小說的真實與虛構——以《黑水》、《婆娑之島》為例」

以下為凱德磊案相關報導、中央通訊社報導、美國法院判決備忘錄與《婆娑之島》內文的比對舉隅，藉此理解平路透過虛構與真實的交錯，在歷史的縫隙中想像的創作手法：

相關報導	婆娑之島內文
<p>六十一歲的凱德磊，今年七月退休前，在美國國務院三十年，官至副助理國務卿，專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是個「中國通」，對美國和兩岸的「三角關係」瞭如指掌。他通曉中文，還略懂台語。</p> <p>他和台灣甚有淵源，早於三十年前還是大學生時，他就曾到台灣打工，在當時的政治大學公企中心擔任助教。</p> <p>七二年凱德磊加入美國國務院工作，之後曾三駐北京使館和兩駐東京使館，是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和芮效儉的副手。他的國務院同僚說，他駐北京時每與中國官員開會回來，一坐下來即可有條不紊地作出越洋報告，「只靠記憶，沒有筆記」。他退休前是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第二號人物，是現任國務卿鮑威爾的顧問。國務院官員說：「他晨早六時三十分就到辦公室，到晚上十時、鮑威爾都走了，他才離開辦公室。」其舊同僚都不太信他會當間諜。⁸³</p>	<p>同事們堅信他不會背叛美國，找機會替他說了許多好話。有人提到他過人的組織能力，提到說留下了深刻印象，說是某一次閉門會議後，他回到辦公室，坐下來，全憑仗記憶，立刻打出一份無懈可擊的報告。（頁 54）</p> <p>很容易就清查出來，他有一段青春時光在台灣度過。</p> <p>一九六八年，研究所畢業不久，從美國飛台北，來到史丹佛中心學語言。那時候，踏一輛自行車，騎過溫州街，騎過溫州街，騎過龍泉街、騎過羅斯福路……經過田埂，沿著一條小溪，小溪曾是「瑠公圳」灌溉水道的支線，底下的岬川水緩緩流動。他按年份一一填寫，畢業後幾年時間，其中，有一年回到美國，在國務院東亞科任職，不久又被派回到台北的大使館。</p> <p>機艙裡藏著一個黑盒子，一朝出事，故障前的飛行紀錄都要拿出來仔細檢驗。（頁 147）</p>

⁸³ 〈中國通凱德磊略懂台語〉，美國《華盛頓郵報》/《中央通訊社》（2004年9月18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40918/4316320>

	<p>他本來就知道，那班大學生朋友不乏政治上的活躍分子。那段時間，台灣的黨外運動正開始蓬勃。當時台灣是戒嚴時期，黨外活動不能公開，需要外國人幫忙傳遞消息。</p> <p>一九七七年春天，任期未滿，他被調離台灣。他只能夠暗自猜疑，調職與他做過的事有點關聯。（頁 148）</p>
<p>……美國聯邦調查局幹員去年九月起訴凱德磊將機密文件交付台灣官員並匿報台灣之行。凱德磊十二日在聲明中表示，絕對沒有將機密文件洩漏給任何人，程念慈與此也沒有任何關係。</p> <p>凱德磊說，他在二〇〇二年擔任國務院亞太副助卿時，因為工作關係認識了程念慈（Isabelle Cheng）。他知道程念慈為台灣情報單位工作，但兩人仍發展出個人關係，他不願對妻子在內的任何人揭露這個關係到什麼程度。</p> <p>凱德磊說，他於二〇〇三年九月到東亞出差時，到台灣休了幾天年假。在台灣時，他和程念慈一起四處觀光，為了隱瞞兩人在一起的事實，他在返美的入關單上匿報台灣的行程。</p> <p>他表示，去年八月他因為要再得到政府機密等級的授權而被安全官約談，當被問到他是否涉及任何可能使他容易被外國政府脅迫、利用或施壓的行為時，他回答：「沒有」。</p> <p>凱德磊承認，他和程念慈的關係雖然不當，但並沒有人因此利用他。如果真有此事，他會立即提出報告，絕不會背叛國家，尤其他從未提供任何機密資</p>	<p>有時候，他會試探羅洛來，言詞間故意露出來一點什麼，但羅洛萊眨眨眼就過去了，對重要的訊息顯得缺乏興趣。</p> <p>他已經看出來，羅洛萊對人沒有戒心，對本身身份的敏感性也無所覺。</p> <p>他想到國際關係裡一個常用的辭藻，叫做「單邊主義」。或者，從頭到尾，只是他單方面想要幫她，包括他替她想到，什麼地方需要注意、需要加強，自己願意提供一些整理出來的資料。</p> <p>至於羅洛萊，只是被動地接受別人的好意。（頁 181）</p> <p>二〇〇三年九月，從亞洲回返美國，也就是跟女孩約好，兩人在台北相會的那次，回程從杜勒斯國際機場進關，他的通關申報上，在「此次旅行所經國家」那個空格，他用原子筆寫著「中國、日本」。控方說他刻意隱瞞，才沒有在進關的表格上填寫「台灣」。</p>

<p>料給程念慈。他也了解，他和程念慈的關係會使他處於一個容易被利用的弱勢地位，應坦白告訴安全官。</p> <p>至於非法移走機密資料，凱德磊坦承在轉換職務時會把資料打包帶回家，有時為了加班也會把資料帶回去，有些極機密資料和一般資料都存放在家中地下室，這些行為都違反了相關法律。他不能為自己的行為找藉口，他所造成的傷害也難以彌補，因此他要向家人、朋友、同事及國務院致歉。⁸⁴</p>	<p>他聽著律師辯駁道，我的當事人不是欺瞞、不是謊報、不是為了掩飾什麼，根據一九七二年簽署的「上海公報」，那份公報的定義下，台灣不再是一個國家。（頁 69）</p> <p>他一向充滿自信，在這個行業裡，自己是從容不迫的老手。給羅洛萊電子信的附件，他一個字一個字檢查過，附件是公開的資料，非關美國國家安全，每一則都屬於已經解密的訊息。（頁 246）</p> <p>說是他家裡清出來三千多份加密的檔案，他自己早忘記了這些卷宗夾的存在……，還說他家裡的電腦硬碟裡還原出一些證據，都是私自帶出辦公室的秘密資料。其實，他並不是有意貯存，只是為了方便參考，其中沒有一件是牽涉到台灣的重大機密。（頁 90-91）</p>
<p>……雖然凱德磊曾經承認與程念慈有私人關係，但並未提及細節，根據檢方於 7 月 5 日提出要求推翻認罪協議的備忘錄，裡頭露骨披露兩人親密的互動情形，檢方甚至使用「他曾與程在車上從事性活動」的字眼。</p> <p>兩次「活動」發生在 2004 年 7、8 月。7 月時 FBI 跟監人員發現兩人開車到人煙罕至處，停下約 20 分鐘，期間凱德</p>	<p>車內，女孩在他旁邊。由他的手，隔著衣服，流連在那隻手想去的地方。有一次，他的嘴唇輕輕滑過她頰邊，碰到她的唇。</p> <p>「遇上你，這人生真是完美。」在電子信上，他隱晦地寫道，「晚上很完美。酒完美，晚餐也完美，妳，更是完美到無懈可擊。」（頁 104）</p>

⁸⁴ 駐美特派員曹郁芬〈與程念慈關係 凱德磊無法向妻啟齒〉，《自由時報》（2005 年 12 月 14 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48094>

<p>磊躺在放倒的駕駛座上，程女則側身靠往凱德磊，據 FBI 人員在報告中表示，程女「背部朝上，低頭程度讓 FBI 人員無法看到程的頭部。」</p> <p>8 月時兩人則停在華府一條小街上，在車裡頭動作大約也持續了 20 分鐘，期間 FBI 人員看到程女頭部同樣靠向凱德磊，逐漸無法看到她的頭部。結束沒多久，兩人分開後，凱德磊隨後打電話給程女說，「食物好吃，美酒好喝，香檳好喝，妳很好。」</p> <p>此外，兩人也有溫情浪漫時刻。2004 年 5 月，凱德磊 email 給程女，提及兩人在造訪紐約後，在一起回華府的火車上，「當妳在夢鄉時，我手繞妳肩，妳頭靠在我肩與胸上，妳手在我手裡，比豐富的報酬更棒……我現在要想辦法誘使妳 6 月來檀香山。」</p> <p>兩人的來往被檢方用「間諜手法」（espionage tradecraft）形容。但凱德磊在稍早證詞裡說，與程女在 2004 年 6 月才有身體接觸，且僅至於親吻和擁抱，他也說只有他會以性接觸的方式碰程，程並不會如此。……⁸⁵</p>	<p>他們一再用曖昧的字，形容事件中的男女關係。追問他與女孩的身體接觸，「趴下去，在車裡做些什麼？」指著一疊背影的照片，對方律師說：「雖然光線不足，不尋常的姿勢，看起來是在車裡——」他聽見一堆粗鄙的字眼，故意激怒他，讓他在答詢中一個不當心，蹈入對方設下的陷阱。（頁 76-77）</p>
<p>……凱德磊對台灣非常友好，去年十一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到華府和美國總統喬治布殊談台灣問題，喬治布殊表明反對台灣改變兩岸現狀的行動，這使台灣極為關注美國對台政策是否出現轉變。</p>	<p>他記得，還有一次，如果對臺灣懷有一點私心，他在位總統起草國情咨文時偷渡了小小一段，強調跟台灣的友好關係。布希講話時沒有用上，他猜測，那是被總統周圍的幕僚槓掉</p>

⁸⁵吳詠航，〈美高官女台諜有性活動。美檢新證：男車上躺平，女頭緊貼〉，《蘋果日報》（2006 年 07 月 16 日），<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060716/22751935>

<p>凱德磊企圖力挽狂瀾。他在喬治布殊和溫家寶會晤前，曾擬定一份講稿，希望喬治布殊在會後記者會不要說出傷害台灣的話，但喬治布殊看後大怒，把講稿揉成一團丟進廢紙簍去。</p> <p>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今次高調拘捕凱德磊，令人從陰謀論來看整件事。有分析指，國防部向來與國務院不咬弦，有人可能特意放出有關凱德磊的消息，讓 FBI 去調查。</p> <p>華府亦有消息流傳，今次事件是美國親台勢力遭打擊的表現。凱德磊只是代罪羔羊，主要是美國的中國政策可能要出現重要轉折，為了有合理的潛台詞，只好犧牲被視為較親台的凱德磊。⁸⁶</p>	<p>了，他相信與布希本人無關。（頁 55）</p> <p>當然更可能的是，問題出自美國本身，他被扯進國務院亞太部門的內部鬥爭，更關乎美國看中國問題一向的分歧點，他站上火線，無端成為「紅隊」打擊「藍隊」的犧牲品。……九一一事件之後，伊斯蘭教激進勢力成為主要敵人，美國難以兩面迎敵，主張與中國友好的一群人在對外政策中站上主流。「紅隊」聲音愈來愈大，「藍隊」只剩下少許智庫裡的學者，以及一小撮留在外交體系的官員，而他，剛好成為「紅隊」看不順眼的對象。（頁 273）</p>
<p>2004 年 8 月 17 日，當時他們的轎車停在馬里蘭郊區的波托馬克電力公司（Potomac Electric Power Company, PEPCO）附近，一位經過的路人告知他們有一位白人在貼有哥倫比亞特區標誌的車上向他們拍照。聯邦調查局為了降低他們對拍照一事的猜疑，8 月 27 日到凱德磊位在費爾克斯（Fairfax, Virginia）家中假裝要查詢關於公共反恐的活動，藉此降低他的戒心。⁸⁷</p>	<p>記得被捕前一個月，與羅洛萊坐在車裡，那一日，是在博物館一帶的停車場。突然間，有人敲他車窗，慢跑的人好心提醒，說是看見有人在附近鬼祟地拍照。他立即起了戒心，那天晚上他十分不安，第二天還特別跟羅洛萊通電話，他在電話裡說，我心裡想說五種可能的解釋，問題是，每一種解釋我都覺得不甚滿意。</p> <p>停車場有人拍照的幾天後，整樁事情有了合理的解釋。「聯邦調查</p>

⁸⁶ 〈案中案——美或改對台政策〉，《中央通訊社/台灣聯合新聞網》（2004 年 9 月 18 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40918/4316316>

⁸⁷ Memorandum in support of motion to Find Defendant in Material Breach of Aggrement and to Release the Government From Its Plea Obligation . <https://fas.org/irp/ops/ci/keyser070506.pdf>，頁 33

	<p>局」幹員造訪他的家，亮出證件，藉看他車子的註冊資料。說是恐怖組織偽造車牌，其中一個號碼與他的車牌相同。「聯邦調查局」幹員抱歉地說，現在都弄清楚了，請原諒造成的任何困擾。</p> <p>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當時，他鬆了一口氣。（頁 276）</p>
<p>聯邦調查局在測謊前於 2006 年 2 月 14 日先進行訪談。問題一為在台灣停留期間，有無與程念慈以外的人士碰面？問題二為是否非法提供外國情報員機密文件？凱德磊皆否認，但測謊員指出凱德磊明顯在說謊。</p> <p>聯邦調查局於 3 月 28 日、4 月 5 日對凱德磊進行二次測謊，同樣對他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年在台灣時，除了程念慈之外，有沒有與台灣其他政府官員碰面？第二：除了程念慈之外，有沒有與任何國安局的人員碰面？針對兩個問題，凱德磊的答案都是「沒有」，但測謊員兩次發現他說謊。⁸⁸</p>	<p>測謊器的指針搖擺著，他心裡有小小的裂隙。忘了過家安全？忘了機關所交付的使命？測謊器的指針一陣顫動。他想著，曾經有一瞬間，他是忘我、忘記了自己涉入的險境，但他十分確定，跟女孩交往中，並沒有洩漏不該說出的秘密。</p> <p>測謊器的指針搖擺著，指向那小小的裂隙？問題是那小小的裂隙。一點點非分之想，在一開始，只是一點點非分的可能性。</p> <p>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在於，與女孩之間，他在利用其中不對等的情勢。（頁 258）</p>
<p>在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信件裡，凱德磊寫給程念慈的電子郵件內容：「如果我提供的背景有所幫助，我很高興。你知道的，就像我們說的：『你的期望就是我的任務』，你需要做</p>	<p>譬如說他並不記得，怎麼樣的情況下，自己曾在電子信上寫著，「我充分理解台灣面對的困難情勢，事實上，妳的使命就是我的任務……，妳的任何要求我都會盡全力達成。（頁 53）</p>

⁸⁸ Memorandum in support of motion to Find Defendant in Material Breach of Aggrement and to Release the Government From Its Plea Obligation . <https://fas.org/irp/ops/ci/keyser070506.pdf> , 頁 21-23

<p>的就是提出要求，不管於公於私，我都 會盡快達成。」⁸⁹</p>	
<p>我國安高層也隨即進行危機處理， 立即調出凱德磊過去提供台灣的各項文 件和資料清查，但認定其中並無「超越 美國官方本來就應提供的範圍」，因此 決定將我方從凱德磊手中取得的所有文 件，全部交回美國務院進行審查。美方 事後也證實，其中並無涉及不法機密的 資料。</p> <p>我方也同時派員向 F B I 說明，因 為台美之間沒有邦交關係，台灣官員無 法進入國務院，因此雙方才會改以在官 方以外地點會面的方式交換意見，而國 務院過去也一直是採取這種模式，若 F B I 當時以為雙方是在進行情報活動， 其實是一場誤解。⁹⁰</p>	<p>他說，正因為我們國家背叛過一 個忠心的友邦，關係裡曾經充滿欺 瞞，這種不正常的心態下，才會把涉 外人員正常分享的文件，當作「事關 國家機密」（頁 79）</p> <p>根據「台灣關係法」，我們原有 義務應該要分享秘密。「台灣關係 法」是我們美國保障台灣安全的國內 法，根據這法條，美臺之間，本來就 是分享訊息的夥伴。（頁 277）</p>
<p>凱德磊的律師在提交辯護中聲明， 凱德磊並未提供情報，表明凱德磊傳送 之信件內容主要是為美國利益而推動， 並否認凱德磊擔任間諜。</p> <p>凱德磊聲稱，會有這樣的舉動是因 為他不相信美國政府會充分將訊息傳遞 給台北，並認為透過國安局是最好的方 式。⁹¹</p>	<p>只是整理出來的一些重點，屬於 台灣應該知悉的局勢變化。其實，用 意僅僅在提醒台灣這忠誠的友邦，美 國的外交政策隨時可以改變。（頁 63）</p> <p>他的意思是，若不是擔心蒙在鼓裡， 糊里糊塗地被美國出賣，為什麼需要</p>

⁸⁹ Memorandum in support of motion to Find Defendant in Material Breach of Aggrement and to Release the Government From Its Plea Obligation . <https://fas.org/irp/ops/ci/keyser070506.pdf> , 頁 10-11

⁹⁰ 吳明杰，〈凱德磊案真相大白 美大選內鬥祭品〉，《中國時報》（2005 年 7 月 25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 ... 06,00.html](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06,00.html)

⁹¹ Charles Snyder and Chang Yun-ping, " Wife of espionage suspect works for the CIA" ,Taipei Times
July 19,2006.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06/07/19/2003319437/2>

	<p>對美國持續情蒐？為什麼還需要自己的駐外人員探聽國務院的想法？他心裡希望法官聽得懂，在「台灣關係法」施行的二十多年後，美國，對待台灣，比起對待中國，我們對不起台灣這忠誠的友人。（頁 78）</p>
--	--

根據相關新聞報導、美國地方法院公布的凱德磊案備忘錄⁹²，說明「他」曾擔任與台灣相關的重要職位，及對亞洲事務的嫻熟，他承認對台灣程姓女情治人員的眷戀，以致主動將許多與台灣相關的中美相關資訊傳遞給台灣情治人員。《婆娑之島》在這個基礎上，將他塑造成對弱者充滿柔情，對美國外交有更高的情操標準，自詡為國際正義的執行者。

從官方資料中可以查到凱德磊曾在台灣求學工作一段時間，平路在這段真實的空白中加入不違情理的想像，細細描摹他這段日子在台灣可能遇見的事件，塑造他對黨外活動的同情與理解，甚至連對台灣的食物都有莫名的喜愛，年輕時期的認同與眷戀，以致「他」遇見凡事都以台灣為坐標的羅洛萊時，將對青春、對台灣、對這個女人的三種情感重疊在一起，產生了讓人難以理解的情感，平路的安排，讓真實的疑問在想像的歷史縫隙裡找到答案。

透過關注亞洲事務多年的「他」，有力質問美國是以怎麼樣的心態對待忠誠友邦台灣？為什麼長年的友邦還需要迂迴曲折取得外交上理應共同分享的資料文件？處理中台美關係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又對台灣這個島嶼了解多少？以「他」特殊的位置為台灣叫屈，相反的，也以他超然的角度，批判台灣不理解美國政治外交界，也不懂得創造自己的價值，找到自己可以施力的位置。

有時候是臺灣，自願落入由人擺弄的位置。……亟於證明存在的正當性，台灣人有嚴重的身份焦慮。所以，他想著，或者該怪臺灣，總喜歡把本身放在亟待被保護的弱勢位置⁹³。

⁹² Memorandum in support of motion to Find Defendant in Material Breach of Aggrement and to Release the Government From Its Plea Obligation . <https://fas.org/irp/ops/ci/keyser070506.pdf>

⁹³ 《婆娑之島》，頁 260

臺灣一再被貽誤的命運，除了命運的捉弄，以致身處在大國間拉鋸無可奈何的處境外，臺灣自身有沒有責任呢？平路從來不是單純情緒叫囂的作者，她也提醒臺灣：如果處境艱難，表態是否該更謹慎、手腕是否該更有智慧？

不過，平路在不違背官方資料的基礎上，追求的並非最客觀的答案，不但不給答案，甚至不斷拋出對立的質疑，挑戰讀者固定的想法。對於此案中交付的資料究竟是足以影響美中台關係，讓台灣佔得先機的機密資料，抑或是無足輕重，僅是一個盟邦可以給予的資訊提醒？究竟是凱德磊以資料引誘程念慈，抑或是程念慈主動以情感誘惑凱德磊而獲取資料？平路透過「他」的說法、控訴「他」的檢方以及為他辯護的律師，三種相左的角度，即便在呈現新聞真實部分時，也並置多種版本的說法，保有複數歷史的特質。

《婆娑之島》中雖藉「他」之口，說明美中台關係的變化與歷史，但並未過份執著搬弄史實，也無意給標準答案，而是緊扣這關係間的特性，以男女三角關係為喻，說明中美之間缺乏互信卻又不能不遷就合作，台灣對美國充滿討好卻又總是不安試探的心情，以及美國看待台灣問題的兩股分歧意見：一為同情民主的小台灣、一則認為因台灣問題損及中美合作是不智的策略。

《東方之東》裡觸及較多的兩岸議題，主線的台商夫妻故事，正是反映兩岸經濟交流產生的現象，台灣人遠赴中國經商求職，台商本身面對的文化衝擊、生存困難，台商家庭相處與延續的現實困境。此外，透過鄭氏父子降清或是自立門戶的糾葛賭注，意在言外直指台灣統獨的抉擇，亦透過台灣女子敏惠與中國男子尚軍的對談，呈現兩岸人民分治多年後分歧的想法觀念。

此外，《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對於人物確認身份的細節皆輕描淡寫，角色的名字為小美或娜娜，都是難以確認的姑且名之，其中台美間諜案的部分，或許是為避免爭議，甚至將角色的稱呼簡化為「他」與僅存象徵意味的「羅洛萊」，盡可能弱化角色的真實感。提及六四天安門事件與野百合運動，僅以「當年廣場上的那件事」名之。凡此種種細節，皆印證平路不違背史實，但無意以寫實的大河小說建構磅礴史詩，而是在歷史的縫隙中開啟想像，著力於透過深入歷史／真實人物心理，思考人性與歷史的本質性問題。

第三節 以邊緣解構中心

新歷史主義把文學視為歷史現實與社會意識形態的交匯處，相信歷史不僅是文學的「背景」，而與文學有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係⁹⁴，鼓勵創作者與文學評論者，關心歷史、社會與文學交互的作用，理解文學受到歷史與社會的影響，也反映歷史與社會。王岳川在〈蒙特洛斯：歷史與文本〉中提及：

文學的意識形態對歷史的介入是一種政治態度的參與，因為，觀者、聽者、讀者都在進行一種文學的共謀，即在對經典作品的顛覆性闡釋中重新認識經典，並分離出自己的文學主張，這種文化『顛覆』的特質，構成歷史解釋的本質，深藏於特定的作品意義符碼和整個文學思想體系中。⁹⁵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政治爭鬥的勝利者除了握有當世的權力之外，也掌握對後世陳述的話語權，當正統官方歷史書寫當權者、勝利者的歷史，新歷史主義對抗的是傳統大寫的官方歷史，在新歷史主義創作與解讀方式裡，刻意避免接收單一的價值，而是鼓勵「顛覆」單一正確的道路，以多角度的解讀方式嘗試建構更完整的歷史，讓被忽略的歷史找到聲音。因此，新歷史主義關注歷史上的小人物、失敗者，而非舊歷史主義強調的大事件、所謂偉大人物及宏偉敘事，一如張進在《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所說：

新歷史主義向那些游離於正史之外的歷史裂隙聚光，即試圖攝照歷史的廢墟和邊界上蘊藏著的異樣的歷史景觀。他們把過去所謂單數大寫的歷史，分解成眾多複數小寫的諸歷史，從而把那個非敘述、非再現的歷史，拆解成了一個個由敘述人講述的故事。⁹⁶

由此看來，書寫邊緣人物以解構中心歷史為新歷史主義書寫的重要策略。

平路的書寫關懷在歷史中被遺忘的、邊緣的人物與事件，她過去以《是誰殺了XXX》、《行道天涯》、〈百齡箋〉一系列名女人書寫，開啟新歷史主義

⁹⁴ 盛寧，《新歷史主義》，頁 26-27

⁹⁵ 王岳川，〈蒙特洛斯：歷史與文本〉，《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頁 184

⁹⁶ 張進，《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7

的書寫，從歷史的裂縫中灌注新的想像，透過必須噤聲／為黨國發聲，卻無法為自我發聲的女性，將高高在上的黨國神話請下神壇，藉此顛覆單一論述權。

許多評論者將平路與施叔青此類的寫法稱之為「以小搏大」⁹⁷，然而，筆者認為兩者又有些許不同，施叔青以考據歷歷的真實歷史作為背景，多以名不見經傳的虛構小人物作為主角，大量史實的考證雕琢出來的背景，使得虛構的人物在歷史的真實中合情合理前進，施叔青寫人在歷史的變動中，如何存活、既卑微又強韌。平路選角則偏愛「中心邊緣人物」，直接以歷史或新聞存在的真實人物作為主角，然而，以焦點中心旁邊的人物來掀起另一種角度的思考，或是挑戰焦點人物的其他面向與可能，意即挑選那些身處新聞中心、歷史中心卻又無法為自己發言的人物，例子包含從依偎在國民黨統治者身邊的女人宋慶齡、蔣宋美齡、章若亞，席捲華人的大明星鄧麗君，到媽媽嘴事件中的女性兇嫌⁹⁸，太多官方／主流的語言詮釋她們，然而平路更關心的是：她們內心真正的渴望是什麼？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有同樣的手法，可以清楚看見平路以邊緣解構中心的企圖。

首先，近代中國或台灣的傳統官方敘事裡，是以陸地為中心，關於海洋的部分不是闕而弗論，就是語涉「海盜」、「倭寇」、「海難」等負面字眼，中國對於飄洋過海的移民或是海商，多半也抱持較為負面的看法，因此，海洋史從來就不是官方敘事的中心，然而，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多重敘事線中，皆有一條敘事線以大航海時代的台灣為背景，對於海洋背後帶來的貿易與豐美之地，語調熱切。如揆一細數台灣於海上國際貿易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何從中獲取高額利益：

稻米、蔗糖等作物在碼頭上堆得山高。轉口貿易獲利尤豐，從福爾摩沙到日本一地，每年載運總值高達兩百多萬荷蘭盾。有些貨物在台灣包裝，打上公司的商標，到日本脫手，換回日本的白銀與銅。白銀存放台灣一陣，運到中國，購買絲織品與茶葉瓷器等等，再運到歐洲市場。碼

⁹⁷ 簡瑛瑛、吳桂枝，〈華語語系女性歷史書寫與跨文化再現：從施叔青《台灣三部曲》到平路《婆娑之島》〉，頁 1-15，整理陳芳明與范銘如的相關評論，提出研究者對施叔青與平路歷史書寫的評論裡皆出現「以小搏大」的關鍵字

⁹⁸ 平路，《黑水》（台北：聯經出版社，2015 年 12 月），取材自台灣「媽媽嘴命案」，以媒體大肆報導批判的女性兇嫌為敘事者。

頭上裝卸各地珍奇，單單瓷器就超過二十萬件……那時候，公司是以福爾摩沙為支點，連起一張全球貿易網。⁹⁹

同樣的狀況出現在鄭芝龍向順治皇帝描繪海洋壯闊與海上貿易，打破單純的陸地政權想像。對於海洋的關注便已選擇非傳統的陸地中心視角。

此外，平路透過靠近政治中心卻又被權力放逐的幾個歷史人物，想像另一個不屬於大歷史的小敘述。鄭芝龍、順治都是官方歷史中足以扭轉局面的重要人物；擔任台灣總督的揆一、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他」，都曾手握重權，對台灣的發展有關鍵性的位置。然而，他們因為不同的原因，在官方大歷史裡失去論述權，平路關心他們的失敗與失語，重建從政治失敗者的角度所書寫的歷史。

相反的，兩本書裡都有鄭成功的淡影，不管是作為揆一的主要對手或是鄭芝龍口中的森兒，卻都沒有讓他發言。鄭成功在清初被塑造的形象是叛賊內臣，然而到了康熙之後，便肯定其忠義，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運動展開之後，鄭成功反清復明的色彩，符合孫中山「驅逐韃虜」的宣傳口號，一九三〇年代中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鄭成功「收復台灣」的形象，暗示抵抗帝國主義、收復失土的決心。

平路於散文〈電音三太子時代的鄉愁〉中提到鄭成功的特殊形象：

今日海峽兩岸從他身上各取所需。對岸紀念他，取他大敗荷蘭紅毛番，把台灣拉回祖國懷抱，放在民族教本或統戰語境裡都是標竿人物。台灣則取他孤土孤忠的硬頸。讚他復興基地的眼光、譽他放手一搏的海島經營，延平郡王祠裡四時祭祀，匾額寫著「開台聖王」，儼然夠本土，算我們的保台英雄。¹⁰⁰

國共分治後，對立的兩方分別在鄭成功身上找到利於宣傳的特質：在台灣的國民黨藉其「恢復中原」之志，合理化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基本國策；在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則藉其「驅逐帝國、收復台灣」，強化「解放台灣」的論調

⁹⁹ 平路，《婆娑之島》，頁 170

¹⁰⁰ 平路，〈電音三太子時代的鄉愁〉，（2011 年 6 月 15 日），轉載自平路個人部落格 <http://mypaper.pchome.com.tw/lupingbox/post/1322233493>

¹⁰¹。這都是以陸地思維、政權中心去思考，依據統治者需要塑造為政權服務的形象。

相較於鄭成功在兩岸官方歷史中被英雄化、神話的形象，鄭芝龍始終不是官方歷史主要著墨的對象，陳芳明就曾解讀這樣的現象：

比起鄭成功在廟宇的鼎盛香火，甚而延伸出許多降生時紅光燭天，長大後斬妖伏魔的神蹟，鄭芝龍儘管威鎮八閩海域，卻始終不曾修成正果！生時在菜市口被劊子手處決，死後，還繼續當反面教材被人厭棄。¹⁰²

鄭芝龍缺乏符合官方宣傳需要的特質，其成功並非來自傳統倫理，其抉擇也無關皇家忠誠。他白手起家，遊走中國沿海、印尼、日本、台灣，北起日本海、南到麻六甲一帶，都是他的勢力範圍，通中、日、荷、葡語，往來的是無國界的海洋，並未仰賴攀緣任何傳統，政權遞嬗時衡量的是自身處境而非民族氣節。

過去的中國中心思維，肯定鄭成功反清復明、心向漢人陸地政權，就如同書中角色大陸男子尚軍所說「虧得是他兒子鄭成功，把台灣拉回來了」¹⁰³，然而平路在書中宣揚的是海洋中心的思維，藉台灣女子敏惠提出「站在大歷史的角度，與外面的海權世界接軌，鄭芝龍代表的才是更開闊的視野」¹⁰⁴，透過書寫，肯定非正統的鄭芝龍及其代表的海洋思想。

另一位歷史邊緣人物是順治皇帝，照理來說，作為皇帝的角色是歷史中大寫，但由於順治皇帝在位時間短，實際掌權的時間更短，因此在歷史上所佔的篇幅也少，所流傳下來的史料有限，相對於康熙、雍正、乾隆等清代皇帝，他在君王政治中相對邊緣。

《東方之東》選擇鄭芝龍與順治皇帝這兩個在官方歷史中較不被重視的角色，作為對話的兩端，巧妙地從兩個人可能的歷史交會處找到縫隙，滋長出自己的想像。

¹⁰¹ 陳芳明，〈鄭成功與施琅——台灣歷史人物評價的反思〉，收於《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11年9月，二版），頁335-356

¹⁰² 平路，〈電音三太子時代的鄉愁〉，轉載自平路個人部落格

<http://mypaper.pchome.com.tw/lupingbox/post/1322233493>

¹⁰³ 平路，《東方之東》，頁151

¹⁰⁴ 平路，《東方之東》，頁151

《婆娑之島》中的兩位敘事者揆一、「他」本握有中心的位置，身上重疊著西方、強權國家、男性、掌權者等數個代表權力的身份。然而，與台灣的偶然遇合翻轉他們的生命，使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成為放逐者、階下囚，在自己的族群中成為「他者」，說明是「他者」才能認同在世界上一直作為「他者」的台灣，或者說是凡是認同台灣的，就必然成為權力中心的「他者」，必須與強權為敵。

第四節 小結

傳統官方歷史書寫的多以政治事件、政權移轉、重大戰爭作為中心，新歷史主義卻透過書寫瑣碎軼事、邊緣人物，解構原有的宏大歷史，且有意識地將文學創作與社會歷史、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加以連結：

新歷史主義是一種注重文化審理的新的「歷史詩學」，它所恢復的歷史維度不再是線性發展的、連續性的，而是通過歷史的碎片尋找歷史寓言和文化象徵。就其方法而言，它總是將一部作品從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來，將其置於同時代的社會慣例和非話語實踐關係中，通過文本與社會語境，文本與其它文本的「互文本」關係，構成一種新的文學研究範式或文學研究的新方法論。¹⁰⁵

平路關心歷史與台灣處境，在其創作軌跡上清晰可見，《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延續這樣的關懷，並且刻意在形式、內容上，顛覆僵化的歷史，鬆動定為一尊的官方說法，其選擇的題材更是與當代社會緊密相連：

一、多變的形式使解構閱讀更加可能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在形式上採取多元敘事，運用不同國籍、身份、時代、性別的敘事者，反映他們看待歷史的態度，呈現歷史的多元思考；精巧安排可拆解重組的小說結構，使得小說有多種閱讀組合，《東方之東》的書中書形式亦創造更多層次的思考；此外，不管是運用意識流進入敘事者思

¹⁰⁵ 王岳川，〈格林布拉特的理論〉，《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頁 158

緒，或者穿插敘事時間的跳動，都破壞流暢的時間感，提醒讀者歷史與敘事的斷裂與不規則。

兩書透過多變的形式在無形中解構統一連續性的閱讀，使得解構歷史的閱讀變得更有可能。

二、採取歷史縫隙與論述邊緣作為內容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乍看之下並未堆砌厚重史料，以抒情的筆調、個人的情感為脈絡，然皆在不違背現有史料資料狀態下，在歷史的縫隙裡構築想像，平路提到曾在誠品講堂開了一堂「虛構／解構／建構」的課程：

誠品書店剛開始一期連續兩三個月的誠品講堂，我自定的講題是「虛構／解構／建構」，每一個子題講好幾堂課。從那三個子題，大致可以回想起那幾年之間自己思維的脈絡：面對台灣社會諸多僵化的既有架構，總希望先一樣一樣將之「虛構」，再試圖「解構」，一條一條析出其中的理路，然後再重新「建構」更理想的社會模型。¹⁰⁶

建立在現實上的虛構，試圖解構僵化的既有架構，透過這個過程辯證更本質性的問題，探究不同可能，試圖建構更理想的現實。《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內容出發自歷史的縫隙與論述的邊緣，所有的想像虛構都奠基於對歷史單一真相的質疑，與對於歷史多面向的追尋。

此外，兩書皆選擇主流論述之外的邊緣人物作為發聲者，顛覆主流的論述角度，反映平路對於歷史弱勢的關懷，以及從不輕易為主流收編的批判創作態度。

三、選擇的題材與當代社會演變的關聯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說：

如果人們沒有感知一個作品如何重複自己，那麼，那個作品實際上幾乎是不可感知的，因而同時也是不可理解的。正是對重複的感知，才使藝

¹⁰⁶ 平路，〈碎屑九〇〉，《香港已成往事》，頁 54

術作品變得可以理解。¹⁰⁷

正因為創作者有念茲在茲的中心信念，因此即使在不同作品中，也能讀到作者重複為信念發聲，而閱讀平路碰觸歷史政治的作品，不管在形式或內容，都能感知到作者的存在。

透過敏惠與尚軍討論鄭氏父子的故事，讓台灣女子對大陸男子說：「我們臺灣，就從那時候起，捲入的常是幾個完全不同的歷史脈絡」、「被推到中國外面，台灣是這樣一塊『無主之地』」、「站在大歷史的角度，與外面的海全世界接軌，鄭芝龍代表的才是更開闊的視野」¹⁰⁸，讓大陸男子對台灣女子說：「虧得是他的兒子鄭成功，把台灣拉回來了」，甚至大刺刺問：「你們那小島的收場」。談的人看來自然，對於身處敏感位置的台灣人來說卻是處處機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言語來往之間談的早已不是大航海時代的歷史，而是當今台灣面臨的處境。

熟讀平路新歷史主義作品，熟悉平路關懷的議題，自然清楚明白：這已非書中人物在說話，這顯然是作者將自己的哀傷與喟嘆放到書中人物口中，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

平路對於歷史的關注，對於台灣的關懷在筆下反覆出現，《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將眼光放在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反映台灣建立主體性的渴望；兩書皆觸及台中美關係、兩岸關係，則反映台灣現實的困境。

¹⁰⁷ 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程巍譯，《反對闡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頁41。轉引自林麗如《歷史與記憶——舞鶴小說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11

¹⁰⁸ 平路，《東方之東》，頁150-151

第三章《東方之東》與《婆婆之島》中的空間意涵

傳統的歷史觀把時間當作唯一的座標，相信以時間為軸線紀錄的史實不容質疑。為了對抗時間的單一性，空間敘事興起，關注人與空間的交互作用，強調空間對於人與歷史的影響，以及人與歷史怎麼改變空間。「空間形式的小說拒絕時間對空間的蠻橫統馭，更重視組成作品的藝術手法，包含打斷時間順序、忽略情節發展、重視行動背景等」¹⁰⁹，挑戰原先以「時間」作為連綴事件、編寫歷史的單一線性思考方式。

因此，空間不僅僅是客觀的空間，空間與居住其中的生命，空間與其中的歷史文化都不可避免的產生互動，傅柯肯定空間論述的重要性，認為人類的生命、時代和歷史的進行都必須在居住的空間中發生，且提出三種空間的概念：真實空間、虛構空間，與異質空間。其中異質空間意義遠大於真實空間，其意義是被建構的、經過解釋的，傳遞文明所要傳遞的訊息，因此，有意識閱讀與分析異質空間的存在，才能真正靠近我們生活空間的真實與虛妄。

空間與人文交互作用，空間裡摻雜人民或政府有意識的安排與塑造，加入各自的階級、文化符碼，因此，空間成了認同的領域，與特定的身份角色互相指認，「空間是身份認同建構發生的基地以及認同的指標之一。身份的形成是一連串空間置位過程的指認，既是對既有空間的接受也是關於空間象徵的創造。」¹¹⁰，空間與個人的自我認同有著緊密連結，從不同角色中在空間中的展現，也可以一窺其「空間政治」。因此，空間的書寫，不僅止於營造氛圍背景的消極作用，而有更積極的意涵，反映社會與政治關係中的「權力」與「秩序」。

陳芳明進一步提出，相較於男性書寫者，女性作家的空間意識更強烈：

男性的時間觀念是透過道德、倫理、人格、傳統等等抽象的思考作為線性的延續，道德、法統之類的繼承關係，構成男性歷史的主軸。這種時間觀念，乃是男性權力相互傳遞的秘密伎倆。女性書寫一旦崛起之後，男性的時間意識立即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女性已經能夠理解，男性對於時間的定義，絕對不可能屬於女性，要挑戰道德權力式的歷史

¹⁰⁹ 黃自鴻，《小說空間與台灣都市文學》（台北：學生書局，2015年），頁39

¹¹⁰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出版，2015年），頁71

書寫，女性開始以空間意識進行書寫，偏離男性支配的軌跡。¹¹¹

陳芳明相信歷史的再書寫中，女性傾向選擇以空間意識對抗男性慣用的時間意識，挑戰原有的歷史解釋方式，以逃脫男性長期支配的敘事傳統。

平路對於空間議題的關注，已有相關研究：張襄君《從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平路小說中的空間》¹¹²，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分析平路小說中的空間裡的女性主體性與困境。林欣筠《論平路、李昂、虹影新歷史小說的書寫策略》¹¹³，有一層面探討三位女性作家如何以空間敘事呈現歷史語境的書寫策略。平路延續對於空間的關注，在《東方之東》、《婆娑之島》裡有許多空間的書寫，跨越古今以及國界，小說中透過跨國移動的幾位角色，以外來者的眼光審視辯證空間透露的訊息。

《東方之東》書中人物基於不同理由在不同的空間中移動交會，帶著過去的空間記憶展開對話。敏惠為了尋夫，從台北移動到北京，謙一無盡的逃亡，從台北逃到北京、又再從北京逃亡到澳門；鄭芝龍往來海上，大半輩子穿越海洋往來台灣、中國、最後受困於榮寵的北京城，順治從北京的紫禁城向東走，逃往不知名的東方之東。

台商夫婦進入大陸，在不屬於他們的國度空間裡有一個並不真正屬於他們的空間：謙一和許多被派赴至大陸工作的台幹一樣，有自己小小的公寓，尋夫的敏惠住進臨時的飯店空間，不是落地生根也非旅遊，非主動自願地進入，在大陸有一塊小小的暫時居住之所，而尚軍以躲避國保（國內安全保衛系統）為由要求躲進敏惠的旅館房間，無獨有偶，歡場女子小美以躲避黑白兩道追殺的迫切理由，逃到謙一的公寓。遠離家園的謙一和敏惠以自己並不真正擁有的空間庇護理應在屬於這個國度的小美和尚軍，不穩定的空間中，所有人都流離失所，庇護與相守也顯得動盪不安。

另一條敘事線中，在敏惠筆下的故事裡：縱橫海上的鄭芝龍，面對來自草原的滿族皇帝順治，心中各有固守的空間記憶，兩人在金碧輝煌的紫禁城裡展開對話。

¹¹¹ 陳芳明，〈生命的繁華與浮華〉，《烈愛真華》（台北：聯經出版，2002年），頁1

¹¹² 張襄君，《從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平路小說中的空間》（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4年）

¹¹³ 林欣筠，《論平路、李昂、虹影新歷史小說的書寫策略》（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婆娑之島》裡，「他」從美國來，兩次長住台灣，又回到華盛頓任職，因涉入台美間諜案而入獄一年零一天，出獄後獨自一人居住；揆一為了夢想，從瑞典奔向充滿庶民希望的阿姆斯特丹，在公司的調派中往來東亞各地，台灣是他的榮耀與挫敗，因為丟失台灣而遭到流放，晚年在家人奔走營救下回到阿姆斯特丹。

平路選擇的時代背景，讓她的人物不僅擁有跨國移動的經驗，對於另一個空間的眷戀，也讓他們隨時比對自己的記憶、連結情感。以下針對台灣、北京、澳門、荷蘭幾個地理空間，以及政治空間、情欲空間、家屋等概念空間，分析《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出現的空間，及其背後的寓意。

第一節 地理空間

以下分別針對台灣、北京、澳門、荷蘭幾個不同的地理空間，分析平路在小說中透過對於空間的描摹，探究背後所傳遞的訊息。

一、台灣——充滿眷戀與回憶的空間

在平路創作中，「空間」一直是重要的主題，對於台灣的依戀也常以對「空間」的想念呈現。〈玉米田之死〉中，異鄉遊子陳溪山在玉米田咀嚼童年裡甘蔗田的鄉愁記憶，然而遠在異鄉的玉米田畢竟不是家鄉的甘蔗田，這樣虛妄的追求，空間的錯置，讓他最終只能在美國的玉米田裡絕望的死去。《何日君再來》中的大明星特意到泰國，只因眷戀童年時雨季的台灣：「『你知道嗎？雨季到了，暴雨下一陣，河裏的水漫上來了。』她自言自語，為什麼拉你來到這裡，因為好像我們台灣啊。偎在男人身邊，好像回到了家，我們台灣多年前就是這個樣子……」¹¹⁴。〈驚夢曲〉中復活的台灣人醒來後心心念念的就是故土故人，一心期盼能夠回到臺灣，寄託情感的空間是「那夢寐難忘的、一葉青綠浮在水面上的台灣島。那蔚藍的海水……那海水，於接近陸地的地方變幻出奇異美麗的顏色」¹¹⁵、「種著夾竹桃與玉蘭花的院落」¹¹⁶，島國意象不斷在主角無限依戀的思考中浮現，但是等他真正回到家鄉，才發現所有的記憶不復存在，整座島嶼被改造成如迪士尼樂園一樣的娛樂景點，所有的故鄉記憶都被商品化、娛樂化。「〈驚夢曲〉中的臺灣在所有歷史、文化都被去脈絡化之後，

¹¹⁴ 平路，《何日君再來》（新北市：印刻，2002年），頁122

¹¹⁵ 平路，〈驚夢曲〉，《玉米田之死》，頁142

¹¹⁶ 平路，〈驚夢曲〉，《玉米田之死》，頁134

成為了一個『無地方感』的地方，同時也變成了消費邏輯掛帥的『通俗空間』」¹¹⁷，主角無法承受記憶的空間不再，無法再痛苦的活下去，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在巨星的年代〉中，「我」在北迴鐵路的旅程中，「望著浮在霧裡的龜山島：斜插的山與碧色的海之間是並不開闊卻無限秀美、豐饒的土地」¹¹⁸。「我」被深深打動，從此之後，這個景象成了他「枯澀心腸中的田田青綠」¹¹⁹，對於家國的情感，也投射在空間的依戀上。

這些角色對於台灣的眷戀透過空間的記憶連結，成為生命底層永遠的吶喊。

《婆娑之島》與《東方之東》的敘事現場雖然都不在台灣，但透過人物角色的情感記憶，台灣的身影在書中時時可見。《婆娑之島》透過兩位西方男子對台灣空間的描畫，傳遞他們對台灣的關注與眷戀，其實也投射了平路對於台灣的感情，就像台灣女人「羅洛萊」一般，即便沒有壯闊山河，那個多風多地震的島嶼仍是平路心中唯一的座標。

《東方之東》中，鄭芝龍記憶裡的台灣是三百年前的大員，有著閃耀明亮的海水，熱情的女人，大員港作為他海上王國的轉口站，數量龐大的貨品帶來的是繁榮的金流。

《婆娑之島》中，台灣的空間反映著人的心境。在揆一自覺精力旺盛的時期，筆下的臺灣島也是山脈險峻奇崛、溪水奔騰，森林茂密的野性島嶼，島上的紅花也是待人吸吮的豐碩多汁，充滿野性原始的魅惑，危險卻誘人：

正午陽光熾亮，照在說不出名字的花朵上，花心透出眩目的紅艷。闊葉植物滋意攀爬，在葉子頂端伸出一隻壯碩的雄蕊，果實熟得飽滿多汁，隨時溢出香氣，碰一碰像要爆裂開來……¹²⁰

寫的是福爾摩沙的地貌，也是揆一的生命力，以及與娜娜之間原始卻熾熱的性與愛，作為台灣這個島嶼的統治者，他細數這個空間裡的建設與經濟，他也曾

¹¹⁷ 楊勝博，《幻想蔓延——戰後臺灣科幻小說的空間敘事》（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5年3月），頁132

¹¹⁸ 平路，〈在巨星的年代裡〉，《五印封箋》（台北，印刻出版，2004年），頁52

¹¹⁹ 同上註

¹²⁰ 平路，《婆娑之島》（台北市：商周，城邦文化出版，2012年9月），頁156

期盼鬱金香、荷蘭馬在台繁衍，用人為的方式促使荷蘭物種血脈在這異國空間的蔓延，讓荷蘭與台灣在政治上更加緊密連結。

只是福爾摩沙「複雜的地形像一座迷宮，足以讓外來的統治者迷途、讓外來者走不出去。」¹²¹，傳說中替台灣命名為福爾摩沙的葡萄牙水手在歸程中迷途，揆一也在台灣走向命運的交叉點，彷彿聽見海妖而迷惑失途的水手們，永遠無法翻身。

揆一在熱蘭遮城的最後幾個月，困守在城堡之中，海島上的初冬是這樣的：

海水突然有不合時的潮熱。寄居蟹從沙裡爬到岸上，沿著城堡外緣，鑽入蚶殼灰與糯米汁黏合的城牆縫隙，接著爬進堡內、鑽入他的床褥。惱人的還有一種不分四季的長腳蚊子，叮一口就是紅腫的硬塊。熱蘭遮城近海沙洲上雜草叢生，長腳蚊子總在黃昏後嗡嗡來襲。¹²²

空間裡面寄居蟹、長腳蚊子侵入堅固的城堡，呼應著他當時面對鄭成功大軍圍城的困境。然而，諷刺且荒謬的是，他所據以抵抗外侮的堅固城堡竟是「沙洲上的城堡」，理應不能被搖撼的堡壘，卻蓋在隨時會被沖刷的沙洲上，只因考量能由水道迅速撤離，象徵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於福爾摩沙的統治，從來就不是考量長久之計。所有的挫敗也在空間中呈現，要塞夷為平地、城堡坍塌荒蕪，原本豐沛的野生動物驟減、暴雨成災，他美麗的福爾摩沙在錯誤的決策中被辜負，與他一起頹然挫敗。

不管是以揆一或是鄭芝龍的眼光來看，大航海時期的台灣／大員／福爾摩沙，是充滿野性與機會的地方，是「大發現時代的一處橋頭堡」¹²³；對比清領時代可輕易割讓放棄的台灣，或是日治時代、白色恐怖時期悲情無助的台灣，大航海時期的台灣有著截然不同的視野，平路刻意描摹另一種台灣的面貌，將充滿冒險與挑戰的海洋台灣帶到讀者眼前，向她最關心的台灣人民展開。

《婆娑之島》的其中一條敘事線，從「他」的眼光看見六、七〇年代的台灣，那是他的青春歲月，也是台灣民主的青春歲月，騎著腳踏車經過的是「島

¹²¹ 平路，《婆娑之島》，頁 107

¹²² 平路，《婆娑之島》，頁 58

¹²³ 平路，《東方之東》，頁 186

上常綠的樹，火一樣耀眼的鳳凰木，還有山坡地上細而高的檳榔樹」¹²⁴的純樸自然，「他」記憶裡師大附近的平價牛肉湯、台中夜市的蜜豆冰，再平凡不過的庶民食物，妝點西方男子回望台灣的多情眼光。除此之外，台灣隱隱騷動著的民主文化大躍進，則透過明星咖啡屋、錦州街的酒吧、泛著模糊水光的中山北路以及那些缺乏清楚地名的抗議現場，片段交錯呈現，七〇年代的台灣樣貌透過他眼裡的空間物件立體起來。

「他」對台灣的空間記憶，紀錄了那個表面純樸安靜，其實已開始騷動不安的台灣。沒有過多的言語，「他」和台灣的大學生達成政治理念的默契，以外國人的身份為異議份子傳遞訊息，「他」也曾到過衝突的現場，親眼目睹棍棒與催淚瓦斯齊發的畫面。

平路在〈台大八〇〉一文中曾回憶道：

鬱悶的年月中，包括與所愛的人在一起，都伴著隨時會出事的緊張。接踵而來的幾年，黨外運動正在島上星火燎原，我的朋友以及他的同志們常在電話裡磨刀，說要磨刀給那些竊聽者的特務聽，在朋友身邊，我感覺到大變動前夕的惶惶然。¹²⁵

平路將自己當時所見所感的台灣騷動，換一個視角，交給《婆娑之島》的美國人「他」去感受，以旁觀者的眼光為台灣留存記憶。

《東方之東》中的敏惠，看到的是解嚴之後九〇年代狂飆的台灣，一場又一場的抗爭，議題包含農運、工運、居住正義，抗議的現場「卡車的喇叭開始大聲控訴，滿地滾著抗議的大白菜，警察與民眾隔街對峙，棍棒與石塊一齊飛，圍起拒馬，拉開鐵絲網，一捆捆蛇籠」¹²⁶，她跟著人群遠遠看過熱鬧，一九九〇年的野百合運動裡的靜坐參與者是與她同齡的同學。

平路曾說：

好像我們那一代人的宿命，屬於這整整一代台灣人始終不能脫離的社會氛圍：從戒嚴、解嚴到全面民選、政黨政治，我們這一輩台灣人的經

¹²⁴ 平路，《婆娑之島》，頁 148

¹²⁵ 平路，〈台大八〇〉，《香港已成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5

¹²⁶ 平路，《東方之東》，頁 113

歷，如此巧合地與台灣民主化運動平頭並進。¹²⁷

從《婆娑之島》的「他」到《東方之東》的敏惠，他們對台灣空間的記憶連綴成平路口中「這一輩台灣人的經歷」，從戒嚴到解嚴，從黨外運動的衝撞不安到解嚴後百花齊放的各式議題，平路以空間裡真實的衝突銘印台灣民主化的時代記憶。

從《東方之東》到《婆娑之島》，台灣既是脆弱的家空間，亦是豐饒多汁的野性空間，在安適的表層之下有著時代騷動與不安，即便敘事者非台灣人，即使事件與對話發生的地點不在台灣，台灣仍舊是平路一貫關注的空間，筆下人物對這個空間有著難以言說的情感與眷戀。

二、北京——古典與現實矛盾衝突的空間

敏惠的北京印象非常兩極，一方面她沈迷於象徵舊文化傳統文學的空間：紫禁城、祭壇、北京胡同、小門樓，學歷史寫故事的她在這些空間上架構了自己的想像，為了寫故事，她走進紫禁城揣想順治生活，在舊城牆與小門樓想像末代皇帝與婉容皇后的落寞與孤單；另一方面，重視空間經營的她又非常敏感的意識到北京空間的粗糙，在北京的旅館裡，「每個電梯口，立著碗口鋪一層白砂石的煙灰缸。到了晚上，上面堆起保麗龍碗，周圍堆了果皮、煙蒂、發出餿味的食物，擠扁的錫紙包中間，流淌著油膩的湯料」¹²⁸，另外，敏惠以日本的飲料帶來的安心，對比在北京喝個水繞個老半天、被服務員奚落，因此還得狼狽地搬礦泉水回旅館房間，感嘆「做最簡單的日常小事，總是像揣著一顆心。」¹²⁹，這份對北京的不安從空間瀰漫開來。

一方面是帶著傳統文人想像的文化帝都，一方面則是北京現實空間的衝擊。這兩者的情緒乍看之下衝突，卻真實反映台灣人對大陸的複雜情緒，長久以來受到國民黨灌輸的教育，這一輩的人多半對傳統中國有自己一廂情願的想像，加上某些歷史文化的連結，當台灣人初踏上大陸這一塊自以為熟悉的土地，往往因此而產生嚴重的落差感受。

¹²⁷ 平路，《香港已成往事》，頁 46

¹²⁸ 平路，《東方之東》，頁 40

¹²⁹ 平路，《東方之東》，頁 40

對於北京這個空間，台灣人敏惠和大陸人尚軍有著不同解讀，敏惠心中歲月悠長的「銀碗胡同」、「蓑衣胡同」.....，是尚軍文革時期的「大躍進路」、「輝煌街」。敏惠的北京充滿浪漫古典的中國符碼，尚軍的北京，卻到處是商業化的娛樂符碼，充滿異國風情。同一個北京，在敏惠眼中掇集如此中國如此古典的樣貌，在尚軍嘴裡是截然不同的歷史印記與現實，這源自於兩岸多年來分隔的經驗，也由於兩岸政權各自用極端的方式灌輸人民符合統治需求的資訊，因此，兩岸人民都以為了解對方，真實溝通時卻不免感到失落與挫敗。

即便是真實空間，也會因為儀式、文化或政治性的意義，通過社會的轉譯，而使其脫離了原本單純的真實存在，除了統治者、規劃者的力量外，也有使用者的解讀力量：

色鐸認為空間是由無數的行為所造成，所有的空間都帶有人類意圖的記號，與其將重心放在社會控制的技術與機制，不如揭示個體或群體的分散的、善變的秘密實踐形式。色鐸當然不否認空間秩序的強制力與建構性，但是即使在都市這種被嚴格規畫管理的城市，使用者總能夠從既定的符徵中自行篩選斷句、排列組合、變化為自己私密的景觀與需求。¹³⁰

使用者的解讀又免不了受過去被建構的史觀與經驗所影響。台商夫妻到中國大陸，於現今的兩岸政治中，就帶著出國／歸國的複雜性，他們對於北京的解讀必然不是單純旅人的眼光，透過敏惠的眼所閱讀的北京空間，反映的是背後的政治文化，也是台灣人看中國時的錯綜情感。

除此之外，平路透過幾個空間展現北京的樣貌，出租車、謙一同事聚會的 Club，試圖藉由這些空間勾勒台灣過客在大陸所能接觸到的淺層都市樣貌，藉由尚軍領著敏惠行走的北京空間，讓最政治最傳統文化的帝都有著資本主義的熱鬧繁華：紫禁城宮牆外是外國人聚集的所在，護城河外是點蠟燭的西餐廳，有著鋼管舞表演現場演奏的酒吧望得見後海的荷花，順治皇帝祭祀日神的主祭壇旁放映著配了普通話的外國電影.....，代表中國傳統的帝都北京空間裡，密集交錯著中國與西方的元素，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北京樣貌，不但嚮往悠悠古典情懷的敏惠在這裡失足，拐騙她的大陸男人尚軍也在此漂流，找不到回家的路。

¹³⁰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頁 25。使用 Michel de Certeau 的「步行修辭學（rhetoric of walking）」概念

三、阿姆斯特丹——面向海洋與冒險的空間

小說中的荷蘭空間描寫集中在阿姆斯特丹這個城市，阿姆斯特丹不僅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發源地，對於揆一來說，年輕時阿姆斯特丹象徵的是繁榮、開放，吸引所有想要追尋珍奇事物的人們，渴望建立一番事業的各地年輕人遠道而來，哲學家笛卡爾也選擇這裡作為居所，在藝術思想經濟各方面都自由美好。

最重要的是這個新興城市的開明氛圍，新興的市民階級沒有門第家世的舊思維，連畫家的風景裡也是樸實的日常生活，不再是巴洛克風格裡崇神的訊息，而傳遞人人平等的價值觀，原本只打在神身上的金色光源也可以籠罩在小市民身上，教會裡沒有繁複的儀式與精細的雕琢，信仰是平實而自信的。

殖民改造，往往從空間的複製、延伸開始，揆一在寫給奧倫治親王的書信中，強調其對台灣（大員市）的建設是以阿姆斯特丹為城市藍圖，複製殖民者的空間規劃，在福爾摩沙刻意栽種代表荷蘭的鬱金香、放牧繁殖的種馬，透過動物植物的交配繁衍，讓福爾摩沙在無形中與荷蘭血脈相連，以複製相同的空間延伸統治。

揆一認為台灣與阿姆斯特丹初始的地理條件是相似的：有著小小的港口，面臨淤積的問題，但「若碰上歷史時機，地球這一半的大員與地球那一半的阿姆斯特丹就有了同樣的好運氣」¹³¹。背後隱隱的喟嘆是，台灣終究錯過這樣的時機，錯過成為一個開放的樞紐。

揆一青春的逝去、理想的落空，反映在福爾摩沙與阿姆斯特丹這兩個空間的變化，揆一生命最後的日子在阿姆斯特丹度過，但是相對於過去靠著實際創新而產生的欣欣向榮景象，此時的阿姆斯特丹已日趨世俗，新生地上的樓房買主全是投機致富的新貴，貧富差距拉大，小市民逐漸失去平等發展的機會。

平路刻意透過揆一之口，以阿姆斯特丹影射台灣，同樣土地狹小，沒有足夠的天然資源，也在強權的威脅下，荷蘭能夠走出一條路，放眼整個世界，台灣是否也能如此？不言而喻，揆一的絮絮叨叨裡全是平路的殷殷期盼。

¹³¹ 平路，《婆娑之島》，頁 144

四、澳門——文化混融的空間

歷史上，澳門曾與台灣有一段微妙的連結，荷蘭本來的目標是葡萄牙人佔據的澳門。荷蘭人為了澳門，與葡萄牙人開戰，荷蘭敗陣後將陣地轉往澎湖，邇後再轉往大員（今安平）¹³²，十七世紀大陸邊緣的澳門成為東方重要港口，長達四百年的時間，東西文化在此交融，澳門曾經看過古老中國不曾看見的大航海時代。

一八八七年清朝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例》，認可葡萄牙永遠佔領澳門主權，然而，葡萄牙人對澳門的統治是鬆散的，偏重在經濟上，並不強加文化語言的控制，隨著中國崛起，一九七九年中葡建交，經過長時間的溝通與談判，最後於一九九九年政權正式移交，澳門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施行一國兩制。

李展鵬認為台灣人看澳門歷史，常常「是『土向』的，多強調兩者共有的中華文化土壤，同文同種。然而，澳門跟台灣的聯繫也可以是『水向』的：數百年前，台南跟澳門同樣是最早跟大量歐洲人接觸的華人城市。」¹³³

這樣的背景，讓澳門身份難以被輕易的界定，對此，李展鵬有非常深刻的見解：

澳門是一個邊緣之地：地理位置上，它處於中國沿海；歷史上，它代表民族恥辱；政治上，它曾是殖民地；文化上，澳門的中葡混雜文化有別於中華母體。到了今天，它又是個經濟結構特殊的賭城、政治地位特殊的特區。無論從什麼方面，澳門似乎總是跟正統、主流沾不上邊。然而，澳門的邊緣狀態又甚具代表性：例如，正因其位處國土邊緣又曾被葡國人佔據，因此它才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跟西方碰撞的地方，又例如今天在澳門流動的跨國資金與各國人口，又使它成為探討全球化的最佳案例。無論是在數百年前的航海時代，或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澳門都恰恰在世界潮流的風眼中——即是說，邊緣狀態令澳門處於某種

¹³² 荷蘭人於 1601 年至 1627 年間，先後 5 次入侵澳門，最後一次進犯澳門於 1627 年，皆以失敗告終，之後荷蘭人轉而將目光轉往台灣，佔領澎湖和台灣，建立貿易據點，後來明朝福建巡撫南居益與荷蘭人爆發澎湖之戰，最後荷蘭戰敗，退守台灣。

¹³³ 李展鵬，〈導論：讓隱形城市現形〉，《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台北：遠足文化，2018 年 2 月），頁 33。

雖然，澳門和台灣、香港一樣曾被殖民，但在政治、文化、語言上沒有被殖民政府強力書寫，因此，澳門不似台灣、香港一般有強烈的主體性，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澳門學校用的多是香港或中國的教科書，幾乎沒有本地元素，第一所公立大學澳門大學在一九九一年才成立，缺乏本土研究、商業出版機制，及流行文化工業，種種原因，導致澳門並未建構起自己的本土身份¹³⁵。因此政權轉移交替的過程裡不曾有天翻地覆的對立，新的政權也毋須強力清洗原有記憶以鞏固政權。澳門的歷史讓它結構鬆動、對不同政權接納性高，不夠主流、不夠正統的文化血緣，也讓它沒有太多既定的框架。澳門作為一個移民城市，涵納中華文化、西方文化和東南亞文化：廣東人、福建人、北方人帶來了不同的中華文化；澳門又是中國最早有歐洲人聚居的城市，西方文化在此地的駐足是顯而易見的，再加上泰國人、越南人及緬甸華僑，及近幾年來到澳門工作的菲律賓人、印尼人及尼泊爾人，也帶來東南亞文化¹³⁶。混雜多元的文化與人種，讓澳門不容易產生對「他者」的排拒，因此，渴望從父親延續到妻子的那道陰影下逃脫的謙一，為了帶歡場女子小美避難而遠走澳門，這是偶然也是必然。

這裡是奇異的地方。巷子裡，轉角就有小廟，供奉黑油油的神像、懸著一圈圈的線香；沿著石階走走，隨處是天主堂，還有湯若望、利瑪竇修持的地方，四周是耶穌會的舊址；抬頭看看，MGM 新開的賭場，聳立在眼前，活像是凍箱裡的巨型的三色雪糕。¹³⁷

謙一和小美這樣的組合躲到很不中國的中國角落，澳門奇異的文化混雜空間讓想拋下生命過往的人得以隱身。

¹³⁴ 李展鵬，〈導論：讓隱形城市現形〉，《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頁 36

¹³⁵ 李展鵬，〈遲來了數百年的初戀：澳門身份〉，《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頁 159-162。文中也說明澳門一九九一年回歸中國、二〇〇五年登上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催生了一些本土話題，加上經濟的火速發展，使澳門人對於自己的身份開始有了認同感，對本地事務漸漸有所關注。

¹³⁶ 李展鵬，〈大三巴背後的故事：澳門歷史文化〉，《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頁 43

¹³⁷ 平路，《東方之東》，頁 212

「告訴我，怎麼樣才能夠自由自在？」，敏惠把謙一的這句話寫進她在寫的故事裡，「讓這句話引領著故事裡的人物，走向一處杳遠的所在。到了那裡，人們都會得到原來臆想不到的自由嗎？」¹³⁸。然而，追求自由的謙一從原有的生活裡逃脫，進入賭場擔任發牌手，他對賭場的形容卻是「入口像一隻高掛的鳥籠」、「進去了就在籠裡飛不動」、「進門就被鎖住，生路絕無，一個也逃不掉」¹³⁹，澳門的賭場空間金碧輝煌，既象徵奢華與脫軌的自由，卻也是禁錮心靈的意象¹⁴⁰，這是第一重衝突，而書中被困在澳門的人都是自願的，這是第二重衝突，讓人不禁懷疑謙一究竟是得到自由還是失去自由。

謙一逃亡之後往來於賭場與公寓兩個空間，賭場庸俗的低級趣味，公寓破敗斑駁的空間，都遠遠不及在父親與妻子安排下精緻的台北空間，但這個空間對於謙一來說仍然是自由的，混在賭鬼之間的謙一反而感到輕鬆，這是澳門，葡萄牙詩人口中的「東方之東」，一個可以看見日出的地方，卻也是沒有身份，沒有自我歷史的地方，台灣男人謙一逃離台北——有父親與妻子的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再逃離北京——夾揉中國傳統文化與時髦現代性的城市，來到澳門這個最缺乏認同、文化混種之地，「就算是沉淪的底層，走到盡頭，有沒有可能是新生之地，一個可以拋開過往的地方」¹⁴¹，這是小說的終點，謙一的絕路與重生。

五、島嶼與海洋

台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島嶼上的居民在不同時期跨海而來，從南島語系原住民的移入到中國沿海漢人，再到荷蘭、西班牙等西方海權國家，居民多元且充滿冒險性格與拓展的眼光。從十六世紀，台灣就是歐洲海權競逐重要的貿易據點，於不同時期在台灣發展的鄭氏父子，也是縱橫海洋的商盜集團，海

¹³⁸ 平路，《東方之東》，頁 283

¹³⁹ 1970 年落成的葡京酒店外型像個鳥籠。

¹⁴⁰ 外界對於 2008 年落成的新葡京酒店整體建築的評價大多都與風水學說拉上關係，包括：酒店外型有如火炬（有指寓意化解對面永利澳門之財氣）、賭場外圍尖刀狀裝飾（有指寓意大殺三方）、賭場內巨型變色蛋（有指寓意賭場會孵蛋，有聚客之意）、賭場內金錢狀射燈（有指寓意金錢壓頂）、賭場入賭檯之上網狀裝飾（有指寓意客人墮進蜘蛛網，插翼難飛）。採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澳門新葡京酒店>

¹⁴¹ 平路，《東方之東》，頁 212

洋帶來財富與機會。對於當時的台灣而言，圍繞在島嶼之外的海洋，不是阻隔而是道路。

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在這個島嶼上建立政權，然而政治歷史的背景因素，國民政府選擇在政權延續的土地上，清洗其原有的土地記憶，強力移植充滿中國符碼的懷鄉文學。

國族空間和文藝政策裡並沒有將台灣形塑成為主要的象徵性符號，不但沒有鼓勵再現本地地景或地標的作品，甚至切割日治時期遺留下來本土書寫的典範。寫實主義文學裡刻畫的空間座標大部分強調在大陸的風土，「神州」、「江南」、「大漠」或「塞北」等模糊的區域指涉反而成為戰後二十年間台灣文學常見的文化符碼。¹⁴²

在這樣的空間建構方向下，「海洋」中的「島嶼」不是主體，而是陸地的邊緣；台灣不是面向世界的起點，而是逃亡中無可奈何的暫居所。很長一段時間，對於台灣人而言，「望向海洋」通常代表的是通過台灣海峽，望向中國故土¹⁴³，鮮少意味著望向太平洋，眺望另一面無垠的可能。再加上台灣海峽長期處於軍事緊張狀態，陸權性格的國民政府延續過去的清政府政策，對海洋發佈禁令，壓抑台灣原本開放的海洋性格，以致血液裡跨海冒險的台灣人民對海洋卻是陌生而恐懼的。

不管是《東方之東》或是《婆娑之島》，書中每一個角色的心裡都心繫一片海洋或是一個小島。尚軍的老家是濱海城市，記憶中的海洋是北方鹹黑的海，帶著朦朧霧氣與寒氣。童年的敏惠在偏遠近海的地方流徙，海洋與生活連接的地方，是油污與貓狗屍體，是脆弱的家隨時可能要被沖散吹垮的颱風天，張望海洋時想像的是船難，那樣隨時都要滅頂的不安，讓她渴望能夠找到攀緣求生的一塊浮木。

鄭芝龍為了迷惑順治皇帝，盡力描摹奇幻雄偉的海洋空間：

鄭芝龍要趁勝追擊，他不願放棄這個讓皇上有所感應的話題：困難的始終是對皇帝形容什麼是海？怎麼形容海裡升騰起的漫渙霧色？怎麼形容海上的一輪夕陽？漸漸失去亮度的大圓餅，熟透的柿子似的，一個翻

¹⁴²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頁 170

¹⁴³ 余光中詩作：「一灣淺淺的海峽，是最大的國殤，是最大的鄉愁。」為著名代表。

身，向著海平面滾落下去。怎麼形容暖流？皇上，好似遠方進貢來的一疋綾羅，在眼前，那疋柔軟的綾羅滾動了起來，席捲其中的是喘著氣、張著口、等著交配的各種生物，無數的大魚小魚，包裹在這疋綾羅裡，滾動著，像什麼？像原野上經風吹動的牧草。對了，草原是最好的比喻，對困坐深宮的皇帝，必須要借重『草原』的形容詞。

『海就像漫天蓋地的藍綠色草原，草原上走馬，浪頭跟船身有一種拉鋸，就好像在馬上，馬背跟人身體之間的起伏。此起彼落，套著一條無形的韁繩。舵手懂不懂駕馭船，端看能不能夠握住那條蜿蜒的繩子，把握了浪頭的大小，抓住快慢，找到那個節拍，才能夠穩準地決定什麼時間、什麼角度，兩腿一夾，騎上去迎面來的海浪。』

聽著，皇上出了神，隱隱然看見了陽光之下，琥珀一樣透明的海水。¹⁴⁴

鄭芝龍的海洋奇幻多變，難以駕馭，是陸地政權難以想像的世界；讓鄭芝龍必須豪賭的海洋不是純粹浪漫的，而是務實的權力與金錢，對他而言，海洋是連結廣闊世界的重要渠道：奇異的外國人、昂貴的香料、活生生的女人、海上船隊的雄姿，都要透過海洋的轉換，與古老中國鏈結；他實際的海洋空間裡更重要的是他所建立的海上王國，綿延真實的商業經濟，

海上的船隻都知道規矩，沒領得鄭氏令旗就不能往來，不管是內容外商，只要通販洋貨，一定用鄭家的旗號，才能保證無倣也無虞，而每船繳來的利錢是三千金，一年下來，他家的歲入以千萬計。¹⁴⁵

這是鄭芝龍透過海洋織起來的一張海上貿易網，台灣一度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一般台灣歷史很少提及，從日本殖民政府到國民政府，這些統治者壓抑台灣曾有的海洋想像，將台灣貶抑成另一塊土地的次級延伸附屬品。

同處大航海時代的揆一，因為遠洋的呼喚，從瑞典來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是一個向海洋開放的城市，在這個空間裡，種族位階被抹平，空間裡不

¹⁴⁴ 平路，《東方之東》，頁 129-130

¹⁴⁵ 平路，《東方之東》，頁 126

管是經濟或是文化都是自由清新的，揆一的海洋夢想也是這麼純粹，充滿冒險與希望：

揆一記得自己在船上的心情，月色下，星辰隨桅桿上下搖曳，黎明前星辰垂落到地平線的高度。接著等待日出，泛霞光的大海上，他對遠方懷著熱切的盼望。

繞過好望角之後，海面平靜了，海水變得透明輕薄，陽光下透出琥珀顏色。沿著印度洋一路往東，地平線上出現綠蔭蔭的大小島嶼，凹處藏著一塊塊鋪滿白沙的海灘，熱帶的風裡，他驚異於地球這一半不一樣的景物。¹⁴⁶

語調是歡欣的，這時候，遼闊海洋帶來的是新鮮的事物，全然不同的視野，揆一的海洋空間並沒有著墨在風雨巨浪，也沒有險惡，反倒是同胞的耳語背叛，才是他生命裡最險惡的挑戰。

至於島嶼的意象，在平路的創作裡始終佔有一席之地。〈後來〉中「我」即使到世紀的愛情中仍然無法忘情島嶼的記憶，「曾經蔚藍、碧綠、鬱灰、藕荷、松青、琥珀色……的海水，如何戀慕地、溫柔地、依依不捨地親吻島嶼的岸邊」，有搖曳的棕櫚樹和月光，然而最後的日子「整個島嶼都在虛浮的氣氛裡翻騰得鬧熱滾滾……」¹⁴⁷，以致生態惡化、無可挽救的走向滅亡。〈島嶼的名字〉裡的「我」竭力嘶吼，希望大家記得「台灣」，一個島嶼的名字。在這裡島嶼的樣貌是「椰子樹上舒卷著變換的雲影，每年颱風季節，暴雨將陰霾沖刷得乾乾淨淨，遠處的山巒是翠綠的，孩子們都有一對好奇而清亮的眼睛」¹⁴⁸，然而全球地理整合的過程中，亞洲、美洲、歐洲等大陸塊連結，「大變化裡失蹤的一個小島，電腦檔案中沒有那類的資料」¹⁴⁹。在平路的故事裡，島嶼的命運總是被遺忘，只剩「我」孤獨的在無人知曉的時空裡吶喊，持續著不被理解的追尋，在〈小與大〉中，「我」心中無可取代的島嶼，最終只成為一則床邊故事：

¹⁴⁶ 平路，《婆娑之島》，頁 137

¹⁴⁷ 平路，〈後來〉，《紅塵五注》（台北市：聯合文學，1998 年），頁 96-101

¹⁴⁸ 平路，〈島嶼的名字〉，《紅塵五注》，頁 135

¹⁴⁹ 平路，〈島嶼的名字〉，《紅塵五注》，頁 133

你與我現在就在這片大的版圖裡面。孩子你所不知道的是，正因為你心中從來沒有那小小的文明，所以，這眼前的一切，對你來說，才會多麼的合理。儘管它已經大到失去了邊際、大到抹滅了差異……對你，我的孩子，竟是幸福的印記、竟是完美的表徵，而對我來說，這一刻那小島的記憶愈來愈小，也只剩下一枚模糊的影子，在月光裡搖晃，搖晃著溶入黑暗的、腥濕的、濃重的、終於淹沒一切的大海洋。¹⁵⁰

文字構畫的圖像裡是島嶼文明被海洋吞噬的焦慮。島嶼是如此脆弱而渺小，面對黑暗濃重的海洋，終究是要滅頂。小小的島嶼，四面都是望向廣闊無邊的海洋，對於島嶼而言，海洋究竟是未知的希望，還是凶險的枷鎖？小小的島嶼又該何去何從呢？對於這個問題，大陸人尚軍理所當然的解讀是「虧得是他兒子鄭成功，把臺灣拉回來了」，然而台灣人敏惠繼承老師的眼光，認為「站在大歷史的角度，與外面的海權世界接軌，鄭芝龍代表的才是更開闊的視野」¹⁵¹，尚軍肯定鄭成功心思特簡單，無形中也暗示中國眼光裡單一中心的思考習慣；敏惠則肯定的是鄭芝龍積極有上進心，有出外探險的勇氣，這是中國大陸殖民觀點與西方海洋殖民觀點的交鋒，平路顯然試圖透過分屬兩岸的角色傳達不同角度訊息，也暗示兩者的衝突。然而對於空間的主權，兩造各有堅持，即使親如父子，鄭芝龍仍然無法說服同一血脈的森兒，「他無從對自己的孩子敘說，船艦連起來的海上帝國，通往外面的世界，那是比眼前這萬仞宮牆更寬宏的未來景象」¹⁵²，誰又能說服誰呢？平路用大航海時期的歷史故事，寫台灣的現代處境，反覆探問的是台灣的未來。《東方之東》中由一個吊兒郎當的中國男人尚軍事不關己地問：「還是說說三百多年前，你們那小島的收場吧」¹⁵³，「降清好，還是自立門戶好？」¹⁵⁴，以輕浮的態度談台灣人沈重的命運，看似說的是三百年的故事，實則直指台灣獨特的地理位置，至今仍陷入當年鄭氏父子的困境中，夾在大國勢力中的不由自主，無法掙脫。

《婆娑之島》中的兩個異國西方男子，跨海來到台灣島嶼。「他」曾跨海而來，在這個島嶼度過最青春騷動的歲月，此後一生都對這個遠方的小島有莫

¹⁵⁰ 平路，〈小與大〉，《百齡箋》（台北市：聯合文學，2009年），頁13

¹⁵¹ 平路，《東方之東》，頁151

¹⁵² 平路，《東方之東》，頁151

¹⁵³ 平路，《東方之東》，頁238

¹⁵⁴ 平路，《東方之東》，頁157

名的留戀；揆一帶著冒險與野心跨海洋而來，心繫這小小島嶼，最後的日子死守在沙洲上的熱蘭遮城堡。揆一曾想像著這個島嶼的前景，是經由大洋連接外面的世界，那麼福爾摩沙就不是向內閉鎖的島嶼，而是通往世界的海洋子民，然而最後揆一困守在城堡中，理應是萬年基業的熱蘭遮城孤懸在沙洲上，一如台灣小島被孤懸在國際之間，海洋與島嶼，無垠的海洋與無依的島嶼，是小說中重要的空間意象。

第二節 概念空間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除了明確的地理空間外，筆者亦嘗試整理三個概念空間加以分析，分別是政治空間、情欲空間和物質空間：

一、政治空間

空間負載著記憶，而公共空間並非僅是隨機的記憶積累，歷史的戰勝者可以透過對於公共空間的建構，塑造社會記憶，確保社會的特殊史觀。因此，克瑞茲威爾（Tim Cresswell）說道：

建構記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透過地方的生產。紀念物、博物館、特定建築物（而非其他建築物）的保存、匾額、碑銘，以及將整個都市鄰里指定為「史蹟地區」，都是將記憶安置於地方的例子。¹⁵⁵

統治者透過強化某些建築物，傳達特定意涵，尤其在不年的年代，政治不穩固的政治區域，此類隨時提醒人民瞻仰政權的建築，更是被大量建造，紀念館、廣場、雕像都是常見的形式，用以強化極權。

小說裡第一個值得探討的政治空間就是「廣場」，在敏惠與尚軍的對談裡，指的是「中正紀念堂廣場」與「天安門廣場」，兩者都是充滿政治意味的空間，透過遼闊的空間和巍峨的政治建築，以及衛兵交接、國旗飄揚等政治符號，建構一個概念性的空間，使人油然而起對國家的敬畏與驕傲，廣場有著適

¹⁵⁵ 徐苔玲、王志弘譯，克瑞茲威爾（Tim Cresswell）著，《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市：群學，2006年），頁138

宜集結人群、適宜公開喊話的特性，因此「中正紀念堂廣場」與「天安門廣場」在歷史上都曾具有極權統治者的宣示，也曾集結群眾反對運動，是國家與人民爭奪權力的場域。

尚軍說，當時欸，紀念碑周圍靜坐著抗議的學生。有人露宿在廣場上，搭了帳篷，趕集似的。那時節，閒不下來的人齊聚北京，全世界的社會活動家都來了，支撐不下來，打瓶生理食鹽水都要趕著上陣。記者也大陣仗，揹著照相機、錄音機，各種實況轉播設備，整天在廣場上溜躑。需要補充體力唄，賓館成了拿著鑰匙換衣服洗澡的地方。¹⁵⁶

天安門廣場這個空間容器中發生的事件，反映中國近代政治的發展。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此時的天安門政治意味濃重，象徵國家與統治政權，毛澤東曾多次在廣場接見紅衛兵。一九七六年領導階層的內部鬥爭引發人民抗議，稱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最為人熟知的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又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這次事件幾乎斷送共產黨四十年的統治，上百萬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以及全中國一百三十二個城市，為爭取民主發動示威抗議，前後長達一個半月以上，中共領導階層對於如何因應意見分歧。¹⁵⁷國家因為黨內領導階層分裂和人民大規模示威抗議而陷入危機，鄧小平提出政治穩定為優先的原則，從此之後，凡被黨國認定為妨礙國家穩定的對象，統治者必以強勢手段對付，執政首要目標是鞏固團結，壓制社會動亂，維繫政權。

六四學運的隔年，在台灣的廣場上也坐滿了學生：

敏惠特別記得的是一九八九的隔年，一九九〇，一株野百合豎立在廣場上，三月天，中正紀念堂前坐著她同學。廣場四周封了路，家教途中，她必須繞道走。……「你們廣場上都做什麼？」尚軍問。接著尚軍的話，敏惠隨口說：「廣場上學生也聽你們的崔健，很多人會唱〈一無所有〉。」¹⁵⁸

¹⁵⁶ 平路，《東方之東》，頁 111

¹⁵⁷ Susan Shirk 著，溫洽溢譯，《脆弱的強權》（台北：遠流，2008 年），頁 46

¹⁵⁸ 平路，《東方之東》，頁 114

中正紀念堂原本就是一座紀念蔣介石的巨型建築，藍色頂蓋與白色建築本體，與南京中山陵的建築元素非常相似，中正紀念堂前的大型廣場，由於位置接近統治中心，加上建築本身隱含許多昔日國民黨的意識形態¹⁵⁹，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便成為許多社會、政治運動的集會地點。敏惠口中的事件應是一九九〇年三月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的「野百合學運」，大學生聚集於廣場上靜坐，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當時的總統李登輝承諾召開「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廣場上的這場學生運動，對於台灣民主政治進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兩岸的「廣場」事件之後，中國大陸的「廣場」政治意味更濃了，充滿肅殺之氣，對於空間的管理異常嚴格，以避免在這個國家政治象徵意味的區域有不馴服的異聲¹⁶⁰。相較於天安門廣場，多年之後，台灣的「廣場」卻只是敏惠日常散步的動線，甚至名稱也有改變，政治濃度日益稀釋。¹⁶¹

兩個廣場都有故事，統治者與人民的權力在此空間拉鋸傾軋，統治者與人民的選擇，讓兩個國家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至此，「廣場」已然不是單純的廣場，其意義是在特定時空裡的心照不宣，凝聚集體記憶，也反映統治階層與人民間的權力互動。當敏惠與尚軍兩人談論廣場時，不可避免都將過去的社會記憶帶入情緒。對於空間的記憶，自然也影響人觀看世界的角度，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順治與鄭芝龍之間，兩人的對話就是萬仞宮牆與海上帝國的對話，小說這兩個空間的意象不斷出現，暗示中國與台灣的發展曾有這樣的關鍵時刻，曾擁有截然不同的選擇與可能。

¹⁵⁹ 建築本身的意識形態包含：館內的蔣介石大型雕像、屋頂上的中國國民黨黨徽、臺階中間為中華民國國徽圖案的御路，在中國傳統建築上，只用於宮殿或廟堂。

¹⁶⁰ 根據《北京市戶外廣告設置管理辦法》第九條、第十條：天安門廣場地區及廣場東側、西側各 100 米範圍內禁止設置戶外廣告。另外，駛經天安門廣場的公共汽車的車身也不得有廣告。

¹⁶¹ 2006 年，由民進黨主政的教育部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更名為「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並將中正紀念堂廣場由「大中至正」改為「自由廣場」，引發爭議。國民黨主政的台北市政府、泛國民黨占多數的立法院因而多方杯葛，凍結其預算。2008 年國民黨籍總統馬英九就任，廢止《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恢復「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組織編制。2009 年 7 月 17 日，文建會公告，國定古蹟名稱由「台灣民主紀念館」變更為「中正紀念堂」。2009 年 7 月 20 日，中正紀念堂匾額重新掛回，但在大門口牌樓上的匾額題字仍維持「自由廣場」，並未將原本的「大中至正」掛回。

第二個顯而易見的政治空間是紫禁城。紫禁城是明清皇室居住之地，也是皇權的象徵，紫禁城內建築不僅宏大，且有嚴密的體制，以後宮為例，打開紫禁城平面圖，中軸線上的建築為皇帝皇后的住所，建在高台上，地勢高於東西六宮，東西六組宮院左右對稱、整齊排列，比後三宮低矮，建築體制也明顯小於後三宮，宮禁森嚴，門戶重重深鎖、彼此隔離、私密性強。

象徵傳統權力的紫禁城裡，連盆景都極盡奢華的以綠翠玉作葉、瑪瑙紅玉作果實，然年輕的順治面對人人誦念的萬壽無疆，只感到自己還沒年輕就已經老了，而「慈寧宮、壽康宮、壽安宮，名字多吉祥，卻都是寡婦住的地方」，¹⁶²至於倉庫裡堆放的珍奇寶物、織品綢緞引發的卻是「倉庫裡白蟻咬嚙的聲音」¹⁶³這樣千瘡百孔的想像。在溥儀老師莊士敦的眼中，「那些不祥的高大建築是二百六十多年前一位皇帝的監獄，直到今天仍是另一位皇帝的監獄」¹⁶⁴，「各個宮殿的哀怨幽靈們排成一列，用眼睛看、用眼睛聽，幽靈就會講出許多哀傷的故事」¹⁶⁵，相對於統治者處心積慮藉由紫禁城營造對弘大帝國、尊貴皇權的想像，平路順著正統理論外緣找到縫隙，繞過這個富麗表象，看見背面的幽暗。

在《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¹⁶⁶一書中，作者梳理兩岸故宮的文物及空間等故事，提到：台北故宮和國父紀念館的設計競圖上，建築師王大閎的設計原先都被評選為最優，但都被以「中國的要素不足」要求修正，可見宏大建築身負突顯「權力」、「表現國家意識」的任務。至於作為世界遺產的紫禁城，其意義更是多重的，她象徵封建皇權，是政治實力的代表，開放之後作為北京故宮文物的「容器」，肩負起向世界傳遞中國文化的任務。

在象徵陸地偉大政權的紫禁城裡，鄭芝龍以文字語言展示海洋空間，以順治皇帝不曾涉足的海洋空間引逗著天威難測的皇權，大膽鬆動根深柢固的「大陸中心思維」：

¹⁶² 平路，《東方之東》，頁 188

¹⁶³ 平路，《東方之東》，頁 133

¹⁶⁴ 平路，《東方之東》，頁 236

¹⁶⁵ 平路，《東方之東》，頁 253

¹⁶⁶ 野島剛著，張惠君譯，《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7月）

放眼外面的世界，就不會困在自己的愁煩裡，那張航海圖上，島嶼像羅列的棋子，穿梭其中的是乘洋流而來的大黑船。比起固守這一進一進的宮牆，外面的時代已經多麼不一樣。¹⁶⁷

紫禁城的宮牆是凜然高聳的帝國象徵，卻是順治自由心靈的牢籠，阻擋他看見外面的世界、碰觸生命的其他可能。在敏惠寫的故事裡，順治出走的軟轎與大喪中的空棺木，最終都從東華門抬出去，逃離這個鑲金嵌玉的紫禁城，一路往東行，向一個縹緲的夢前行，逃離紫禁城後的順治是否真的自由自在呢？書中強烈的對比，挑戰對紫禁城的政治想像，質問象徵政治權力的紫禁城，是宮殿抑或牢籠？

小說中第三個出現的政治空間是熱蘭遮城。過去，城堡是權威和財富的象徵，通常代表統治中心，石砌城堡要花費多年的時間建造，在冷兵器的時代，有很重要的防禦功能。隨著武器型態的變化，城堡由戰爭要塞轉為居住的宮殿，重視建築的美觀與裝飾，但仍然象徵財富與權勢。巨大的城堡內部複雜的建築體制，往往也代表強大的權力結構，不容挑戰撼動。

城堡鮮明的封閉特性，積極面是強大的防禦性，消極面則是囚困的圍城意象，因此在文學中「城堡」的意象常被運用，有時象徵穩固的心靈堡壘，有時卻又成了孤絕的囚室。¹⁶⁸

熱蘭遮城是荷蘭十六世紀的新式城堡，三道城牆，外突的稜堡建有砲台，每個砲台有六門活動大砲，城堡下面又有半月堡，歐陽泰稱之為「文藝復興堡壘」，強調其關鍵的創新之處在於：

一種位於堡壘角落的稜堡，有如一個充滿威脅的大箭頭。每一座稜堡都具備互相支援的作用，……這麼一座堡壘只要人員與武備齊全，就幾乎不可能攻得下來。如果有部隊膽敢攀牆或是衝撞城門，必然會遭到交叉火力痛擊。這樣的火力不但來自上方、下方、左側、右側，甚至還會來

¹⁶⁷ 平路，《東方之東》，頁 189

¹⁶⁸ 如錢鍾書《圍城》中將婚姻喻為圍城：「婚姻像一座圍城，在外面的人想進去，在裡面的人想出來。」

自後方，因為突出的稜堡可從進攻部隊的後方開火。¹⁶⁹

其設計讓進攻方難以攻取，因此只能採取圍城的手段，迫使守軍因物資缺乏、意志潰散而屈服。實際上，揆一的一千多名士兵抵擋了鄭成功的部隊將近一年的時間，讓原本對戰事樂觀的鄭成功吃足苦頭。但在《婆娑之島》中重視的並非戰爭形式的討論，書中並未出現兩軍交鋒的清晰鏡頭，熱蘭遮城堡在書中出現時已是圍城的困窘，只有圍城內地上躺滿傷殘的士兵、堡裡井水乾涸、地窖各項物資缺乏，更諷刺的是，外在強悍堅固的堡壘竟是建立在沙洲上的城堡，

熱蘭遮城看似堅若磐石，問題卻在沙地的選擇。沙地讓稜堡傾斜、大砲鬆動、角樓下陷，梁柱的木料不耐濕氣，暴雨浸淫，日久朽爛。……當初在沙洲建築城堡，公司只考慮有迅速撤離的水道，原意豈是長久經營？¹⁷⁰

根基搖搖欲墜，城堡孤懸，與本島聯繫中斷，一如荷蘭人在台灣三十八年的殖民，看似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取得福爾摩沙的統治權，然而，統治的方向唯利是圖，整體建設缺乏長遠的思考，對於當地人民的經濟需求、宗教信仰與文化習俗，缺乏理解與接納，加上人種差異極大，統治權便如沙洲上的城堡，沒有根蒂，一旦海水沖刷便不留痕跡。

城堡是充滿力量的政治空間，書中呈現的卻是它的脆弱，不禁讓人思索：城堡究竟是強大的防禦建築抑或困窘的圍城？

除了廣場、紫禁城、熱蘭遮城這樣明確宏偉的政治建築外，在小說文字中，也可以讀到其無所不在的政治空間。

關於美國國務院官員「他」的空間多半比較模糊，細節的勾畫比較少，但卻瀰漫著濃重的政治氛圍。「他」的辦公室不是一般上班族空間，美國積極涉入外交事務，其強大的軍事經濟政治實力，左右許多國家的發展，國務院作為帝國負責外交的行政部門，從走廊到茶水間，對話的內容就是國際局勢，傳遞的訊息攸關其他國家發展的決策，當然，以「他」敏感的身份，他出現在什麼

¹⁶⁹ 歐陽泰 (Tonio Andrade) 著，陳信宏譯，《決戰熱蘭遮》（台北：時報出版，2017 年 12 月），頁 187

¹⁷⁰ 平路，《婆娑之島》，頁 242

地方、和誰說話，無一不是政治。因此，一趟隱匿的台灣之旅是政治、和台灣女情報員待在車上是政治、他在家中的空間是政治，波多馬克河餐廳裡的那一個餐會，更是政治。他出獄後，家裡的電腦螢幕跳動的仍然是東亞地區的最新狀況，依舊脫離不了對政治的關心。

《東方之東》裡台辦、公安單位和人民法院等公家機關，空氣裡瀰漫的是政治性質，而非台灣熟悉的服務性質，此外，無處不在的標語，被尚軍拉進騙局裡當活布景的公安，製造出更政治更詭譎的氛圍。由於無處不是政治，空間裡便有講不完的場面話，猜不完的政治目的，反映當代中國對政治的敏感與掌控。

兩書中充滿了濃濃的政治味，與事件的發展固然有關，書中空間的政治性也起了渲染效果。廣場、宮殿和城堡都是充滿政治意涵的弘大建築，除了實質的政治功用之外，也有震懾人心、加強統治的心理作用，不過，書中巨大的政治建築卻都有脆弱的一面，平路顯然意欲藉此顛覆不可被顛覆的統治強權；此外，台灣人敏惠看待廣場與紫禁城的態度，也如實呈現台灣民主化後空間性質的變化，由於人民心中不再有極權者籠罩的陰影，因此，可以有更開闊的想像。

二、情欲空間

「小說裡的敘述空間與人物身體組成有機關係：人物身體與空間描寫是密不可分的」¹⁷¹，男女身體空間的交融與互動，往往與情欲相連，因此在此將情欲空間與男女身體的姿態混合討論。

敏惠的情欲空間裡展示的是一個女人如何從壓抑到釋放。

平路用敏惠的眼帶讀者去閱讀謙一的北京公寓，透過她最自豪能夠掌握的生活物件與身體空間，殘酷的說明這個空間不僅對敏惠而言全然陌生，也展示了一個她全然陌生的謙一。敏惠為丈夫親手熨燙好的襯衫，丈夫似乎從來不曾穿過，敏惠藉由物品與丈夫維持的這份聯繫終究還是斷裂的。她在細瑣的空間物件中意識到另一個女人的存在，杯子上散漫的口紅印、自己絕不會穿的那種內衣、泡在肥皂盒裡的女人髮夾，暗示另一個女人截然不同的性格，這些空間

¹⁷¹ 黃自鴻，《小說空間與台灣都市文學》，頁 81

的線索與謙一信件裡形容的小美完全吻合，也暗示兩個女人和謙一身體的關係親疏有別。

在這個人去樓空的空間裡，被拋下的女人竟然開始整理冰箱，丟棄腐敗劣質的食物，同時氣惱的想著自己絕對不會準備這樣的食物給丈夫吃：

在陌生的公寓裡，她很快又回到凡事作主的角色。原來做人妻子的慣性這麼強大！她悶悶地想，還以為自己沒有強求過什麼，還以為替別人著想的人，怎麼會強勢到這種地步？¹⁷²

從台北住家到進入謙一的北京公寓，都能看出敏惠對空間的要求，此時高標準的掌控習慣，與之後的變化產生強烈對比。轉移到旅館的敏惠，房間裡闖入了自稱被國家警察跟蹤迫害的大陸男子尚軍，敏惠的旅館房間成為荒謬的堡壘，門上總掛著「請勿打擾」的牌子，必須神秘兮兮的進出，對窗外的車子與門口的腳步聲都非常敏感。敏惠與尚軍的連結空間在旅館，一個借來的空間，旅館裡的人都是過客，旅人不能改變房間的風格、留下自己的記憶、塑造自己的樣貌。一向苦心經營自己空間樣貌的敏惠，卻在這樣一個不能留下痕跡的臨時性空間裡，妄想刻畫真實久長的情愛。

敏惠就在這不屬於自己的空間裡釋放情欲，彷彿正是這樣一個她不能縝密安排的空間，她才能不顧所有的脫軌。對比丈夫節制疏離的關係，尚軍的性是粗暴的，過程中充滿強烈的字眼，劇烈的撞擊、重重的喘息、乞求的淚水，死過去、活過來，有狂喜也有痛苦。

敏惠如何觀看兩個與她有親密關係的男性身體呢？在敏惠的眼裡，尚軍的身體姿態是粗獷的，黝黑粗壯，指節上被香菸熏出一塊棕黃，身上的味道混雜著煙味、狐臭、尿騷；和丈夫纖細的身體是強烈的對比，謙一帶著一些女性化的身體，有著嬌弱的腸胃、薄到近乎透明的指甲，溫文的氣質，是個好看的男人。

謙一又是怎麼形容兩個女人的身體姿態呢？謙一的印象裡，敏惠是穿著圍裙，躬身站在流理台前切切洗洗的溫柔樣貌，不出惡聲；小美的身體姿態大刺刺，重重的打鼾、睡姿成大字形、打呵欠從不搗嘴。

¹⁷² 平路，《東方之東》，頁 35

敏惠和謙一這兩個身體情欲表現節制優雅的台灣人，最終都陷落在身體姿態狂野粗放的中國男女，夫妻間不協調的性事與心事，竟然都因此得到解放。

《婆娑之島》中兩對男女的情欲是不被允許的，不僅是背叛道德上的婚姻關係，也是對於國家的背叛，因此情欲的空間皆有隱密幽微之處，然而，兩者情調卻大不相同，一者充滿原始活力，一者則隱晦不明。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是探險者的天堂，空間裡的情欲流動直接露骨：

他記得大員街市的菜攤收市後，肉鋪的碾板上沾著鮮血，旁邊的柵欄，飄散著動物發情的氣味。黃昏開始，菜市成了人肉市場。離家的漢子有旺盛的身體需要，偏偏這裡的女眷不成比例。忽明忽滅的燭光下，笑聲愈來愈惹火。女人索性伸出手臂，放膽勾搭著，浪遊的男人回應這樣的挑逗，扯下自己的褲子，顯露身上的雄性本能。¹⁷³

東印度公司有清楚的禁令，禁止官員與當地女人發生關係，但是娜娜的女體是熱情豐饒的存在，她的氣味是台灣山林的味道，娜娜的身體姿態是自然奔放的，她展示女體的皺褶與縫隙、帶領西方男子探索台灣與台灣女性的空間，「娜娜碰見自己的時候，那是花兒盛放的時節。娜娜曾經敞開衣襟，給每一位渴想的男人以熱情的滋潤……」¹⁷⁴，文中不乏對於娜娜的身體形容，總是與暴雨、泥土連結，充滿土地的生命力。

揆一與娜娜的情欲空間在沒有規則、不被馴服的野外，娜娜和揆一的結合在大河的分支旁，滄海桑田，支流在多年之後將造成台江內海淤積，大員港不再，這個島嶼的命運又將不同。

相反的，另一條敘事線中的情欲空間卻是非常隱晦的，當年青春的「他」在台灣第一次在舞池裡牽起陌生女人的手，女學生後來約他出來喝咖啡，與異性情感線連結的卻是幫忙黨外人士傳遞消息；「他」與酒吧女郎的性交易在平路筆下是純情的，沒有任何性的描寫，只輕輕以他酒醒過來發現自己在陌生的床上，吧女瑪麗則是窩在沙發上，兩人因為語言隔閡而溝通有限，在回憶裡卻繚繞著一股淡淡的憂傷，理論上是虛假的性交易，兩人對於金錢卻都似乎不在

¹⁷³ 平路，《婆娑之島》，頁 156

¹⁷⁴ 平路，《婆娑之島》，頁 119

意，反而有著純情的場景，在那一夜，他「慌」了手腳、「後悔」為何走這麼匆忙、水光是「溫柔」的、覺得自己「辜負」了什麼。

「他」和羅洛萊的空間是另一種隱晦，身處在被高度窺視監控的政治外交圈裡，兩人空間的隱密反而需要文明的遮掩、需要似有若無的欺瞞，「他」帶女孩去看足以展現美國榮光的空間，參觀開國者的故居或者有名的藍色山脊；參與美國庶民生活的空間，逛農夫市集、博物館或者在小鎮的餐廳，在文明的所在，他們敏感的身份，讓他們沒有可以躲藏的山林，最安全的空間是在狹小封閉的車上。

平路描畫「他」與女孩情欲空間的文字隱晦而節制，身體姿態雖充滿暗示，卻總是點到為止，不曾說明說破，文字氛圍符合他們兩人在外交圈中複雜與敏感，一如外交辭令，發出訊息的人和接收訊息的人都是字句斟酌。

他輕輕握著，一雙骨感的手。漸漸地，感覺到她的肋骨，多麼瘦的女孩，他提醒自己小心，若是太用力，把自己的體重壓上去，骨頭有可能應聲碎裂。

他記得，女孩臉臉上烏黑的睫毛，鎖骨凹陷處一絲絲桔子花的甜香。¹⁷⁵

娜娜的身體是多肉多汁的，充滿母性的乳汁，而在「他」的敘述中，羅洛萊的面目模糊，沒有明確具體的樣貌線索，但氣質卻非常單一明確：脆弱令人憐愛的，最動人的是她身上隨時連結著台灣的情懷，她對台灣的眷戀與「他」在台灣的青春記憶重疊。「羅洛萊就像那個多颱風多地震的島嶼，那麼小、那麼沒有抵禦能力.....，是個被需要被人保護的東西」¹⁷⁶，讓他奮不顧身伸出手。

兩種不同的氛圍，是台灣的不同面向，綜合成更完整的台灣樣貌，也可以說是四百年來的台灣主體變化，從充滿原始活力的樣貌，轉變為隱晦而不能言明的所在。

三、家屋

加斯東·巴謝拉在《空間詩學》中提出「家屋」的概念，認為人們誕生與居住的家屋，銘刻人生命裡最深沉的情感與記憶，其空間除了提供幸福的庇護，也有著人最原始的擔憂與懼怕，這些回憶都將記錄在人們的身體裡，成為

¹⁷⁵ 平路，《婆娑之島》，頁 276

¹⁷⁶ 平路，《婆娑之島》，頁 246

一輩子的追求¹⁷⁷。平路在書中挪用大量物質堆砌出的空間氛圍，除了重回現場的努力之外，這些看似客觀的物質都是空間符碼，亦暗含對於家屋的追尋與建構。

其中，《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兩書中，對於飲食多有著墨，筆者相信文本中的飲食，也反映飲食與身份建構、地方認同的關係，可以被納入對於家屋廣義的追尋。

楊雅涵清楚指出：

飲食可以是不同地方文化的分界、同時也可以是相異社群間相互滲透融合的活化劑，另一方面，食物也是身份認同的指標之一。從食材、烹調方式、到用餐習慣等或大或小的細微差異，在在標舉、彰顯並維繫著身份認同¹⁷⁸

飲食習慣使我們有清楚的座標，標示我們曾經的童年、青春，生命底層不會因為政治制度而改變的認同，以及對一塊已然遠去土地的眷戀。

《婆娑之島》裡的美國國務院官員「他」回想台灣時，那些舌尖上的想念是偏向庶民的，暗示他真實貼近台灣這塊土地，在中餐廳裡，在一群用叉子的美國人中間，只有他，舉起筷子夾菜。對著中國餐館裡傳統的中式菜色：咕咾肉、宮保雞、芥蘭牛，他想念的是中山北路地下道的燒酒螺、路邊攤的蚵仔麵線、師大附近的平價牛肉湯、台中夜市的蜜豆冰，這些更地道、更台味的飲食。「他」對於台灣小島上的庶民小吃戀戀難忘，反倒像是一種鄉愁式的記憶，通過身體不容抗辯的記憶，確認一個異鄉人與台灣這塊土地割不斷的連結。平路用這樣細微的食物分別，描寫「他」不是一般的「中國通」，他對台灣和中國的細微差距有比一般人更多的了解，之所以親近台灣，心靈深處眷戀同情這個遙遠的島嶼。

刻畫揆一時，並未在他的飲食上有太多著墨，他筆下反覆提到食物通常都是貨品，與福爾摩沙的經濟連結，不管是稻米、蔗糖、鹿肉、魚乾，或是豐富

¹⁷⁷ 加斯東·巴謝拉 (Gaston Bachelard) 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年7月）

¹⁷⁸ 楊雅涵，《80年代以降女作家在小說中的飲食書寫》（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05年6月），頁91

的漁獲：烏魚、大比目魚、小蝦、牡蠣，揆一關注的是這些食物帶來的經濟價值，以此證明福爾摩沙的價值、證明自己的見解正確。

最後的戰役中，堡壘被圍最嚴重的是絕糧問題，揆一想像的是「巴達維亞的會議室裡，桌上是運來的醃製鮭魚，僕役端出窖藏的陳年紅酒」，在他熟悉的飲食中，暗示這是一群理應同一個文化、同一種族群的支持者，卻在同樣一張桌子上，做了背叛他的決議。

范銘如在〈逃離與依違——《何日君再來》的空間、飲食與文化身份〉中提及，平路透過飲食習慣的差異突顯身份的差異，固有的文化身份和認同左右著日常飲食習慣，即便逃離越界的主體，仍然離不開飲食的囿限。¹⁷⁹

林秀蘭則以「貪食症」的角度來看平路筆下「戀食」的女子，認為「嗜吃，幾乎成了平路筆下女性人物的共通特徵」，「『吃』是治療孤獨的藥劑，咀嚼食物的同時，往往也咀嚼著記憶中的幸福」，透過食物來滿足對愛的欠缺。¹⁸⁰

敏惠也是個缺愛的女子，她在台北的住所中，充滿各色的廚具：

敏惠說起自己一抽屜的西餐用具，打蛋的、篩麵粉的、刨起士的、磨碎堅果的，每一樣都沾著特殊的食物氣味。做頓飯，敏惠孩子氣地說，像家家酒一樣好玩。¹⁸¹

她品味生菜細微的味覺差距，熬煮更濃稠的黑醋，分辨海鹽與岩鹽的差別，在嗅覺上也極盡纏綿的描寫。敏惠對食物細細描繪，自豪地敘說自己如何用心調理每一餐，做菜的過程手續繁複、上菜講究配色和擺盤，連廚具的形狀都要求美感，叫個外賣也有精準要求：鮪魚肚不能有筋、鮪魚蔥卷的海苔要一咬就碎的口感。¹⁸²

在台北的飲食，敏惠掌有決定權，用自己喜愛的廚具，以自訂的嚴格標準進行，但在無形中，敏惠的飲食也常常是一種對男性需要的揣想，因為公公／老師喜歡生魚片外包著紫蘇，所以家中種上一盆紫蘇；考慮胃弱的謙一，蘋果

¹⁷⁹ 范銘如，〈逃離與依違——《何日君再來》的空間、飲食與文化身份〉，《當代》215期（2005年7月），頁122-137

¹⁸⁰ 林秀蘭，《論李昂、平路與朱天心的記憶書寫》

¹⁸¹ 平路，《東方之東》，頁177

¹⁸² 平路，《東方之東》，頁43

要磨泥，煮湯要濾掉蘿蔔渣滓。她總是很用心，把準備丈夫的飲食當作一天的大事，以此為責任也以此自傲。

楊雅涵在《八〇年代以降女作家在小說中的飲食書寫》中，試圖從吳爾芙《自己的房間》發想，討論飲食的權力空間：

探討東方女性如何在東方傳統的「家空間」中以「自己的灶腳」為根據地，藉烹煮吃食在象徵秩序中斡旋出話語權。東方家庭中的廚房空間，不只是一塊經營家務的中介場域，由於大多是母親活躍於其中生產食物以填飽家人胃囊，因此廚房也具有母性空間的質性，能作為家空間中撫慰家人情緒的場域。¹⁸³

看似溫柔的廚房，看似作為付出的烹調工作，也傳遞出話語，對於一個家庭、一份關係的詮釋。

敏惠原本對於家庭飲食握有絕對掌控權、總是服務男性（丈夫、公公）飲食，這一切都在遇見尚軍後改變，她完全交出自己的飲食掌握權，由尚軍決定在北京的飲食。尚軍從旅館房間打個電話叫外賣，點餐過程並未與敏惠商量，當他們把外賣食物放進紙盒，尚軍動作俐落，平日廚藝高超的敏惠卻在這時打破茶杯割破手指，顯得相對笨拙。尚軍講起北京小吃，興致盎然如數家珍：炒疙瘩、龍鬚酥、紫米粥、豆汁、爛羊肉、香辣蟹、水煮魚，興興頭頭的為了吃帶敏惠冒個險上館子，不管是涮鍋子或者餡肉夾餅，敏惠一反之前對飲食的細緻要求與絕對掌控，連尚軍幫她買的一包栗子都讓她有了小女人的幸福。這一切都與敏惠在台北的飲食行為截然不同，此外，尚軍提供飲食的空間不是粗糙簡陋的、就是人聲喧鬧的，與敏惠過去的寧靜內斂的飲食空間全然相反，至此已不見敏惠細膩品味食物的質地，最後口味最重的麻辣鍋加上一杯一杯的啤酒，敏惠終於跨過那條線，卸下所有的防備，完全的陷落進尚軍編織的騙局。

至於在敏惠心中必須要小心呵護飲食的謙一，似乎從未曾關注過飲食，也分辨不出食物的好壞，北京公寓冰箱裡的食物是腐敗廉價的、小美也無法為謙一烹調細緻周到的飲食，和小美逃亡到澳門後，小美要的就是謙一下班後為她帶一盒燒鴨飯，坐在床上直接拿著鴨腿啃，至此，飲食純粹是溫飽。謙一對飲食的不著意，回應敏惠周到慎重的飲食照顧，根本對謙一毫無意義。

¹⁸³ 楊雅涵，《八〇年代以降女作家在小說中的飲食書寫》，頁 15-16

飲食標示著人的身份與選擇，也不經意指向人內心的渴望與眷戀，在這兩本小說中，平路撥出篇幅描畫飲食，在最日常最瑣碎的空間中，透過充滿意義的飲食符號，描畫角色的樣貌，也寫出人物對於家屋空間的不同渴望。

除了對於在飲食裡寫出人物對家屋的追求，平路筆下的女主角總是迷戀各種「物」，「平路筆下的物則構成人的存在，人與『物』乃相互依存的共生體。眾多的『物』標誌的不只是時代的氛圍與步履，而是人存在的痕跡。任何一個尋常的記憶，透過各種不同的『物』而點出它的座標」¹⁸⁴，延續著這樣的關懷，《東方之東》中的敏惠在尋夫的慌亂不安中，不合時宜的對著陌生男子尚軍叨念著自己在台北家中的器物，不管是衣食用具，或是裝飾性的小物，都能得到她迷夢般的絮絮述說，面對迷茫的未來，不知所蹤的丈夫，彷彿唯有念及這些熟悉的器物才能讓她感到安心。

我可以一個下午，坐在陽台，解那團纏在一起的釣魚絲。解開了，望著小扇子似的貝殼在風中飄蕩，風鈴又可以重新叮噹。¹⁸⁵

謙一的襯衫是細緻的麻料，淡淡的暗紋，細看，暗紋裡還藏著一串串麥穗。用手洗，再仔細拉平整，一隻一隻袖子展開，展開才晾在架子上。

陽臺上種盆栽，你知道薄荷的香氣嗎？我隨時摘下幾片葉子，連枝連莖鋪在玻璃盃裡。注滿水，點一個浮在水面上的蠟燭，玻璃盃覆滿青綠，讓人想起田田的荷葉。對著玻璃盃，嘴裡吹口氣，吹起了漣漪，還有醒腦的香氣傳來。¹⁸⁶

然而如此豐饒的器物書寫，對比敏惠貧瘠的感情世界，在堆砌許多充滿象徵性的器具物品空間中，卻沒有相對應的情感存在，「坐在咖啡店裡，雖然她不喝咖啡。就好像她喜歡買貓咪圖案的茶杯茶盤，家裡也沒養貓咪」¹⁸⁷，就像她努

¹⁸⁴ 林秀蘭，《論李昂、平路與朱天心的記憶書寫》，頁 107

¹⁸⁵ 平路，《東方之東》，頁 105

¹⁸⁶ 平路，《東方之東》，頁 106

¹⁸⁷ 平路，《東方之東》，頁 46

力建構的完美幸福世界，男主人不在家，床那一側的藺草蓆子仍被固定仔細擦拭，家中沒有人喝咖啡，寂寞的空間裡卻擺了六人用的咖啡組。

林秀蘭提出：

平路小說中的幽閉女子，往往極端依賴閉鎖的空間……，平路小說中的女子亦往往有著對身體所處空間純質化的想像……，「幽居」、「獨居」、「寡居」幾乎是平路在書寫女性身體情慾的同義詞。¹⁸⁸

在《東方之東》裡也能看到敏惠這樣的傾向，她對於空間有著純質化想像，空間裡總是閉鎖孤單的。

對比之下，謙一的公寓裡，盆栽植物是枯萎的、家具用的是廉價的材質，廚房櫃子上一排俗氣的洋酒空瓶子，衣櫃裡常穿的有領T恤是敏惠認為謙一絕不會穿的尼龍質料，兩夫妻在器物選擇上的呈現，已然說明兩人生命選擇南轅北轍。敏惠對於器物的迷戀，彷彿只是為了填補心靈的空缺，企圖掌握她不能真正掌握的內心感受。

對於女性構築家屋的慾望，菲力巴·古爾達（Philippa Goodall）提到：

女性的慾望被限制只能在家務的套件和包裝下耍弄，或被道德化為禁慾或者奢華浪費的持家管理。但是，女性的慾望也逾越了符碼規則。女人介入了設計的物質環境，打亂了偏好的美學與實際的安排，她們在社會地圖的多重位置上，從事個別和個體的行動，並且運用她們手中的微細權力（micro-power）。¹⁸⁹

生活空間是由各種物件所構築起來的，點滴物件的安排都是人的思想與記憶，也是城市與國家的記憶。

敏惠的台北住所，反映她一個人精緻的秩序，空間裡講究的器物，充滿了感官的細節，值得注意的是，敏惠有著對於中華文化的嚮往，在她佈置的空間裡充滿傳統中國的符碼，海棠、石榴、太湖石、芭蕉，講傳統的燈謎。敏惠的

¹⁸⁸ 林秀蘭，《論李昂、平路與朱天心的記憶書寫》，頁 86-88

¹⁸⁹ 菲力巴·古爾達（Philippa Goodall）著，李宛澍譯，〈設計與性別：哪裡是家的核心〉，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604

台北空間，除了自己的小公寓，向外延伸的空間並不廣，有幾家常去的咖啡店，她只搭乘其中一條捷運線，在中正紀念堂繞圈運動，在植物園的院子裡對著一池荷葉。

敏惠極力打造這個靜謐風雅的完美空間，就像她極力建構的謊言，不僅是為了說服別人，也是為了說服自己，支撐著自己的缺乏自信，彷彿這樣就可以脫離自己的原生困窘，嫁給謙一、進入另一個社會階層，脫離自己吵吵鬧鬧的原生家庭空間。

敏惠在台北的家屋是「關起門，弄出個合意的小天地」，在清末文人的舊繪本裡，想像舊文人的生活、帝王家的御花園，是她自以為渴望的完美，然而在這精緻風雅的空間裡少了生命力、有著隨時會被戳破的假象。空間裡有著敏惠的脆弱，當她看著黃昏時辦公大樓一層層關燈、摩托車格剩下白慘慘的線條，敏惠不免意識到自己一個人的心慌，不管她多麼堅強地把生活安排得妥帖，仍然擔心著「好像她的生活有一個窟窿，外面一層紙糊上去，糊得好好的，手指戳進去，不小心就會破了」¹⁹⁰。敏惠不厭其煩對自己對男人述說她所盡力建構的理想空間，似乎全都是她的一廂情願，在尚軍看來那不是一般人的檔次，謙一的信裡也缺乏對過去空間的眷戀，故事的最終，敏惠只能一個人回到僅屬於自己的孤單空間裡：

回到台北，我就會走回原先的規律裡。我又像往常一樣，每天煮飯給自己吃，吃完飯，仔細揩乾電子鍋。陽光好的日子，站在陽台上晾衣服。濕淋淋的衣服鋪開在架子上，左邊右邊拉拉齊，無論曾經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我還是一樣，務必把衣服上每一條褶縐都拉到平整。

日子如常在進行，沒有人會看出來，我身上發生過這麼大的事。沒有人從外表看出來，我裡面藏著一個怎麼樣的空洞。¹⁹¹

敏惠公公的家是木造建築，在敏惠的眼中透著靜謐與書香，與她原生家庭吵鬧紛亂、隨時要坍塌淹水搬遷的空間形成對比，象徵了敏惠企圖擺脫的過去。這個在小說裡如同暗影的父親，其空間裡充滿了日本的符碼，日式的平

¹⁹⁰ 平路，《東方之東》（台北市：聯合文學，2011年），頁53。

¹⁹¹ 平路，《東方之東》，頁280

房、日文書籍、日本新潟縣產的清酒「一人靜」，在婚禮上的訓示也是日文俳句，敏惠更是為了公公喜愛的和風料理，在陽台上種一盆紫蘇。

這幾個空間也是家，然而，對於作為家屋，這幾個空間卻是破碎的，謙一恨不得一把火燒掉自己成長的家，在「家」這個空間裡，多病的母親早逝、父親與女傭發生不倫，父親永遠背對自己。為了逃離不堪的家庭過往，謙一與敏惠建立自己的空間，然而兩個人的空間裡是緊張抑鬱的，夫妻沒有檯面上的衝突，卻總有沉默的鴻溝，兩人為了追求更好生活共築新空間，卻都未感到真正的自由，謙一選擇離開台北到北京，最後完完全全離開敏惠的生命。

鄭芝龍與揆一也重視「物」，卻不是與之產生連結情感的生活器物，是能夠帶來財富、鞏固權力的貨物，鄭芝龍細數海外的奇物：「市集上稀罕東西多呢，波斯地毯、自鳴鐘，花瓶肚子上，畫著穿鐵箍大蓬裙的西洋貴婦……」¹⁹²，對經手的貨物津津樂道：「單單說糖吧，以大員一個轉口站來說，每艘船上裝的蔗糖可以多到兩千擔，除了蔗糖，還有白砂糖、黑糖、冰糖、薑糖，遠的運到波斯……」¹⁹³；揆一關注的也是福爾摩沙生產的鹿皮、稻米數量，以及港口流通貿易的貨物：

想到島嶼經營順手的年頭，拿著鵝毛筆，揆一枯水似的眼睛裡突然放出亮光：「稻米、蔗糖等作物在碼頭上堆得山高。轉口貿易獲利尤豐，從福爾摩沙到日本一地，每年載運總值高達兩百多萬荷蘭盾。有些貨物在臺灣包裝，打上公司的商標，到日本脫手，換回日本的白銀與銅。白銀存放臺灣一陣，運到中國，購買絲織品與茶葉瓷器等等，再運到歐洲市場。碼頭上裝卸各地珍奇，單單瓷器就超過二十萬件……」¹⁹⁴

揆一對此的叨叨念念，無非是想要證明自己有「超前的眼光，看見福爾摩沙的豐富資產，以及這個島在航海圖上的關鍵位置」¹⁹⁵，對於大航海時代的冒險家

¹⁹² 平路，《東方之東》，頁 147

¹⁹³ 平路，《東方之東》，頁 146

¹⁹⁴ 平路，《婆娑之島》，頁 171

¹⁹⁵ 平路，《婆娑之島》，頁 172

來說，台灣的價值就在貨物的貿易與生產，正因為豐饒土地與地理位置，使得小小的島嶼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書中對於器物、飲食的眷戀，反映人物對於家屋的追尋，敏惠依賴器物的堆砌，確認自己的安身之所，然而，她最後對飲食與空間的棄守，是對家屋追尋的失落；謙一對童年家屋的陰影，讓他一再逃離類似的空間，最終只能在結構鬆動混亂的澳門落腳，與另一個家屋概念薄弱的中國女人相守。至於鄭芝龍、揆一則依賴充沛的貨物創造的經濟，強調自己的眼光與價值。器物貨物無聲無欲也無情，是戀物之人企盼無聲的物成為有力的吶喊，向世間吶喊自身的價值。

第三節 小結

空間看似客觀，然而人與空間互動，空間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在看似客觀的空間裡，人們不免對於空間有主觀情感。除了人與社會無意識積累的空間記憶，也有統治者官方刻意塑造的空間記憶，空間與人文有著複雜多元的關係，既對抗也交融。

政治地理學家阿格紐（John Agnew）指出：

地方作為「有意義區位」，必須要有三個面向：區位、場所、地方感。「區位」概念是一個空間客觀的座標，「場所」是真實的物質環境，「地方感」則是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¹⁹⁶

「空間」藉著一連串的人為涉入過程而成為「地方」（Place），而「地方」被每一個獨立的個體視為一個意義、意向或感覺價值的中心，是感情附著的焦點，是令人感到充滿意義的地方¹⁹⁷。

同樣的，艾蘭·普瑞德（Allen Pred）也強調：

地方感往往是個人持續不斷發展意識和意識形態中的一部分，這種發展伴隨了一個人在具時空特定性的制度實踐裡的每日參與；伴隨了一個人

¹⁹⁶ 徐苔玲、王志弘譯，克瑞茲威爾（Tim Cresswell）著，《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4-15

¹⁹⁷ 艾蘭·普瑞德（Allen Pred）著，許榮坤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86-87

所擁有的社會化和再生產和社經結構的轉型；伴隨了被感受到的地方的形成過程。¹⁹⁸

空間裡不僅有關視覺觸覺嗅覺，還有關於心理，甚至關於行為，讓人與空間產生連結。

耐人尋味的是，書中的角色都是不得其所（*Out of Place*）之人，敏惠從小就超齡努力護持自己的家，長大成家就靠自己苦苦編織一個家的假象，假裝自己擁有一個完整的家，謙一令人羨慕的家庭背景裡沒有實質的家庭交流，他潛意識裡希望自己的家被燒掉，長大成家後亦無力維持一個家，只能不斷的逃亡。尚軍是一個離家太久的人，回不去故鄉，只能在一個又一個女人的房間裡漂流，小說中以流行歌曲「妹妹你在北方做一衣一裳，哥哥你在南方建一樓一房」，正是反映中國改革發展後，人民離家打拼的群體現象。鄭芝龍離開自己海上的家，以為可以賭一個傳統陸地的封官晉爵，最後家毀身死。至於皇帝順治，身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時代的皇帝，整個天下都屬於他的家，然而順治在自己尊貴的住所裡茫然失所，竟以一頂匿名小轎逃離，向外尋求一個家的可能。《婆娑之島》裡的兩個西方男人——揆一和「他」——心念著不能再踏上的台灣土地，不僅如此，因為捲入台灣政治，也被迫在自己的國家裡失家，身陷牢獄，孤單終老。

所有的空間都不安，所有美好的空間不是留在青春過往就是難以企及的想像，不禁讓人思索，台灣多年來也是如此，即便在屬於自己的島嶼上仍始終感到不安，對內對外都有「我是誰」的焦躁。過去帶著國民政府灌輸的懷鄉情懷，對中國地理空間比台灣島嶼的地理空間還要熟悉，如今面對國際及兩岸關係，對於台灣這個島嶼究竟該如何定位，依舊惶惶不安。平路透過台灣女人敏惠、透過兩個西方外來者對台灣空間的迷戀與追懷，投注對台灣無以名狀的深情。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特殊的人物設定，使人物跨國界移動，讓書中人物帶著原有的空間記憶，主動或者被動碰觸另一個空間，與習慣另一空間中的人物，有深度的對談與撞擊。《東方之東》涉及的空間有台北、北京、澳門，台北與北京有高度政治象徵，象徵兩岸政治文化的樣貌，澳門空間則介

¹⁹⁸ 艾蘭·普瑞德（Allen Pred）著，許榮坤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101

於兩者之間，政治文化的色彩較淡，經濟娛樂的色彩濃重，因此成為成功擺脫台北與北京的自由之地，然而，澳門的空間描述，又讓人不禁懷疑並不能在此地得到真正的自由自在。《婆娑之島》透過美國國務院官員「他」及末代荷蘭首都揆一的記憶，描畫七〇年代政局騷動不安的台灣、大航海時代的充滿活力的野性福爾摩沙，兩種不一樣的台灣空間樣貌，提供讀者觀看台灣的兩種面向。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空間刻畫，則寄寓對台灣發展的期望與遺憾。

書中透過空間裡的政治、情欲與家屋追尋，暗示人的認同與掙扎，國家與人民、強國與小國、男與女之間無所不在的拉扯，無不企圖掌握主導性、尋求認同、安頓自我的定位。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書名皆是空間，「東方之東」指的是澳門，是逃亡的終點，書封面為中國大陸與台灣，以連線標示主人翁空間移轉的路徑，清楚點出北京、澳門、台北這些地理空間；「婆娑之島」指的是台灣，三百年前的福爾摩沙或是現下的台灣，封面就是小小的燙金台灣，孤懸在毫無他物的白色封面上。書名與書籍的設計，已然清楚暗示空間的重要性，而小說中的空間書寫，除了巧妙藉由人物在空間中的遷徙、漂流，展開不同地理空間的對談，也透過不同概念的空間書寫，挑戰讀者對空間的既定想像。

從書名到封面設計，從形式到內容，《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富含空間的書寫與想像，藉由分析書中的空間意涵，可以理解人物的選擇塑造了空間，空間裝載了意義，透過人物角色的空間遷移與碰撞，破壞過分關注時間性的軸線，將小說的閱讀平面拉大，除了歷時性的閱讀，也增加共時性的閱讀。

總結來說，台灣的問題一直都是空間性的，地理位置處於大陸塊的邊緣，處於海洋的關鍵位置，氣候溫暖土地豐饒多汁，偏偏土地又狹小，不足以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掙扎不僅是歷史交付的難題，也是地理空間帶來的宿命。平路意圖在小說裡討論台灣的未來，空間是無可避免的切入點，這是非常聰慧的選擇。

第四章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的性別政治

平路的小說很少營造浩大的場面，出場人物一向不多，傾向將焦點放在少數角色內心的思索與辯證，亦透過人物之間的互動彰顯角色、推動情節前進，人物關係單純，著重的是每一份關係的複雜度，而非安排複雜的多角關係。

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雖採多重敘事線，然而秩序井然，每一個章節區塊僅處理兩個人的關係。然而，人物關係隱隱另有對應的關係，人物的性別、種族與國籍的設定，使關係不僅止於兩人，還有背後隱喻的群體，彼此的互動與對話，也影射兩個群體之間的情感與權力如何交涉。

謝肇禎對於性別政治曾有這麼一段說明：

性，不侷限在私密情愫中；政治，不只是管理眾人之事。無論個體親密行為，或是眾人擬塑的社會結構，其實都隱含著權力的位階，實踐著宰制與被宰制的行為。性政治即是揭露掌權者、既得利益者、強勢族群的權力脈絡，讓失權者、非既得利益共犯者、弱勢族群的聲音嘹亮釋放。

199

本章透過梳理文本，分析平路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的性別政治，其角色的設定、人物展開的語言對話與書寫，皆隱喻家國處境，以充滿感情的筆觸，引發讀者關注台灣在複雜的兩岸關係、台中美關係中的艱難處境，且以重複的關鍵概念加強人物之間的隱形連結。

第一節 角色隱喻

在華人世界裡，夫婦／男女與父子／君臣是社會穩定架構的重要關係，男女之間不僅是情愛，也是家國政治，父子之間不僅是血緣情深，更是家國的承接延續。

戰後台灣小說，由父子關係談世代衝突者，如王文興《家變》、白先勇《孽子》；藉由「性別」議題闡述家國者，如：李昂《迷園》、施叔青《風前塵埃》、陳玉慧《海神家族》等。《東方之東》、《婆娑之島》兩書中出現多種男女情愛關係，特別的是他們皆為跨國婚戀關係，平路利用不同種族國籍的男女情愛，討論背後牽涉文化與政治的衝突與糾葛；此外，亦透過書中多重父

¹⁹⁹ 謝肇禎，《群慾亂舞：舞鶴小說中的性政治》（台北市：麥田出版，2003年），頁55

子關係，討論既繼承又顛覆衝突的父子關係，並進一步延伸為對父權體制的衝撞。

一、跨國婚戀的男與女

女性與男性的情愛互動，常常帶有曖昧的政治性、幽微的權力角力，因此，小說創作中的兩性關係，往往不僅是單純的兩性情愛，劉亮雅曾梳理戰後台灣小說，提出這些作家常以跨族群的婚戀關係作為介質，討論台灣複雜的國族認同、混融的族群關係：

性別關係又常是展現與交涉國族關係的重要渠道……複雜的國族關係經常透過性別權力關係加以鋪陳。例如《海神家族》（2004）中，日治時期琉球女性移民嫁給福佬族，他們生下的混血女兒嫁給外省人……施叔青《風前塵埃》（2008）也很特別，日治時期在台灣出生的日本女子愛上太魯閣男子，日本戰敗後被迫帶女兒回到日本……。²⁰⁰

關注女性議題與政治歷史議題的平路，亦常透過小說中的男女情愛談兩性問題，或者藉男女情愛暗示政治歷史的權力拉扯，劉亮雅以其〈愛情備忘錄〉為例：

〈愛情備忘錄〉藉男作者對女主角的強迫性、獨佔性愛情，寄喻中國對台灣的裹脅專橫。男主角一邊對女主角施暴，向世界宣告她屬於他，但從此她越飄越遠。²⁰¹

平路透過性別關係間的衝突，寫對台灣的情感。這樣的寫作傾向，早在〈玉米田之死〉中已隱然透出端倪，藉著記者「我」的追索，從不同人物對陳溪山的評價與記憶，勾勒出他對於鄉土的情感，其中，「我」與陳溪山都有一個強勢的妻子。對此，王德威認為：

²⁰⁰ 劉亮雅，〈施叔青《風中塵埃》中的另類歷史想像〉，《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1月），頁62

²⁰¹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6月），頁85

在〈玉米田之死〉中，她試圖加上女性主義的層面，從而創造了一種新的性別化觀點。她筆下的男主角對個人及家國意義的追求夾雜著深切的性焦慮。政治的挫折與性的鬱結交相衝突，爆發成中國（男性的）意識危機。²⁰²

書中已然接納美國文化的妻子強勢主導仍眷戀台灣的丈夫，在房事上欲振乏力的丈夫象徵台灣面對西方勢力的無力，最終丈夫選擇以死或放棄外任的方式逃離，得到自由。類似的設定也出現在〈在巨星的年代〉之中，敘事者「我」和醫師都有一個西化的強勢妻子，因此只能荒謬的將對於台灣的鄉土情感寄託在一個女明星身上，希冀在女明星身上重塑心中想像的台灣精神，兩性的情與欲隱喻著留美台人在台灣鄉土與西方樂土的拉鋸，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只能卑微掙扎著。

平路也擅於通過文字，重新賦予政治歷史新聞中的女性新的樣貌，最為著名的莫過於《行道天涯》中的宋慶齡與〈百齡箋〉中的宋美齡，這兩位看似在權力頂峰、歷史中心的女性，其實也被男性主導的政治歷史左右著，平路嘗試以女性的角度解構歷史，還給這兩位國母級的女性有情欲有脆弱的肉身。

「女性情慾的覺醒就是對男性世界的最大顛覆的力量」²⁰³，在平路小說中，女性角色從早期的強勢帝國文化象徵，如〈玉米田之死〉、〈在巨星的年代〉中的西化妻子，到之後著重探討女性自身定位的困窘與徒然，如重塑著名女性肉身的《行道天涯》、〈百齡箋〉、《何日君再來》，寫女性在情感中彷徨掙扎的〈婚期〉、〈微雨魂魄〉，我們可以讀到平路女性的聲音越來越清楚。然而，《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的女性似乎又退到次要角色，以下將仔細梳理文本，解釋書中女性角色的特殊象徵，以及男女關係中的權力關係。

（一）《東方之東》中的男與女

²⁰² 王德威，〈華麗的世紀末〉，見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1996年5月），頁173

²⁰³ 平路，〈在父權的邊緣翻轉----「行道天涯」的女性情慾〉，《中國時報》第39版（1995年3月17日）

書中出現兩男兩女，交錯三段不同的感情關係，分別是台商夫妻謙一與敏惠的婚姻與感情、台商丈夫謙一與大陸風塵女子小美這對亡命鴛鴦，以及台商妻子敏惠與大陸身分不明男子尚軍的短暫戀情。

書香世家出身教養良好的謙一與溫柔嫻熟的妻子敏惠，他們的婚戀關係表面上風平浪靜，然而太多文明教養的箝制，讓他們始終壓抑心事，在婚姻裡未能真正了解與信靠彼此。敏惠因為母親酗酒與父親不善治生，自小必須要堅強，比任何人都乖巧懂事，她將嫁入謙一這樣的書香世家當作夢想的完成，從少女到婚後都守護著完美的形象；謙一不能在性上滿足妻子，敏惠溫柔體貼地表現「對性事表現得毫不介意，甚至佯裝成一點也不喜歡.....為了讓謙一不必知覺到，做妻子的有不能夠被滿足的部分」²⁰⁴，然而，敏惠的壓抑自持並沒有換來幸福。

丈夫謙一外表斯文，家教良好，是教授之子，卻始終活在父親的陰影下，心靈底層埋著深深的自卑，認為自己除靠著父親之外不曾做過任何成功的事；另一方面，年少時撞見父親與傭人的不倫情事，又讓他對父親心有芥蒂。妻子敏惠卻是父親的研究生，與父親非常投契，在這樣的婚姻裡，謙一總覺得自己配不上敏惠，又厭惡自己接受父親的安排。敏惠完美的形象、對他細緻的照顧，反而成為謙一的牢籠，敏惠的賢慧內斂，讓他在心理上距離妻子更遠。

到中國工作的謙一，在工作應酬的場合中認識歡場女子小美，一連串的意外讓他成為小美的保護者，放棄一切帶著小美逃亡。在婚姻中總覺得自己配不上敏惠的謙一，反而在與小美的關係裡，感覺到自己並非一無是處。小美凡事沒有什麼意見、完全不多想，她的床上總是亂成一團、充滿了煙味，睡著時成大字型的仰天睡姿，放肆發出鼾聲，這都是細緻節制的敏惠不可能在婚姻中展現的形象，反而讓謙一感到自在。「說起來，人實在很奇怪，會為了奇怪的原因，譬如說，保護一樣比自己更可憐的東西，免得落入淒慘的情境，突然生出平日沒有的勇氣」²⁰⁵，一向軟弱的謙一，轉變成保護者，為大陸女子小美無助的處境張開羽翼。

至於敏惠，為了尋找失去音訊的丈夫，來到北京尋夫，卻落入大陸男子尚軍的愛情陷阱，婚姻家庭的巨變逼迫表面平靜內斂的她面對婚姻中種種問題，在這段尋找丈夫的過程裡，她也在尋找自己內心的聲音，一層層放下心防，直到與全然不按牌理出牌的尚軍的脫軌性愛中，方能任由眼淚流淌，放肆最真深

²⁰⁴ 平路，〈《東方之東》〉，頁 82

²⁰⁵ 平路，〈《東方之東》〉，頁 203

刻的情感，終於可以坦承自己一生都乞求著被憐愛²⁰⁶，終於坦然面對自己身體的欲求²⁰⁷，承認對愛的渴望，承認如果有一個男人讓她感覺到被人愛是多麼好的事，她會不顧所有。然而，尚軍偷走她的金錢，無情的拋棄她，敏惠追尋自我的嘗試得到的是難堪的回應。

敏惠最初是節制而注重細節規範的女人，隨著在北京尋夫的歷程，學著如何與公安周旋，學著做戲、大聲喧嚷以獲得注目，原本清晰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慢慢接納滿口粗話、來路不明的大陸男子，成為以故事、以金錢挽留男人的女人，最終迷亂奉上自身。謙一在小美保護人的角色裡為自己脆弱的自尊找到價值，敏惠甘於被矇騙，以為能夠換取一點真心。然而不管是謙一或敏惠，最終都在中國的土地上脫軌，投入言行較為大刺刺卻充滿生命力的中國人懷抱，得到某些部分的自由，真實的面對原本漠視的內心感受，卻也付出慘痛的代價，在個人的情愛故事中，也寫出當時現實的兩岸互動歷程，反映當時相對富裕的台灣人，成為某些中國人覬覦的對象。

最終台商夫妻兩人都沈淪，脫出原先的軌道，愛上中國男女，丈夫為之拋棄原有身份、妻子落得人財兩失，固然因為過去原生家庭的傷痛，使他們無法建立穩固的關係，但這樣的結局安排也令人心驚，原本活在自己小天地的臺灣人走上中國的土地，學習如何在中國特有的遊戲規則中生存發聲，暗示台灣面對中國的衝擊，若是原本的連結與認同不夠緊密，勢必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婆娑之島》中的男與女

書中有兩段男女關係，兩位女主角分別是平埔族女子「娜娜」以及台灣現代情報人員「羅洛萊」，兩位男主角則是西方帝國男性，荷蘭長官揆一與美國國務院高官「他」。

平路是以女性視角解構男性官方歷史的寫作好手，這次卻將歷史詮釋權交還給傳統上處於話語論述中心的西方白人男性，東方女性在文本中完全沒有發言權。不論是娜娜或是「羅洛萊」都是沒有聲音、面目模糊的女性，她們只活在這兩個白人男性的凝視中，平路顯然以娜娜豐饒的女體象徵福爾摩沙的旺盛生命，以「羅洛萊」令人憐愛的女性形象象徵臺灣的脆弱。

²⁰⁶ 平路，《東方之東》中，〈北京出現的男人（之五）〉整個篇章都在寫敏惠的戀愛，文字裡流動的曖昧與愛嬌，全然不是敏惠面對與謙一婚姻裡的自持節制。

²⁰⁷ 敏惠寫給謙一的信：「我真正的恐懼是跟自己承認我的需欲」，《東方之東》，頁 281。

娜娜代表的是臺灣原始的野性的美，相較於之前平路小說中壓抑情慾的女性²⁰⁸，西拉雅女子娜娜沒有傳統漢人女性的壓抑，相反的，性對她而言是如此自然純潔，她不受豢養不受控制，揆一從不知道她何時出現，是否再相見，「娜娜像島上的水流，湍急無定」²⁰⁹，兩人相處毋須文明的話語，全由身體自然的引導，原始的默契。她每次出現都為揆一帶來救贖，第一次見面娜娜救了幾乎滅頂的揆一，用豐饒的身體哺育這受傷的小獸，面對新婚妻子海蓮娜無法勃起的揆一，在大河之畔與娜娜卻有歡快的肉體交纏，彷彿台灣又讓他重現生機；最後一次見面，則是揆一深陷圍城之際，被迫投降之前，娜娜帶來寬容的撫慰。

娜娜在這份情愛中的姿態耐人尋味，既有熱烈追尋的奉獻，卻也有相當自主性，享受歡愛的主導性。她為了與揆一相會，在叢林中穿梭，爬進困頓的城堡，為此身上添了新的傷口，但她卻不委屈卑微，她選擇出現的時間和方式，她主控兩人之間的性，在與娜娜的情愛裡，原本高高在上的文明西方長官揆一學到的是「多用眼睛看，多用耳朵聽」，「我們這些外來者懂什麼呢？轉了一圈，留下些微的遺痕，島嶼終有它本身的壯闊生命……，福爾摩沙是娜娜族人的地方」²¹⁰，娜娜雖是沒有聲音的原始部落女子，卻有著無形的力量，面對西方文明統治者，她在這份關係裡並非被凝視觀看的「他者」，反而讓白人自覺為「他者」。

至於「那麼小，那麼沒有抵抗力」的羅洛萊，總是眷戀著臺灣：「在複雜的世界裡，女孩唯一的參考座標總是臺灣。無論臺灣多麼小、多麼無足牽掛，那是她心裡唯一的記掛」²¹¹，羅洛萊無疑是「他」心中預設的臺灣角色，「他」認為，感情裡沒有強弱的區別，就沒有值得全心投入付出的愛，因此，惹人憐愛的羅洛萊與她背後那個柔弱的島嶼，誘引他不問回饋的交付外交資訊。在這段關係中，「他」一再試圖展現強者的自許，重現美國強大的保護者角色。在「他」的口中，對台灣女情報員的稱呼是「女孩」而非「女人」，形容她「女孩的嘴角沾著糊狀的奶油，像個長不大的小孩」²¹²、「談到前程，始

²⁰⁸ 平路寫女性公眾人物的小說中，多呈現其壓抑情慾，如《行道天涯》中的宋慶齡、〈百齡箋〉的宋美齡；〈微雨魂魄〉、〈婚期〉則呈現平凡女子幽微卻壓抑的欲望

²⁰⁹ 平路，《婆娑之島》，頁 115

²¹⁰ 平路，《東方之東》，頁 266

²¹¹ 平路，《婆娑之島》，頁 197

²¹² 平路，《婆娑之島》，頁 196

終帶著點困惑的意思」²¹³，她成為柔順被動的客體，然而，已是通過考核與訓練的情報員怎能如此天真被動？「他」再三強調羅洛萊僅是被動的接受好意，對人沒有戒心，令人質疑：究竟是平路透過「他」的口提出作者自己的判定，還是塑造「他」一廂情願的想像？

從一個隱喻開始，加上一重重的想像，添衣服一樣，在對方身上加上……對自己有特殊意義的想像。

對他，或許這就是愛情的真諦：碰到那女孩，開始有異樣的感覺，接下來，堆積木一樣，在對方身上搭蓋起隱喻的城堡。²¹⁴

然而，「他」給她的代稱卻是「羅洛萊」，一個在詩歌與傳說中有著美麗容貌與曼妙歌聲的女人，她吸引萊茵河上的船員，讓他們無視河流中的礁石與漩渦，在河裡觸礁滅頂。這樣純真無辜的女孩，其吸引力卻是致命的。

該事件在有限的史料中，仍無法清晰看出這位臺灣女性所扮演的角色²¹⁵，然而，這個事件中牽涉的兩個人，「他」和羅洛萊的身份關係有好幾層：一個年長男人和一個年輕女人，一個白種男人和一個亞洲女人，美國和臺灣，國務院高層和臺灣情報基層。每一層身份都包涵強烈的權力不對等，在「他」的形容裡，女孩是笨拙生澀的、被動的，「他」內心自承「他等在那裡，精確地計算時間，等著那蛾子飛進來」，卻在法庭上聽見自己的律師說「明顯是臺灣利用外交管道密密佈線，讓當事人一時不察，掉入陷阱」²¹⁶，看得見的文字就有互相辯證的詭譎，更何況，這仍屬於「他」單方面的資訊。究竟是誰吃了誰的誘餌？平路很有技巧的暗留懸念在文中，然而不管誰是設下誘餌的人，最後羅洛萊與「他」都是落入美國高層的網，逃不過帝國更高層的網絡。

小說裡穿插一段當年美國人對於蔣宋美齡的看法，看似為「他」的回憶，實則可以做為這樁台美外交情報男女情事的補註。他細數當年報紙上如何鉅細靡遺地描述蔣宋美齡訪美時的東方女性穿著，報社放在蔣宋美齡身上的形容詞

²¹³ 平路，《婆婆之島》，頁 182

²¹⁴ 平路，《婆婆之島》，頁 167

²¹⁵ 在相關的報導中，對這件間諜案的說法不一，由於凱德磊為華府親台的重要人士，整件過程又充滿了不符一般間諜案的疑點，有人認為其中牽涉了親中與親台兩股勢力的角力，因此關於台灣女間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眾說紛紛。

²¹⁶ 平路，《婆婆之島》，頁 131

是「little」、「tiny little」，「國會議員都看得入迷，這些政界老手『觸電似的看她握著小拳頭』」²¹⁷，言語間全是意淫。從中國女人的旗袍到嬌小的身材，將西方男人對東方女人的凝視（gaze），表露無遺。

牽動世界局勢的台美關係，理應有多種嚴肅的切入點，但平路反覆用「男／美國」與「女／台灣」的關係擬之，甚至連美國當時在二戰傾向中國的大決策，皆以蔣宋美齡這個小女人當作解釋。事件中的男主角「他」也一廂情願的想幫台灣女孩，「他」希望羅洛萊只是白紙一張，永遠茫然無助的望向「他」，彷彿也暗示從二戰期間到當下國際局勢，美國期待台灣扮演的角色正是如此²¹⁸。平路採用此種寫作手法，一方面透過強化女性角色，解構一貫男性中心的莊嚴大歷史，其次，自然也暗示美國強大、台灣接受美國保護的政治現實，並且質問美國看待台灣的心態，以及台灣自我的定位與盲點。

揆一繼任妻子海蓮娜與「他」的妻子，都是精明幹練，不帶情感的西方女性，「面對政治現實的無能為力，平路採用的隱喻是『性無能』」²¹⁹，兩人在婚姻中的挫敗令人聯想起〈玉米田之死〉、〈在巨星的年代〉中已然西化的妻子，國籍不同，但都象徵西方帝國的強勢。此慣用的手法到《婆娑之島》更進一步，兩個西方男人在性與愛上的疲弱不振，都在台灣女人身上得到救贖。

無疑的，在《婆娑之島》中，「娜娜」和「羅洛萊」這兩個女人是台灣的象徵，揆一回顧娜娜時，交錯的畫面是對野性福爾摩沙生命力的深深眷戀，至於現代美國官員「他」甚至自問，女孩如果不是來自台灣，自己會不會一眼就喜歡上她？顯然，兩位西方男性對於台灣女子的迷戀是與台灣島嶼的形象全然重疊的。

薩伊德（Edward W.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提出所謂的東方是被西方所想像、發明的，將東方假設為陰柔、肥沃、非理性的異文明，將東方土地加以異國情調化、陰性化、母性化，常以白人男子對有色人種的女性情愛上的征服，比喻西方對於東方的征服，將不平等的交融合法化。此外，東方人透過西方人的想像來說話，東方是西方人征服的對象，西方有時以富同情心

²¹⁷ 平路，《婆娑之島》，頁 178

²¹⁸ 平路，《婆娑之島》，頁 247。羅洛萊顯然象徵「他」心目中的台灣，文中他的說法是：「在他心裡，羅洛萊就像那個多颱風多地震的島嶼，那麼小、那麼沒有抵禦能力……是個需要被人保護的東西。」

²¹⁹ 林秀蘭，《論李昂、平路與朱天心的記憶書寫》，頁 25

的觀點看待東方，但更常以一廂情願的主體觀點看待東方。西方扮演的是理性的角色，總是被東方的異國情調所瓦解。²²⁰

以此觀之，平路在《婆娑之島》中的安排是否落入薩伊德「東方主義」的陷阱？在書中的確會看到這樣的危險性。揆一將娜娜與舊書插畫中熱帶島嶼女子形象疊合，「幾片樹葉遮著胸前，頭髮長長地垂在腰際，耳邊墜著一朵大紅花」²²¹，將之形容為「每個文明（男）人的夢想」，文字裡全是西方男人對東方女人的肉慾想像；或是「他」形容中國女人的旗袍只開一個小岔，以含蓄的方式引發西方男人無限意淫，此外，「他」總是用「稚嫩」、「小小的」、「白紙一張」之類的形容詞形容羅洛萊，一廂情願認為這個東方女子期盼受到保護，而他是提供保護的強者。

筆者認為平路巧妙的地方在於，雖然西方帝國男性觀看東方女子的方式是東方主義的，但東方女子娜娜與羅洛萊並非全然無助，兩個女人都是有力量的，雖然前者因言語不通、表達有限，後者看似被動柔弱，卻都牽動手握重權的西方白人男性，滋潤兩個在困頓中的西方男人，並且進一步左右他們看待台灣的方式。

吳叡人認為台灣三百多年來陷於帝國夾縫的命運，迫使台灣女子不再天真單純，而是城府極深的生存者，台灣女子的武器是西方自行想像的東方纖柔，利用西方男性自以為是的誤解：

面貌模糊、纖弱柔順的羅洛萊於是可以是一種偽裝，一次源於帝國傲慢的誤解，以及弱者操縱強者的逆襲策略。然後我們會忍不住想像，年輕纖弱的羅洛萊，其實是心思複雜、個性強烈，以歌聲誘人的海妖賽蓮，她體內或許還殘存些娜娜的原始野性與熱情，然而帝國夾縫的命運迫使她成長，變身為一個飽經世故的生存者，從娜娜到羅洛萊，是一個高貴的野蠻人獲得心智的 sophistication，變成精神強韌的演化過程。在這個寓言中，帝國因傲慢而衰頹，弱者則因智慧與行動獲得自由。²²²

²²⁰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出版，1999年），頁78-80

²²¹ 平路，《婆娑之島》，頁158

²²² 吳叡人，〈命運之書〉，收於《婆娑之島》，頁12

在此，從娜娜到羅洛萊，吳叡人認為這正是象徵在國際中較為弱勢的台灣，為了生存而成長蛻變的歷程。平路究竟是以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來隱喻兩國強弱，或是以女性無聲的力量顛覆翻轉原有的權力結構？筆者認為平路的意圖兼具兩者，這符合平路辨證性的寫作方式，她不給單一的答案，藉此增加思考的厚度，也暗示性別權力拉扯的複雜性，此外，這也符合台灣的客觀現實，從領土大小到外交局勢，台灣的確是弱者，但是，弱者也要生存，只是不能大聲嚷嚷，卻非全然無望。

對於台美關係，平路借律師之口，直接指出台美關係裡運用的詞彙，就像一對男女在互相懷疑、互相印證，在中美建交前幾年，臺灣歇斯底里的反應，就像是被男人拋棄的小女人，中美建交後，臺灣就像不死心的前妻，不斷的試探，想要換取某種保證。「美國又好似離婚的前夫，難說是放不下台灣，還是要藉台灣不時刺激一下北京，美國繼續跟台灣密切來往」²²³，以小情小愛的比擬描述原本屬於宏偉敘事的政治關係，頗有顛覆主流的意味。

《婆娑之島》表面上是兩對男女的愛情故事，隱喻的卻是在政治歷史上始終陷入困境的台灣，其中男女族裔的設定，暗指台灣主體有誘引人莫名眷戀的特性，然而，傾向台灣、關懷台灣的國際友人力量如此單薄，三百年來，從揆一到現代美國國務院官員「他」，皆未能阻止台灣被貽誤的命運，只能徒留遺憾。

國族議題和性別議題一直是平路創作中的重要關鍵字，《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裡有多對跨國愛戀的男女，平路透過這些不同族群身份男女，在愛欲的互動糾葛中，隱喻台灣與中國、台灣與美國糾纏不清的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筆者的觀察，平路小說中的男女愛慾，在這兩本小說中有比較溫情的發展。唐毓麗曾在其論文中指出，平路早期的有關女性移民生活的作品，都涉及女性幽閉的生活經驗；林秀蘭進一步指出，這種幽閉的狀態，事實上一直是平路有關女性身體情慾的創作主軸，認為平路關心的多是不再年輕的中年女性的軀體，而「在身體情慾的輿圖上，平路筆下的中年女子，似乎成了『情慾』的絕緣體」²²⁴，她們在「性」方面都是孤寂的，不是受困於母親的掌握，就是遇上不管在性與愛上都自私卻又無力的男人。

²²³ 平路，《婆娑之島》，頁 100

²²⁴ 林秀蘭，《論李昂、平路與朱天心的記憶書寫》，頁 83-92

《東方之東》中的敏惠基本設定符合這個觀察，但經過更細緻的比對，相較於之前平路筆下擔任第三者、守候角色的女性，敏惠應是她筆下第一個出軌的女性，赤裸的承認自己的愛欲需求，雖然最終仍落得情感落空的孤單，但相較平路筆下之前完全被男性漠視的女性，敏惠和謙一雖然彼此錯過，但卻有著親人般的互相關懷，而尚軍設下的愛情騙局雖挫傷敏惠對愛的渴望，但兩人畢竟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美好的日子，尚軍也曾猶豫於是否駐足。

在《婆娑之島》裡，揆一與娜娜的性愛是如此美好，娜娜的肉體對於揆一而言是多重的救贖，她拯救了溺水的揆一，以肉身哺餵虛弱的揆一，以熱情純真的性愛改變揆一在房事上的疲弱不振；至於現代美國官員「他」與羅洛萊的愛與性則是點到為止，但是可以看出「他」是感到幸福的，最終對於羅洛萊仍帶著純情的關愛。

「平路小說中男女情欲的角力，初期女性佔據強勢的主導地位，後期則受制於男性，但對於女性情欲的探究倒是越來越明白而大膽」²²⁵，細究平路作品中的男女關係，男性不管是強勢或弱勢——〈人工智慧紀事〉中的H、〈凝脂溫泉〉中的恭江、〈微雨魂魄〉中的河豚——、《行道天涯》的孫文，都不曾真誠的愛過、溫柔的分享自己的脆弱。相較之下，《東方之東》裡的謙一雖然最終還是辜負妻子，但他一封封真誠剖白的信，已是平路筆下罕見，他甚至為保護弱勢的歡場女子小美拋棄一切，安守一份粗糙的幸福，亦是平路不曾描摹的男性樣貌；《婆娑之島》裡的揆一和「他」，對於台灣女子真誠的戀慕，連帶對台灣這塊土地投入過多的情懷，成為兩位為了台灣而下獄的白種男人。平路讓這兩本小說裡的男人暴露在愛情的風險中，欲望成為女人（國家）可以倚靠的臂膀，是平路小說創作中非常少見的溫柔多情，似乎也可以看見性別的對立在平路筆下已趨緩和。

二、繼承又對抗的父與子

「父」所指涉的不僅是血緣上的父親，而是符合社會刻板印象定義的年長男性，涵括整個社會的父權體系；對於「子」而言，「父」也不只是血緣的連結，而是絕對的宰制與權威的象徵。父與子的概念，在家國的觀念下，等同

²²⁵ 陳韋賓，〈平路小說國族與性別的權力結構研究——兼及其書寫形式〉，頁 66

「大家長」與「晚輩」的關係，可延伸為「君主」與「臣子」的關係，甚至是「統治者」與「百姓」的關係，在傳統的亞洲文化裡，父子關係君臣化，君臣關係父子化，父與權緊密相連，因此，在現代反傳統的思考中，如何意識父權的網絡，對抗父權的掌控，是文學寫作的重要主題。

心理學家佛洛伊德提出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以希臘神話中娶母弑父的伊底帕斯王，說明兒子對於父親的複雜情感。放到傳統中國文化裡，在中國封建穩固的社會結構、國家結構裡，父與子的關係是上對下的關係，不能割捨也不能挑戰。但弔詭的是，在中國父死子繼的傳統上，父子的關係既傳承又對立，兩人不能共享權力，兒子掌權的必要條件就是父親的死亡或失勢，這就是矛盾所在，兒子的權力仰賴父親的血統，然而，若要掌權做主，兒子必然需要執行某種形式的「弑父」。

自古以來就跨文化的台灣，在政治文化上的歸屬四百年來爭論不休，因此，對於台灣文學來說，觸及到台灣認同時，無可避免要討論文化及政治繼承的議題，中國、日本、美國都曾在政治文化深深影響台灣，至今仍在台灣的政治認同中扮演「政父」²²⁶的角色。

台灣現代小說中透過對父親的書寫刻畫身份認同，最具代表性的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旅日青年胡太明徘徊在宗主國中國及殖民者日本間，一再受挫，最後發瘋，道盡一代台灣人尋父的焦慮、無父的悽愴²²⁷。後起女性作家對此也多有著墨：陳玉慧在《海神家族》裡藉由家族遷移的故事隱喻台灣移民混血史，以母系親屬作為原鄉，書中三代女兒都是在父親缺席的狀態下成長，敘述「無父的海島」、「台灣被出賣割讓，台灣被殖民宰割，集體潛意識裡有無父及弑父的恐懼和糾纏」²²⁸；李昂《彩妝血祭》進一步思辨反國民黨的政父權威及重溯台灣獨立的父系族譜，「何嘗不是男性以爸易爸的圈內遊戲？」

²²⁹。

²²⁶ 「政父」的概念借用自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表面》（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²²⁷ 王德威，〈叫父親，太沈重？〉，《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7年），頁197

²²⁸ 陳玉慧，《海神家族》（台北：印刻出版，2004年），頁332

²²⁹ 王德威，〈叫父親，太沈重？〉，《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頁198

在《東方之東》中的男人，隱隱都有著父子之間的矛盾，既有割捨不下的情感與血脈，卻又因為不能割捨的血脈與政經連結而受到牽連與傷害。

在小說中始終只是一抹淡影的鄭成功，給父親的信裡寫著：「但吾父既不以兒而為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²³⁰，不顧父親的反覆勸說，拒絕與父親效忠同一個政權，否決父子親緣名份，顛覆傳統父子倫常的框架。而鄭芝龍作為鄭成功的父親，一方面視之為其需要指導的孩子，擔憂「這孩子會不會越鬧越不像話？」，語氣裡全然是傳統以上對下的評判；另一方面卻又意識到兒子已經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想到的是兒子「不打商量的臉色……眼光中深藏的寒涼，他這個父親看了會害怕」²³¹。

平路選擇以鄭氏父子作為切入點，以他們作為大航海時代的代表性人物，認為鄭氏父子身上都有的如同哪吒一般的叛逆性格：

鄭芝龍與鄭成功父子身上，皆透著這種顛覆與叛逆的鋒芒。鄭成功固然大義滅親，信上寫著「吾父既不以兒為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就此別骨還父；而以人間天上亂一亂的角度來講，鄭芝龍的行徑更酷似那個離經叛道的紅孩兒！大戰荷蘭人的光景，他的船艦左輪生風、右輪噴火，而他在水裡搓洗一下身上的混天綾，就足以翻江倒海，龍宮為之動盪。²³²

父子兩人為了海上霸業做了不同的賭注，鄭芝龍投靠滿清，期盼倚靠背後的大陸帝國發展海上勢力，鄭成功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實則是不相信滿清能夠保障原有的勢力，選擇自立門戶。

同一個故事裡的另一對父子是順治與叔父多爾袞，順治不但狙殺自己稱為「皇父」的男人，奪回屬於自己的權力，對抗母親的不倫戀情，最後一頂軟轎逃離父族留下的江山，徹底放棄接續父權。

²³⁰ 平路，《東方之東》，頁 190

²³¹ 平路，《東方之東》，頁 156

²³² 平路，〈電音三太子時代的鄉愁〉，《聯合報》（2011 年 05 月 27 日）

以三百年前的兩對父子對比現代謙一父子的難題：謙一一生受父親庇蔭²³³，卻也被困在父親的陰影裡，始終認為自己表現不足以作為教授父親的兒子，然而，撞見父親不倫戀情讓謙一對父親的情感亦趨複雜，

站在拉門外的男人，裸露著兩條腿，總之，不像是平日的父親。……看見父親從女傭房出來，那一瞬，我對父親的感覺發生了變化，這一件事梗在我跟父親之間，多希望一把火能夠把所有東西燒個乾淨，最好，把我也一起燒死在裡面。²³⁴

謙一面對父親時既自卑又厭惡，連帶影響對謙一婚姻感情的抗拒，為了對抗父親，謙一藉由婚姻逃離，然而與父親關係密切的妻子成了延伸的牢籠，謙一藉外派大陸為由逃離父親的家國，最後冒用另一個人的身份，捨棄父族給予的姓名，逃離父親安排的穩妥人生，對父親傳承的宗法制度作最徹底的決裂。

三個兒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弑父，斷絕父親的控制，捨棄父族延續的社會階級與家庭財富，追求自身的獨立與自由。

通過大陸男子尚軍之眼光，父子對立更進一步延伸為世代之爭，「當年，廣場上的那件事，老年人看不得年輕人想要造反，也是典型的父子成仇」²³⁵，平路如此解釋中國近代歷史上關鍵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認為這次政治事件是新興人民力量意欲顛覆傳統父權思維的挫敗。

從另一個角度看，順治和鄭芝龍也有矛盾的「父子」關係。順治的角色是額娘和「皇父」的兒子，鄭芝龍是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的年紀與經驗都足以成為順治的父親，想要「像跟森兒說話一樣地跟皇上稟報」²³⁶，然而，在封建制度下，貴為皇帝的順治擁有強大的權勢與武力，鄭芝龍的生死端看順治喜怒，兩人是絕對的從屬關係，皇帝若是沒有開口垂問，鄭芝龍連口都不該開，以此觀之，兩人的角色又是顛倒的——順治為君為父、鄭芝龍為臣為子；然而，鄭芝龍扮演的又是師長的角色，他所打開的另一個世界在順治心裡種下渴望，使端坐在紫禁城裡的皇帝有向外張望的念頭「闔上眼，他隱隱然看見碧藍

²³³ 妻子敏惠是父親的學生，周到照顧謙一所有的生活細節，結婚候住的房子是父親給的，在銀行裡還有一筆錢是父親為他們安排的投資組合。

²³⁴ 平路，《東方之東》，頁 175

²³⁵ 平路，《東方之東》，頁 191

²³⁶ 平路，《東方之東》，頁 189

的海，一官說的，只要走出去，到了海邊，鼻子裡就可以聞到遠方的氣息？」²³⁷，他們的權力關係是多重的，在不見煙硝的對話裡，隱隱爭奪主控權。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出現「老師」這個另類的父親角色，「天地君親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在中國傳統倫理中，老師也有父親的角色，小說裡太多失職的父親，因此溥儀、順治、敏惠，都在老師身上尋找父親。溥儀有莊士敦，順治有湯若望，稱之為「瑪法」，贏得皇帝的信任，他們特殊的外人身份，讓他們在這兩個孤獨的皇帝身邊，扮演皇城裡難得溫暖引導、真心關懷的父親角色；敏惠的父親不能保護家不能保護她，謙一的父親符合她完美父親的形象，於是，相對於謙一父子之間的疏離，反而是作為學生的她與謙一的父親投契，繼承老師的情感、學問、生活習慣，對老師的託付珍而重之。

《婆娑之島》中沒有明顯的父子情結，卻有現代的君臣關係，國家與個人、國家與國家之間背叛與忠誠的辯證。「他」的背後是美國國務院，揆一背後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即便身處掌握權力的體制中，仍只是一個機構中的螺絲釘，「他」與末代荷蘭總督揆一提及台灣時以保護者自居，卻都被指控背叛國家，在國家統御機制裡的多方角力中被犧牲，暗示更高層的父權結構決定小島的未來，不容許身處其中的個人擁有自我意志。

此外，揆一與「他」觀看台灣的方式，在看似關懷情深處，仍不乏單方面「我是為你好的」的自以為是。美國官員「他」自行決定何為有益於台灣的資訊，以此誘惑台灣女子、台灣政府，卻又批判台灣討好追逐美國的政客；揆一擘畫台灣硬體建設，複製殖民母國的城市規劃，繁衍代表母國血脈的生物，以此覆蓋台灣的地貌。對台灣友善的帝國角色觀看台灣的視角終究帶著父權的驕傲，台灣的主體仍然不免被弱化，暗示台灣需要他國「政父」睿智引導。

三、中國、台灣與西方

對於台灣或中國近代歷史來說，西方人在文學中出現時，絕不僅止於展示異國風情，中國人滿清末年的列強入侵記憶，至今仍被統治者用以強化民族主義；而台灣的近代歷史，從葡萄牙人、荷蘭人、日本人，到中國人，無一不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在這個島嶼上插旗，戰後美國雖不曾實際佔領台灣，但是在軍事、文化、經濟、政治上的干預與扶持，都對台灣有實質的影響力，六、七〇年代的小說家已敏感的反應這個社會現象。

²³⁷ 平路，《東方之東》，頁190

陳正芳對於這個文化交流過程下的歷史印記，有此整理：

所以說〈六月的玫瑰〉、〈小寡婦〉、〈蘋果的滋味〉和〈賀大哥〉的美國人形象是六〇年代的歷史產物，那麼，無疑地黃春明的〈我愛瑪莉〉和陳映真的〈夜行貨車〉便是七〇年代的美國記憶，而在此記憶圖景小說中的美國人是跨國經濟進軍世界主角。²³⁸

七〇年代歐美國家將需要勞動力的工業生產，轉至發展中國家，於是形成勞工密集的出口導向經濟。美國對台灣漸次取代多年的美援政策。故此，台灣小說中的美國越戰士兵由公司企業的美國老闆或主管取代〈我愛瑪莉〉和〈夜行貨車〉可為代表²³⁹

王禎和、陳映真和黃春明等人，透過再現台灣人與美日帝國互動的荒謬樣貌，傳達對於美日勢力對台灣影響的省思。

平路長時間於美國求學、工作、成家，在她早期創作歷程中，對於美國空間及人物的描摹集中於「在美華人」，除了《十二月八日槍響時》之外，身處美國的平路作品中較少直接出現西方人，美國在她的作品裡一向只是背景，拉扯著主角內心的始終是那個客觀條件遠不如美國的小小島嶼。然而，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裡，分別出現了西方人的身影，其身份包含「被觀看者」與「觀看者」，背後的心態與關係饒富意味。

鄭芝龍口中描述的外國人充滿獵奇的趣味，固然有著引誘順治皇帝繼續聽故事的機心，倒也是他的真實生活。雄霸一方的鄭芝龍談自己的門衛：「我的門衛，綠眼睛、紅鼻子，喝上幾杯，鼻子就更紅了。雄赳赳地，他們是胸膛一塊塊肌肉的大力士」²⁴⁰，而船舶到岸時，澳門的佛朗機人、雞籠的西班牙人，大員的荷蘭商務員、南京的絲綢商、景德鎮的瓷器商……，各色人種出現在鄭家是稀鬆平常的事。他為順治皇帝描述的澳門充滿異國風情：

²³⁸ 陳正芳，〈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形象建構〉，收於《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跨國流動與地方感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暨南大學，2015年9月），頁256

²³⁹ 陳正芳，〈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形象建構〉，頁256

²⁴⁰ 平路，《東方之東》，頁143

街上走著佛朗機人。佛朗機人雇的黑人奴僕，跟在後面，替主人打傘。怎麼形容主人身上那些奇怪的物件？腿上或長或短的燈籠褲，上面是對襟的緊身衣，並排的金屬釦子，肩膀上還披著一件斗篷，一層層地穿，說多累贅有多累贅。聖上啊，那些洋人的臉，眼睛是混色的，高高的鷹勾鼻梁，底下還留著兩撇八字鬚。²⁴¹

鄭芝龍對於西方人的外貌敘述中有刻意引發聽者好奇的用心，但字裡行間顯然沒有鄙夷蔑視，也非吹捧豔羨，談及西方宗教時心胸開放，沒有貶抑也沒有誇大的批判或恐懼，而是以民間供奉的媽祖娘娘比擬聖母像，反映鄭芝龍不同於陸地思維之處，他的海洋帝國串連的是多元的冒險的世界，不被固定僵化的單一種族所侷限，也不以漢文化為中心。

然而，當時間推進，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使得中國人發展出另一種複雜的情緒。

在滿清末民國肇建之初，中國知識份子鼓吹向西方取經，而中共建國初期一連串的施政錯誤，導致中國民不聊生，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作為西方進步代表的美國在中國人心中有著極高的地位，「美國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初，曾是中國的理想國」²⁴²。然而，另一方面，對於近代中國而言，滿清末年的列強入侵記憶，至今仍被統治者用以強化民族主義²⁴³，以致中國人習慣自我受害人化的國際身份²⁴⁴，而在中國共產黨五、六〇年代的統治方針指導下，「經過多次的政治思想改造運動和宣傳教育，美國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帝國主義的總代表，反美的宣傳成為群眾運動」²⁴⁵，一九九六年由幾位立場鮮明的愛國作家共同執筆的《中國可以說不：後冷戰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成為中國的暢銷書，內容揉雜極端的民族主義與反美傾向，反映中國輿情，雪上加霜，一九九九年的炸館事件後引發另一波反美示威。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

²⁴¹ 平路，《東方之東》，頁 143-144

²⁴² 沈旭暉著，劉永艷、爾雅譯，《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繁體中文版，2015 年），頁 79

²⁴³ 查繼宏，《中國崛起需要大國心態》（臺北市：崧博出版，2018 年）提到，中國有揮之不去的受害者心態，現代的西方人或西方國家對中國任何一次不友好的言行，都會激起中國人的極大憤慨。

²⁴⁴ 沈旭暉著，劉永艷、爾雅譯，《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頁 81

²⁴⁵ 何迪、徐家寧主編，《中美關係 200 年》（香港：中華書局，2017 年），頁 215

放後帶來的快速成長，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經濟軍事上的力量感到異常膨脹的驕傲²⁴⁶，他們相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以一雪中國在晚清末年的「百年屈辱」為重要使命。

除此之外，康培莊指出，鄧小平刻意利用民族主義填補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後的精神空缺：

鄧小平下定決心改造中國，把中國推上現代化的軌道。雖然鄧小平擁有黨政軍的支持，但他需要填補中國轉向資本主義所留下的精神或意識形態的空缺。反對者指控他背棄共產主義和黨的輝煌歷史，而引進精神空缺和拜金主義。面對批評聲浪，鄧小平抓住民眾的民族和歷史優越感，強調他會讓中國重新壯大，再次受到世界尊敬。有鑑於改革在政治和經濟上所帶來的離心力，鄧小平也需要以民族主義為黏著劑，避免中國崩離析。²⁴⁷

根據曾於美國柯林頓總統任內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的 Susan L.Shirk（謝淑麗）在《脆弱的強權》一書中剖析，中國政權為了深化經改，必然與其立國的馬列主義等意識形態衝突，為了鞏固共產黨領導，因此強化民族主義，透過學校教材與媒體動員人民對於國家統治者的擁護，對於台灣、日本、美國的新聞，就算是枝微末節的小事，也容易引發人民情緒。²⁴⁸西方以家

²⁴⁶ 「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林恩·懷特（Lynn T. White）教授認為，中國留學生群體存在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情緒，是中國靠經濟崛起後，國內意識形態的外延。『這些年中國經濟不錯，中共便習慣利用一些政治需要的「國恥」來強化宣傳。』懷特認為，從歷史上來看，閉關自守和民族主義幾乎是所有大國在經歷了快速經濟增長期後的必然結果。」《BBC 中文網，2018 年 5 月 11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4065087>

²⁴⁷ 康培莊（John F. Copper）著，劉泰廷、許劍虹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台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 年 9 月），頁 132

²⁴⁸ Susan Shirk 著，溫洽溢譯，《脆弱的強權》，頁 98-129

長式的心態，一廂情願用西方價值來指導中國人，在中國官方的解讀裡，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抵制中國成長²⁴⁹，背後的目的充滿敵意²⁵⁰。

在這錯綜複雜的背景下，近代中國男人尚軍，與大航海時代的鄭芝龍看待西方人有著不同的態度，尚軍隱晦地提到在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期，自己曾充當西方記者的翻譯，對此，尚軍看法是「外國人對接下去發生的事，充滿了他媽的不懷好意的興趣」，「騙老外還不容易？只要說自己是維權人士，西方女人就有了興趣……，巴著求著陪她們睡一宿。……回去倒跟他們的白種愛人說，東方男人，能耐只一點」²⁵¹，語調裡滿是對西方人的敵意，同時諷刺西方看待中國事務的天真。

尚軍在青春時向西方女人奉上最純真熱烈的情感，最後卻發現那西方女人還有別的男人，尚軍報復的方式是離開前把西方女人的錢全拿走，雖然敘述模糊隱晦，但是可以隱約猜到從此之後尚軍就成了慣犯，用類似的方式找上外地的女人，騙財騙色，然而，尚軍口吻雖憤恨，卻仍總喜歡在外國人多的地方活動，藉口可以碰上教中文的機會。提及尚軍與外國人篇幅雖不長，卻顯然是刻意為之，中國近代歷史對西方帝國的複雜情緒，透過尚軍與西方女性關係裡性的征服與愛的挫傷，迂迴暗示中國人對西方帝國既自大又自卑的情緒。

西方²⁵²又是如何看待中國？美蘇冷戰時期，美國與共產主義的敵對狀況，自然影響美國看待共產中國的態度；然而，1990年代初蘇聯崩潰，冷戰結束之

²⁴⁹ 「根據中國官方所說，這種普世的接受不是因為美國的思想更佳。相反的，因為美國利用二戰後稱霸的有利位置，把它的思想寫入了世界人權宣言和其他人權文件，並且在日本，然後又在南韓和台灣以及全世界其他國家，安置中國視為『西方式』的民主。中國的官員聲稱，今天的美國只是利用民主和人權的思想，來掩蓋它在國內的階級剝削及在國外的新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實力支持軍事實力及經濟實力。美國運用這些思想，將那些信奉社會主義和亞洲式發展權威主義等其他思想的政權予以非法化並加以顛覆。」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施道安（Andrew Scobell）著，何大明譯，《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台北：左岸文化，2018年），頁142

²⁵⁰ 「中國的發言人爭辯說，沒有哪一種文化的人權含意，會比別人的更值得被接受。因為文化標準不同，所以，外國人沒有道德權利來評判中國。若這樣做，就是文化帝國主義。」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施道安（Andrew Scobell）著，何大明譯，《沒有安全感的強國》，頁380-381

²⁵¹ 平路，《東方之東》，頁251-252

²⁵² 在此以美國為討論焦點

後，西方支持與北京廣泛合作，除了龐大的商業機會吸引西方資本家的進入之外，西方政界與學界也有這樣的信念，他們相信：

通過日益密切和廣泛的貿易與交流，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改變甚至放棄其社會政治制度；這是因為中國的改革派將會具有更大的可信性和影響力，而中國人民也會在現存國際秩序裡獲得越來越多的既得利益。北京會變得更加和平，更融入現有的社會秩序體系，成為一個令人期待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²⁵³

然而，近幾年來美國湧起一股反中情緒，源自對中國崛起的擔憂，除了對中國體制的憂慮外，美國人微妙的情感因素也是重要原因。許多美國人在成長過程中，習於美國就是世界第一，不管在經濟科技或軍事上，這個印象已經成為國家認同的一部分。美國在經濟上的衰敗，以致中國一度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對於習慣握有領導權，擁有優越感的美國來說，情感上難以接受，《婆娑之島》中，美國國務院官員「他」即透露對於中國崛起的負面情緒：

近年來，美國一路在走下坡，大多數美國人心裡，這是難以接受的事實……然而，儘管他不會在口裡承認，杭廷頓的說法卻暗合著他自己心底的矛盾。他不習慣眼前的中國崛起，他所緬懷的始終是美國的獨強地位。他經常提起自己剛出道時，那時在冷戰的結構之中，美國是自由世界的一盞燈塔。²⁵⁴

由於敘事手法不同，平路並未揭露尚軍的內心感受，讀者只能以尚軍口吻及行為間接揣想他的真實感受，然而，平路透過大量意識流暴露「他」毫不遮掩的想法。不管如何，中國男人尚軍與美國國務院官員「他」的角色，透露近年來美國與中國矛盾糾葛的大國之爭。

文學常借用性別議題來討論國族關係，除了男女的異國婚戀外，還有娼妓與恩客的交易行為，嚴歌苓《扶桑》以及施叔青《香港三部曲》藉中國妓女既

²⁵³ 王飛凌 (Fei-Ling Wan) 著，王飛凌、劉驥譯，《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的本質》（新北市：八旗文化，2018年11月），頁292

²⁵⁴ 平路《婆娑之島》，頁229

卑微又堅韌的生命，如何在西方帝國男性的蹂躪中苟活，暗指國家面對西方帝國不平等欺凌時，直接衝突的力量雖單薄，但迂迴抗爭的生命力卻讓人動容，以女性性工作者雙重弱勢的角色，加強對帝國強權的控訴。台灣作家黃春明《小寡婦》、《莎啞娜拉，再見》與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亦以娼妓為喻，突顯日本與西方對台灣的經濟剝削和地理政治支配，探討台灣在戰後仰賴美日的經濟，固然成就經濟發展，卻也帶來另一種腐蝕的力量，讓台灣人為了金錢放棄自己的尊嚴，發展專門迎合美日的性產業鍊。²⁵⁵

《婆娑之島》的美國人「他」年輕時在台灣也有娼妓的經驗，在錦州街的酒吧裡認識一個叫「瑪麗」的吧女，但特別的是他的心態，當「他」在瑪麗的房裡酒醒時，「他」最初只想悄悄留下鈔票離開，瑪麗醒來看他準備離開，大聲哭了起來，「他」慌了手腳，把皮夾裡所有的錢掏出來，卻換來瑪麗更悲傷的哭泣。他回想起來的時候，「門口斜放的雨傘還在往地上滴水，屋裡迴盪著溫柔的水光，想到那一夜，他總覺得辜負了什麼」²⁵⁶，與黃春明王禎和筆下帝國男性的剝削角色不同，「他」是溫柔純情的，深怕傷害台灣吧女的心情，這樣角色形象吻合「他」看待台灣的態度。「他」對台灣民主化運動伸出援手，對台灣的處境充滿同情，在國務院同事的聊天裡，不忘隨時教育對台灣歷史無知的同事們，為台灣當下的境遇打抱不平，但也透過他的口，犀利指出台灣為得到美國支持，可悲復可笑的心態：

失意政客在下台後對台灣總顯出特殊的興趣，像是之前A I T的主管，去職後組公關公司，說是幫台灣在華府遊說，其實是打著名目跟台灣要錢。至於受邀到台灣更是常見，卸任的官員絡繹於途，誘因常是那一筆天價演講費。其實也是願打願挨。誰叫台灣人喜歡抱美國大腿，以為只要在美國政壇走過一趟，就會對華盛頓的外交政策發生影響力。²⁵⁷

至於另一個握有實權的西方殖民者，荷蘭末代總督揆一自認真誠關懷這個島嶼，和「那些偽善的家伙」不同。揆一回想起臺灣時，全是對待情人一般的溫柔話語，如「閉上眼，揆一回想起福爾摩沙那溫柔的海岸線，在視覺中無限

²⁵⁵ 葉蓁著、黃宛瑜譯，《想望台灣：小說、電影、國家中的文化想像》（台北市：書林，2010年12月），頁57

²⁵⁶ 平路，《婆娑之島》，頁214

²⁵⁷ 平路，《婆娑之島》，頁259

延伸」²⁵⁸，在寫給親王的信件中，鉅細靡遺回溯那個記憶中的島嶼，從島上自然景觀到純樸島民的生活樣貌，以及自己在這個島嶼上所進行的積極建設，客觀的敘述裡全是瞭解與深情。

他真心愛上福爾摩沙的女人，且肯定福爾摩沙的男人「是勇猛的戰士，徒手打起來，公司的士兵不是他們的對手……我們的人若不是仰靠火藥優勢，對陣中一定敗下陣來」²⁵⁹，也對在荷蘭眼中有如異教徒般邪惡的信仰與風俗充滿理解，接納福爾摩沙上不同人種的信仰：

若由生存環境來理解，異族的信仰並沒有絲毫奇特之處，譬如漢人渡海東來，因此虔誠信奉「媽祖」，同為冒險出海的守護神，這位神格的「媽祖」，與我們信仰的聖·尼古拉斯有許多相近的意涵。而卑職就近觀察，他們認為死去的東西並沒有離去，繼續停留在風裡、溪流裡，族人的信仰中，祖靈的喜怒會影響活著的人，關係著來春的收成。²⁶⁰

他理解人民在荷蘭統治下感受的不平，處處為殖民地福爾摩沙設想，向公司爭取建設福爾摩沙的經費，直陳公司在島上的經營方式忽視住民的需要。

總括而言，中國傳統歷史觀稱西方為「夷」、「狄」，自詡為天下中心，對於西方的事務缺乏平等好奇的眼光，然而《東方之東》中鄭芝龍看待西方人並沒有高下的評價，既不覺得自己卑微也不自以為天朝，展示的是一個更開闊的航海眼光，於他而言，外國人代表的純粹是另一個世界的自然樣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尚軍與西方人真實互動，卻無法帶著這樣客觀開朗的眼光，情緒則是複雜而強烈的，也暗示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讓中國看待西方人無法如同大航海時代一般胸懷開闊。

《婆娑之島》關注的是台灣的命運，卻非常罕見地以兩個西方白人作為敘事者，賦予他們對台灣不符常理的深刻情感，讓他們的情欲與台灣女人身體糾纏，其命運與台灣興衰交纏。揆一和「他」於台灣而言是異族，然而對異域島嶼的過分多情，卻又讓他們在面對自己的族群時，成了異族，被控對自己的國家不夠忠誠。

²⁵⁸ 平路，《婆娑之島》，頁 58

²⁵⁹ 平路，《婆娑之島》，頁 159

²⁶⁰ 平路，《婆娑之島》，頁 188

第二節 書寫與對話

傅柯（Michel Foucault）重新演繹「論述」（discourse）的概念，認為話語不只是傳統的概念的言談行為，它是一種陳述系統，人們透過「論述」自身來認知世界並且生產意義，形成隱藏在人際間的權力網絡，在「論述」的背後，存在一種意圖支配他人、建構制式知識，且有排他性的「真理意志」，透過權力，人們可以決定何者是該被認知的「真理」、誰有權得知、什麼是合法的、誰有正確的位置來應用知識，以排除與馴服客體。²⁶¹

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可以讀到人物之間論述的流動，以及透過不同的語言形式——對話、書寫——搶奪論述權的努力。

范銘如觀察到「在平路過往的作品裡話語的力量和物質的樂趣是反覆出現的母題和內容」²⁶²，平路個人在多次訪談中提及自己對於文字話語力量的迷戀，也嘗試在作品中透過人物設定、結構安排，辯證話語的真實。

我是個寫字迷。

再不寫下去，就要忘了。

寫著，終於還是痛的，當文字過分逼近生命的真相，就好像蘸著自己的血在書寫。

這樣的寫字，不只是寫字而已，那是讓生命死去再重新活起來的過程。

²⁶³

書寫與被書寫始終是平路創作中的重要命題，除了作家本身非常看重書寫的價值，珍惜可以書寫的美好，也因為作家對於歷史與記憶如何被解讀非常關注。

平路一九八八年作品〈在巨星的年代〉中，赫醫生找槍手「我」來為台灣女性劉瓊月作傳，偽裝是女性、台灣主體的聲音，然而這個女性從頭到尾是缺席的、空白的，任人創造塗抹的。

蘇珊·格巴曾就此現象討論女性長久被視作等待書寫的空白之頁，缺乏自我形塑的主體性：

²⁶¹ 有關傅柯的「論述」概念，可參見：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的通用詞彙編》（台北市：麥田，2003年），頁 82-85。

²⁶² 范銘如，〈歸去來——《東方之東》序〉，《東方之東》，頁 7

²⁶³ 平路，〈文字情迷〉，《巫婆的七味湯》（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頁 122-125

陰莖之筆在處女膜之紙上書寫的模式參與了源遠流長的傳統的創造。這個傳統規定了男性作為作家在創作中是主體，是基本的一方；而女性作為他的被動的創造物——一種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體，常常被強加以相互矛盾的含義，卻從來沒有意義。²⁶⁴

這樣的質疑與諷刺在平路在一九九八年創作的〈百齡箋〉更進一步，將書寫權交到女性蔣宋美齡的手中，夫人透過書信書寫，以強烈的意志力決定自己將在歷史中如何被書寫，「夫人心思細密，許多信都是要留作研究民國史的檔案」²⁶⁵，她的書寫是有意識地留存／製造證據，用書寫鞏固丈夫的歷史地位，藉由捍衛丈夫的歷史定位來保障自己的尊榮，甚至也在書寫中捍衛自己在丈夫愛情中的地位，深怕「祇要她鬆懈下來不再繼續寫信，由著別人去說長道短，她對自己的婚姻實況便沒有置喙的餘地」²⁶⁶，女性的書寫看似擁有了主導權，可悲的是，蔣宋美齡爭取這個主導權卻是為了鞏固自己在男性權力身邊的位置。

這勤奮的書寫是與世人爭奪詮釋自己生命的權力，蔣宋美齡為丈夫書寫，也為自己書寫，因為：

一本本未經授權的傳記、未經批准的小說，書裡甚至仿真她的口氣、偽造她的信函、誤解她的想法，這都因為沒有了權勢。夫人益發感覺丈夫應該無所不在，她必須提醒國人，你們曾經多麼愛戴他，你們怎麼可以忘記呢？²⁶⁷

兩種書寫的對抗，哪一種才是真實？最為弔詭的是，作者的〈百齡箋〉，正是「未經授權、未經批准、仿真她的口氣、偽造她的信函、誤解她的想法」的作品之一。在《何日君再來》裡的自述手稿，連抄的筆跡似乎都不一致，後面幾份自述由手寫稿變成打字稿，讓理應最真實的自述疑雲重重，平路在細節裡提醒讀者書寫與言說的不可信。

平路談及創作，曾說：

²⁶⁴ 蘇珊·格巴著，孔書玉譯，〈「空白之頁」與女性創作力問題〉，收錄於張京媛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65

²⁶⁵ 平路，〈百齡箋〉，收於平路《百齡箋》，頁157

²⁶⁶ 平路，〈百齡箋〉，收於平路《百齡箋》，頁182

²⁶⁷ 平路，〈百齡箋〉，收於平路《百齡箋》，頁194

歧路麼？那是一條條蘊含著無限可能的岔道，每一條都值得我們睜大眼睛，好奇地走下去。當我們迷途不知返，歧路終於換來了最後自由，對文字作者來說，家園在望，從此可以安頓身心了。²⁶⁸

對於書寫者來說，只是開啟追問思辨的路程，而非揭示正確唯一的答案，平路筆下人物的書寫試圖創造記憶、創造真實，平路卻不希望讀者太輕易相信話語的詮釋，她無意提供一個簡單的正確答案，而是從底層去鬆動人們固著的想像

《婆娑之島》中有揆一孤獨的書寫，寫一個已經沒有人關心的真相，寫一個在大國利益思考中總是被貽誤的島嶼。書寫理應奠基於真相，對話應是為了追求真相，但是平路對此毋寧是悲觀的，「教會與公司聯手，編織島民嗜殺的指控，模糊了福爾摩沙的真實風土」²⁶⁹，這一切都讓揆一喟嘆，福爾摩沙的真相是否就要被泯滅遺忘了。

揆一的書寫絮絮叨叨，瑣碎細數福爾摩沙的物產、他的具體建設，在瑣碎中看見他固執的真心。然而，揆一的書寫卻也是充滿目的性的，

目前寫信的對象，在福爾摩沙潰敗的那一年，才是一個十二歲的少年，所以他必須讓自己語出驚人，他正以警語的方式寫下：「巴達維亞評議會的貽禍，貽誤了福爾摩沙，更肇致尼德蘭的黃金年代一去不返。」²⁷⁰

一如《百齡箋》中蔣宋美齡的寫不完的信，史料裡戰敗歸國的揆一並沒有寫這些信件，平路痛快的在歷史的縫隙中為主角寫了這些信，書中角色的急切呼告，既是為自己喊冤，也是平路為島嶼吶喊。

《東方之東》中，敏惠是一個寫字的女子，書寫是她的工作，也是她倚仗的生存方式，可以活在不容易被人干擾的世界，抵抗對婚姻和丈夫的失望。她發癡的想著應當每天寫給失蹤的丈夫一封信，也許這一封封寄不出的信就會奇蹟似的將丈夫牽回身邊。然而在書中彷彿告解一般的，懇切地寫著一封封信，卻是平常不寫東西的丈夫謙一。

²⁶⁸ 平路，《百齡箋》（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頁7

²⁶⁹ 平路，《婆娑之島》，頁190

²⁷⁰ 平路，《婆娑之島》，頁3

書中五封長信，前面四封信是謙一寫給敏惠的，既敘自己與父親間的過往，也剖析面對婚姻的心情，最後坦白自己的處境。最後一封信的書寫者是敏惠，她結束在北京一切後回到台北，接到謙一前四封信，既回覆謙一，也告白自己的心情。

平路代替謙一和敏惠寫了交心的長信，不同於《捕諜人》與男作家搶奪主導權的書寫，也不是《百齡箋》中充滿塗抹化妝的歷史詮釋權，沒有刀光劍影、也沒有爾虞我詐，而是各自誠懇坦承自己在原生家庭中受的傷，以致用錯誤的方式面對婚姻與愛情。

在此同時，敏惠的小說書寫集中在三百年前鄭芝龍與順治的對話，短暫而奇異的時光縫隙，是繼承老師的史觀，也是對丈夫謙一所說「告訴我，怎麼樣才能夠自由自在？」的回應。

揆一的書寫讓他穿越時空，為自己留下唯一的辯護，《被遺誤的台灣》這本書獲得廣泛的閱讀，書中詳細的紀錄與縝密的思緒鞏固他被冤屈的論點，他以嘲諷的文字描寫造成他一生悲劇的頂頭上司與評議會成員，在《婆娑之島》中「他」偶然翻閱到 C.E.S.所著《被貽務的台灣》，感傷兩人命運竟是如此相似，成為「他」與揆一橫跨三百年的敘事中巧妙的連結。

書中人物除了以書寫表達自己外，平路也安排了不同立場的人物對話：父與子、男與女、陸與海、西方強權與東方小島。平路試圖在虛構又真實的小說裡展開溝通，然而溝通卻是徒勞的。有些關係欠缺對話：謙一的父母親、謙一父子；有些對話來得太晚：謙一與妻子敏惠；有些竭盡努力的對話毫無結果：尚軍敏惠、鄭氏父子、「他」在法庭上的辯詞。

兩岸分治多年，官方的對話充滿詭譎的算計，不管表面上是激烈的互相喊話，或是口號友善的代表對談，兩岸統治者始終無法達成共識，而平路在臨時借用的旅館空間裡，安排台灣女人敏惠和大陸男子尚軍這兩個毫無決定性的角色，展開一場兩岸人民的對話。透過對談，兩人分享一九八九年兩地的政治事件，兩個人所旁觀的廣場事件，暗示兩岸的政治發展是如此相異，卻也曾有過這麼靠近的時刻，如同兩個廣場抗爭乍看如此不同，但骨子裡都是對於改革開放的渴望，台灣的野百合運動，在廣場上的學生們聽的甚至是中國歌手崔健的歌曲。然而，一九八九年前後是兩岸改革的分水嶺，台灣的抗爭時代轉變了集權封閉的政治社會，而中國的那場抗爭的挫敗，確立中國政府經濟開放、政治集權的執政方向。兩個充滿歷史的廣場，如今的台灣視之為日常悠閒的所在，

而中國的廣場卻是肅殺的，「靠近了，像是靠近黨紀國法」²⁷¹，象徵兩個社會截然不同的選擇。台灣人敏惠和中國人尚軍，乍見時兩個人有著同樣的關鍵詞，彼此深入闡釋核對，才發現裡面的內涵與觀點截然不同。

面對著尚軍，兩人怎麼也說不到一塊兒去。敏惠心裡想，原來人與人是那麼難溝通，也因為各有各的心事，聽什麼都像是隔了一層，聽不出事情的原委。²⁷²

敏惠和尚軍的對話，常常是各說各的，敏惠談回家，尚軍認為離家是群體現象；敏惠對北京有著中國古典的想像，想著是文人式的隨意，尚軍卻不以為然，想著的是當年北京城裡廣場上的那一場時代混亂。敏惠有對於中華文化的嚮往，在她佈置的空間充滿了傳統中國的符碼，海棠、石榴、太湖石、芭蕉，隨手拈來就是傳統的燈謎。敏惠對北京胡同、舊建築也充滿嚮往，看北京的胡同名字，覺得非常有意思，對於這樣浪漫的想法，尚軍不客氣地提醒她：「你覺得有意思的，都是當時喊打的一些東西，太可怕了」；經過文革的尚軍強調自己不相信人，但敏惠則相信人與人之間重情義的那一面；敏惠談台灣與中國，台灣是四季常綠的，相較之下，中國是乾枯的，但尚軍的回應則是「人定勝天，我們在沙漠裡造綠洲」²⁷³，背後是全然不同的思維邏輯。

兩人的對話也反映兩岸語言系統的差別，敏惠等待謙一，腦袋裡想的是孟姜女、是〈上邪〉的中國傳統貞潔女性圖像；尚軍對於這些傳統中國符碼不屑一顧，充滿嘲諷，以冷笑回應：「堅貞！你可以給自己豎個牌坊」、「你說得可真超現實」、「有啥意思」。敏惠聽不慣北京人口中「搞」、「弄」、「幹」、「辦」，讚賞的是台北便利商店裡有禮客氣的招呼；對於敏惠搬弄台灣歌詞裡的「生死難猜」、「秋心拆兩半」²⁷⁴的古典意境，尚軍只覺這些都證明敏惠太閒、對他人怎麼過日子不了解；敏惠過分文藝古典的口吻腔調，對比的是尚軍永遠開口都夾雜著粗話的說話方式。

所有的對話最終都是徒然。《東方之東》裡，順治皇帝與鄭芝龍展開對話，彼此各有心事，順治想著的是不可輕易露出心跡，鄭芝龍想著的是如何以

²⁷¹ 平路，《東方之東》，頁 113

²⁷² 平路，《東方之東》，頁 117

²⁷³ 平路，《東方之東》，頁 106

²⁷⁴ 平路在《東方之東》中暗引台灣作詞者方文山的歌詞，方文山的歌詞充滿中國古典意象，

海洋引誘皇帝，為自己帶來一線生機，最後皇帝出走、鄭芝龍滅家；敏惠反覆思考台灣和大陸究竟差在哪裡，嘗試與尚軍針對兩岸的記憶與觀念展開深度對話，然而果然就如同尚軍所嘲弄「你們台灣人就是好騙」，在冷風中被吹醒的敏惠最終全然落空，不但在情感與金錢上都被狠狠欺騙，也讓大陸官方留下把柄，只能頹然返台。

值得注意的是《東方之東》裡的中國官方語言，在改變敏惠與謙一生命的事件裡，在充滿個人生命掙扎與內在拉扯的對話或獨白裡，它是個突兀的存在，不同單位有著不同的冷漠。作為門面的臺辦發言總是空洞而官樣：

台灣在大陸發生案例只是個別的、偶然的。在祖國大陸投資的臺商在安全上是有根本保障的，投資、生活的環境是良好的……北京有關部門表示，將進一步加大打擊各類犯罪活動的力度，堅決維護良好的社會環境，為臺商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²⁷⁵

話語的對象並非敏惠個人，而是對所有面目模糊的台灣人民，想解決的也不是問題，無意消解敏惠的焦慮，只是用一套漂亮空泛的言詞修飾表面的假像。

至於直接處理案件的公安部門，向敏惠展示「九·二三」台商案件的細節，認為台灣人喜歡露富，自己招搖，給人可乘之機²⁷⁶，例行的報告更是處處機鋒，表面冠冕堂皇的表示將給予台灣人民協助，實則有技巧地把責任推給敏惠。官方報告裡是照著紙條唸的清楚數據、硬生生塞入法律條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六十九條的繁瑣內容、冗長的發文單位放入敏惠焦躁而徬徨的尋人旅程中，更顯得官方單位的冷漠。有單調生硬的男性領導報告，也有女同志的另一種攻勢，她們有技巧的緊迫盯人，懂得「放軟聲調」、適時「語氣一轉」、以「盯住」、「不放鬆」給予心理壓力，敏惠意識到對方的用心，卻又只能虛弱的辯解。

另一個官方語言就是在北京隨處可見的標語，不是冠冕堂皇的「投資者的樂土」、「打黑除惡不放鬆，共建和諧社會」，就是語帶恐嚇威脅的「每一處牆上都寫著：堅決打擊藏匿、勾串、詐騙、官倒與一切違法活動……『勾結外人者從重從嚴處理並追究一切相關刑事責任』」²⁷⁷。官方的語言無意雙向溝

²⁷⁵ 平路，《東方之東》，頁 16

²⁷⁶ 平路，《東方之東》，頁 36

²⁷⁷ 平路，《東方之東》，頁 135

通，只是單向的傳輸，為了要打破這樣單向的溝通，敏惠在與官方的對話中，學會做戲，學會在辦事之前「搶在前面說，我是臺胞，我在找我丈夫，我丈夫是台幹」²⁷⁸、「兩岸可都在關注這案子的進度」，學會拉扯著女幹部的袖子，大聲嚷嚷。

象徵台灣人民與中國官方的溝通是挫敗的，敏惠無法在官方的語言中找到任何實質的幫助，謙一在大陸的台灣同事告訴她的「開門招商，關門打狗」才是非官方語言的真實。

類似的，《婆娑之島》中有兩種特殊的語言形式，一是法庭上的對話，二是外交辭令的對話。兩者都是高度精緻的語言形式，字斟句酌，卻常常包裝著赤裸的利益，最文明卻也最野蠻。

法庭上的文字攻防，審理的不僅是美國官員「他」的叛國洩密罪行，也審理美國與台灣的關係歷史。辯護律師以美國一九七二年簽署的「上海公報」強調台灣屬中國的一部分，並非一個國家，因此，「他」並未主動通報自己的台灣之行。律師以此為「他」通關申報時隱瞞台灣之行辯駁，法庭上的歪理辯護反映的是現實的荒謬，諷刺美國與台灣政府維持實質關係，官方卻宣稱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另一個特殊的語言形式為外交詞彙的運用藝術，「他」分析在國際外交場合上的談話，字裡行間都有奧秘，溫家寶在澳洲國會聯席會議演說中，說道：「早在一四二〇年代，中國的船隻就已經抵達澳洲海岸」²⁷⁹，這一段看似毫無波瀾的一段話，經過「他」的分析，隱喻著中國對外界只有平和的善意，但提到「朝貢關係」卻又隱然暗示中國與週邊國家相處可能會採取的模式。台灣的命運多年來受制於國際外交，以致對這些語言更加敏感，在台美中的外交談判檯面上用語模糊，卻實際左右台灣的命運，強國用「認知到」、「不表異議」等外交詞彙，匆匆決定台灣的國際位置²⁸⁰。

「他」為台灣做的也是外交辭令的安排，如在為布希總統起草國情咨文時偷渡了小小一段，強調跟台灣的友好關係，只不過這樣的努力也是徒然，「被刪後，換上的一段又是老套，重申中國是美國重要戰略夥伴的場面話」²⁸¹。

²⁷⁸ 平路，《東方之東》，頁 38

²⁷⁹ 平路，《婆娑之島》，頁 123

²⁸⁰ 平路，《婆娑之島》，頁 72

²⁸¹ 平路，《婆娑之島》，頁 56

平路選擇這一類語言的呈現，揭露始終在大國夾縫中的台灣，幾次歷史的轉折都不曾參與討論，就在大國的外交協商中被安排未來，這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對於國際外交語言的敏感與操作的細膩，代表的就是對國際外交的敏感度，是台灣不得不學習的一門功課。

在法庭上，律師提出一段耐人尋味的辯護「這個案子的被告，所陷入的，其實是曖昧詞彙所構成的語境」²⁸²，話語的力量竟是如此強大，營造的語境足以讓一個經驗豐富的美國外交人員在自己最熟悉的領域失足。尚軍也指出敏惠的語境總是逃亡，書寫者的生命和語言互相滲透。

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平路藉由人物的書寫與對話，搶奪自我詮釋的主導性，相對於人物發自內心的書寫與對話，表面高尚文明的官方言語作為陪襯的存在，突顯真誠溝通的徒勞。

第三節 人物之間的隱形關係

除了明顯可見的男女愛戀、父子情仇、種族情結，《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角色之中，也可在看似平行、不相干的人物中找到隱形鏈結，例如：《東方之東》中的逃、《婆娑之島》中的遺誤與背叛。

從一九八三年〈玉米田之死〉開始，逃亡就是平路筆下反覆出現的主題，楊照認為平路在摹寫「內部逃亡」的苦痛上發揮得淋漓盡致，和她長期身處異國、思索認同的經驗有關。「平路最關心的主題本來就是人如何被切斷與主題、社會關切的定著安全感，又如何掙扎於『是或不是，活或不活』（to be or not to be）的存在底蘊矛盾間」²⁸³。〈玉米田之死〉中陳溪山追尋台灣故土，最終以自殺逃離禁錮，魂歸故土；《行道天涯》中以孫中山與宋慶齡離開南方，北上的最後一段經歷為敘事時間，書寫兩人為局勢所迫的最後流亡路途裡的脆弱，而宋慶齡之後漫長的寡居生涯裡，則是套上永遠無法逃脫的國母枷鎖；

《何日君再來》裡大明星逃亡異地，期盼能夠隱姓埋名過平凡人的日子，小說中以大幅彷彿諜報電影畫面的奇險歷程，揣測她最後的逃亡；除此之外，〈暗

²⁸² 平路，《婆娑之島》，頁 100

²⁸³ 楊照，〈歷史的聖潔門背後——評平路長篇小說《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6 期（1995 年 4 月），頁 159

香餘事》裡的駿二、〈尋人啟事〉裡的世一，到《東方之東》裡的謙一，都從婚姻中逃走，在《東方之東》裡，謙一的逃亡，近因是捲入風塵女子小美的糾紛中，遠因則是為了逃離教授父親的陰影。

《東方之東》裡逃亡的男人還有敏惠筆下的順治、大陸男人尚軍，以及葡萄牙詩人卡梅洛·庇山耶。謙一和順治的逃亡是為了離家，離開物質不虞匱乏但心靈蒼白的家；葡萄牙詩人卡梅洛·庇山耶也逃到澳門，在他筆下的東方之東找到生命的平和之感。至於尚軍，始終都在逃，但逃躲的究竟是什麼非常模糊。他闖入敏惠生命的藉口是逃，以旅館外面可能並不存在的公安追捕作為藉口，在閒談中談及他如何因為逃亡而感官更靈敏，對於無法說明逃亡的理由。然而，與想逃離家的謙一與順治相反的是，自稱在逃的尚軍渴望的卻是回家，過上小鍋小灶的滋潤生活。

書中另一個與逃有關的男人，是想逃卻逃不出來的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溥儀離開紫禁城後卻又離不開皇室陷落的哀嘆、離不開之後一連串的政治拉扯，始終沒有能夠脫逃成功，對此，尚軍的評論則是：「我早講過，一代一代中國人，多少逃不出去的故事」。

《東方之東》中充滿想逃、正在逃，或者逃不出去的男人，《東方之東》裡年輕皇帝與謙一口裡悠悠說出：「怎麼樣才能自由自在」，張雪姦認為「平路的逃亡主題，顯現出的終極目標是一種不必在乎他人目光、完全放鬆的自由自在境界」²⁸⁴，與平路散文裡透露的心事結合，可以看到「平路寫逃亡，其實，她是寫自己。她似乎從來沒有感覺過『家』的必要。真正的快樂，就是自由自在，無視於旁人的存在，而生命的至高境界，永遠無法與人分享。」²⁸⁵

無論《東方之東》或《婆娑之島》，在這些人與人的關係裡，「背叛」都是一個關鍵詞。謙一的父親、謙一敏惠夫妻背叛婚姻；謙一、鄭成功背叛父親，逆反父親安排的人生；尚軍背叛敏惠的信任；「他」與揆一被控背叛國家，然而在他們的故事裡，卻哀嘆被自己的同胞背叛、台灣被自己的國家所背叛、遺誤。

²⁸⁴ 張雪姦，〈逃亡密碼：平路寫解構遊戲〉，《當代華文女作家論》（台北市：新銳文創，2013年5月），頁139

²⁸⁵ 張雪姦，〈逃亡密碼：平路寫解構遊戲〉，《當代華文女作家論》，頁148

《婆娑之島》裡「遺誤」與「背叛」兩個字詞反覆出現，互為因果。揆一的罪名是「叛國」，因為他貽誤了福爾摩沙，失去公司最有前途的根據地。他則控訴巴達維亞評議會的顛預決策貽誤了福爾摩沙，他的同胞背叛了他。

類似的關係出現在美國國務院官員「他」的身上，「他」的罪名也是背叛國家；「他」則痛批美國為了現實利益背棄盟友，背叛台灣信任。他對於舊秩序的眷戀，嚮往維持強大美國對弱勢台灣的支持，反倒成背叛的罪名——因為不願背叛而造成的背叛。

除了以上討論的幾個關鍵詞外，《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都用了「餌」的比喻，將鄭芝龍與順治、「他」與羅洛萊都描述成捕獵的關係，同樣的，現實的台中美關係，不也都是比較著誰能夠佈下最誘人的餌，在爾虞我詐的國際關係裡，誰是魚，誰又是佈餌的釣者呢？小說裡男女的攻防暗指政治角力詭譎，耐人尋味的是，《東方之東》中也用了魚與魚餌的比喻，對內陸政權清順治皇帝來說，鄭芝龍是餌，朝廷希望能用他釣鄭成功；弔詭的是，在陪侍順治皇帝的機會裡，「鄭芝龍意會到，自己說的故事是餌，一旦皇帝對故事好奇，就換成皇上落入自己的漁網裡」²⁸⁶。複雜的政治關係裡，每一個人物／政治實體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單一的，既是佈餌的釣者，一不小心也可能成為被覬覦的吞餌魚。誰是吞餌魚、誰是佈餌者並沒有答案，自以為掌握全盤的十六世紀商盜集團首領鄭芝龍與美國現代官員「他」，跨越數百年的歷史、幾千里之遙的空間，皆以言語資訊為餌，信心滿滿操弄年輕未經世事的對象，最終卻陷入自己精心的佈局，承受意想不到的後果，全盤皆輸。

這些關鍵詞在小說中反覆出現，表現平路對這些概念的關注，而這些概念出現在原本看似沒有關聯的人物間，埋入小說作為隱形連結，無形中加強人物的關聯性，增加情緒的密度。

第四節 小結

仔細爬梳《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可以看出平路從角色關係、書寫對話中，既建構小說本身的故事性，亦藉此巧妙隱喻兩岸關係、台美中關係。

²⁸⁶ 平路，《東方之東》，頁 132

透過書中男女愛戀、父子糾葛的關係，隱喻美中台關係與兩岸關係，既有權力的拉扯，又有情感與記憶的牽絆。然而，書中不管是男女之情或是父子之情，最終都付出極大的代價，身陷囹圄或是毀家去國，雖不致證明這些關係的無望，卻至少說明望向美好結局的艱難。小說中安排荷蘭人、美國人、中國人和台灣人對於台灣島嶼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呈現不同時代的中國人看待西方人的心態，反映中國與國際關係的變化。

書中角色不斷的自陳心意，不管是孤獨的絮絮叨叨，或是各懷心事的對話，都是徒勞無功，台灣的定位與認同也是這樣眾聲紛擾，難以取得共識；書中亦穿插官方語言、法庭語言與外交語言，文明精緻卻空洞無實質保障，一如台灣現實時時深陷國際角力的詭譎不安之中。

在這些話語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失語與失效的現象，《婆娑之島》中的台灣女人都是失語的，她們沒有自己的聲音，只活在西方帝國男性的敘述中，一如沈默無聲的台灣主體，在眾多大國的詮釋中，她並不能為自己說話，只能迂迴的展示自己的美好，透過其他人為自己發聲。

兩本書中的對話與書寫也是跨越不同經驗世界的嘗試，然而不管是書寫或是對話，都是失效的。來自海洋的鄭芝龍面對來自草原的順治，「他眼前的難題是：怎麼用語彙去跨越完全不同的經驗世界」²⁸⁷。《東方之東》中，敏惠的書寫留不住尚軍、謙一，敏惠和尚軍終究無法通過對話理解彼此的邏輯思維；《婆娑之島》中，美國國務院官員「他」和揆一嘗試為自己和島嶼命運發聲，卻得不到國家的正面回應。使得關心台灣命運的讀者也為之發出深深嘆息。

除了藉由人物之間的設定與互動來彰顯小說命題外，平路也在看似毫不相關，生命並未彼此關聯的角色之間，埋下隱形的連結，密織網絡，多處呼應，讓多條故事線的人物，即便跨越不同時空國度，也隱然有著同樣的困境與追尋，探討跨越時空的本質性問題。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兩書有其互相參照討論的價值，在角色隱喻、書寫對話以及隱形關聯上，出現多重類似的元素，反映在平路對性別政治的關注，以及那個階段所關注的議題、寫作的習慣。

²⁸⁷ 平路，《東方之東》，頁 151

第五章 結論

平路長篇小說《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兩書出版時間相距不到兩年，兩本小說從書名與形式設計即有所呼應，在創作手法上有相似之處，書中所關注主題也能互相補足，筆者透過「新歷史主義的體現」、「空間意涵」、「性別政治」三個面向切入，經過文本分析，深刻感受到兩者各自獨立卻又遙相呼應，可以兩個部分歸納：在藝術手法上，於平路的創作脈絡中有所延續有所創新，在主題思想上，思索的是島嶼向外的想像與向內的回歸。

一、藝術創作手法的沿續與創新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兩部小說創作延續平路多年來積累的創作能量，延續對台灣島國的關懷、對於新歷史書寫的關注，亦有創新的部分，採取既直視台灣現況又抽離台灣內部的視角高度，透過不在台灣或不是台灣人的敘事者，討論現下台灣的處境。

平路的新歷史寫作嘗試，在《行道天涯》、〈百齡箋〉，以及《何日君再來》已有出色表現，《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延續既顛覆又交流的寫作手法，同樣有著多重敘事、在歷史的縫隙中想像，以及以邊緣解構中心的特點。其多元拆解的小說結構形式，在《何日君再來》、《行道天涯》已有初步運用，至《東方之東》、《婆娑之島》更見精巧，可以各自獨立閱讀，又能以不同方式重新組合閱讀，在形式上解構單一線性敘事，創造更大的想像空間；以不違背史實的原則，找出時間縫隙創造可能，不管是鄭芝龍與順治皇帝的對話，或是揆一與美國國務院官員「他」的心事，都是在歷史的縫隙中想像；此外，兩書聚焦於已被台灣官方歷史邊緣化多年的海洋史觀，並為歷史邊緣的鄭芝龍、荷蘭總督揆一、遭控叛國的美國國務院官員「他」力轉視角，聽其心聲。

在此基礎上，平路進一步透過空間意涵、性別政治切入，深化討論。其藝術創作手法，看得到平路過去的影子，卻也讀到其不被侷限的創新手法。

首先是在空間意涵方面：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觸及多處地理空間，書中橫跨的多重空間，牽涉數國，再加上三百年的時空變化，書中空間更形遼闊，筆者認為平路對於台灣、北京、荷蘭與澳門這些地點的描畫，目的絕非僅為製造小說可看

性。台灣空間裡呈現脆弱的家屋空間、多汁卻危險的野性台灣，以及從戒嚴到解嚴的騷動台灣等樣貌；北京空間呈現了古典中國傳統與現代資本面貌的新舊矛盾；荷蘭空間則是影射台灣的選擇，選擇海洋開放或是階級閉鎖；澳門空間裡的文化混雜與鬆散結構，帶來的是失根或是自由的思索。關注的是台灣，卻透過不同角色，從荷蘭、美國、北京、澳門等不同地理空間發聲，顯示台灣的命運從來就千頭萬緒，在國際不同勢力的角力中，然而，不管從哪裡出發，台灣仍然是平路最後的座標。

另外，筆者亦嘗試將書中的空間分為政治空間、情欲空間、家屋等三個概念性空間分析。其中，平路透過廣場、紫禁城、熱蘭遮城這三個政治意味濃厚的空間，挑戰單一的宏偉政治敘事：究竟廣場屬於統治者抑或屬於人民？紫禁城是宮殿抑或牢籠？城堡是強大的防禦建築抑或困窘的圍城？書中讓巨大的政治建築都有脆弱的一面，藉此顛覆不可被顛覆的官方論述。

情欲的探索對於熟悉平路作品的讀者來說，並非陌生的關鍵字，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情欲的討論不僅限於性別議題，書中情欲空間從壓抑到釋放、從原始活力到隱晦難明，既是書中台灣女性角色的情欲展現，也暗示台灣主體的選擇與可能面對的風險。

平路對於器物、飲食的描摹，在過去的書寫已略見端倪，在此更進一步藉此展現身份認同、主體性的拉扯；透過書中人物一再重複對空間的追懷、重建，讓空間數度成為敘事的主體。

透過空間書寫展現思想的寫作策略，平路在過往已有著墨，但筆者在梳理文本後，肯定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中的空間帶有更多重的企圖，值得更用心的閱讀。

其次在性別政治，《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透過跨國情事、不同國族對話，使得人物的關係充滿多重寓意。書中跨國愛戀的男女，隱喻台灣與中國、台灣與美國糾纏不清的關係，情欲的拉扯或者交融，對抗或者拉攏，就是台灣在複雜國際關係裡的矛盾與掙扎。小說裡繼承又對抗的父子關係，象徵了身份的認同與斷裂，書中以不同形式「弑父」的兒子，欲望顛覆的不僅是單純的父親形象，也是無所不在的國家父權。另外，《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裡出現的人種多元，不管是被敘述者或是敘事者，都隱隱透露台灣、中國，與西方文化政治在不同時期的碰撞，多種聲道的交流。人物的思想傳遞，有思想流動的對話，也有自我表述的書寫，平路透過這些方式，搶奪自我詮釋的主導性，相對於人物內心而發的書寫與對話，並以表面高尚文明卻虛假殘酷的官方言語作為陪襯的存在。

多元空間書寫與人物角色多元文化，巧妙隱喻國族的交流與衝擊，暗示台灣始終在歷史夾縫中被拉扯，無法自外於多種權力的爭奪，以此省思台灣如何面對自身處境。

值得一提，平路身世的追尋在這幾年有突破性的發展，似乎間接影響平路的書寫方式，對於筆下永遠對立無法交流的男女，給了一絲希望與溫柔，即便最終仍是分離收場，但在生命交會的某一刻，他們是帶有真心的。

二、島嶼向外的想像與向內的回歸

平路的作品裡有一條對台灣政治歷史的書寫脈絡，最初的留美時期，是從由台灣男性角色從美國回望台灣，面對台灣的鄉土有徬徨猶疑，卻又眷戀不捨；接著是以科幻後設的方式，以對未來的揣想，思考台灣當時的問題，已有對於台灣命運的憂慮；另歧出一條以名女人角度出發的新歷史寫作，透過宋慶齡、蔣宋美齡、鄧麗君等名女人，以邊緣的女性角色解構男性中心歷史，從孫中山革命到蔣介石政權到台灣的延續，間接梳理國民政府早期歷史。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延續平路對於台灣政治與歷史的關懷，但取材別具匠心。兩部長篇小說皆以兩條不同時空的敘事線作為互補，一為現下的台灣事件，以個人生命起伏情愛糾葛，暗示台灣面對的國際外交問題；另一條線則是歷史上的台灣，選擇以當代小說家較少涉及的大航海視角觀看台灣曾有的另一個可能，以最遠的歷史扣問最真實的當下。《東方之東》藉鄭氏父子的故事，台灣女子敏惠與大陸男子尚軍的對話，提出台灣究竟應該自立門戶還是歸屬中國的疑問，也思考台灣面向大陸與面向海洋的兩種選擇；《婆娑之島》裡揆一反覆嘆息台灣總是走不出被貽誤的命運，三百年後的美國官員「他」的故事呼應這悲傷的結論，更進一步反問：台灣為什麼總是讓自己陷入這樣的命運？平路筆下無意批判內政，也無意評價台灣執政者的好壞優劣，她著意引領的討論是：左右台灣命運的不僅是台灣執政者的決策，而是台灣在這樣的地理位置、歷史背景中，必然要面對的拉扯與無奈，不能迴避的未來現實。

不過，十七世紀的台灣是一個多種文明、價值尚未單一的島嶼，對於在七〇年代之後就在國際中始終走不出去的台灣來說，那個身處中西方文明交會的年代，無疑地開啟另一種想望與可能。兩書裡既然選擇開展的大航海時代，除了隱喻台灣自古至今受到多國力量的拉扯與牽引，有哀嘆台灣的命運，也有積

極之語，肯定台灣仍有面向大海的機會，仍有逃向自由之地的可能，甚至，能夠給多少中國人一個自由的嚮往。

若說國民政府多年密織的中國符碼，建構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土地的認同，這一波對於大航海時期台灣的再認識，無疑就是在認知的基礎上直接另闢國族的想像，讓台灣人民從眺望大陸，自處於大陸邊陲的角色，轉而面向海洋出發，作為航向海洋的起點，《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可以視為在「去中心」的多元書寫下的產物，對抗過去單一的「陸地」中心文學，放入多種族的對話，瓦解過去單一漢人文化中心的想法，且企圖將台灣的定位從大陸邊緣轉為海洋中心，建立另一個台灣的根源，將目光拉到大航海時期，以更曲折迂迴的方式挑戰原先大寫的國族歷史，以多元多國的視角取代千年一貫的中華文明，以駁雜的海洋網絡替換大中國的大陸思想。誠如陳芳明所說，「後現代的最終目標是在於主體的解構（deconstruction），而後殖民則在追求主體的重構（reconstruction）」²⁸⁸，平路透過《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重構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樣貌，傳遞島嶼向外的想像，正是最好的解釋。

另一方面，平路在《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書寫方向也是向內的回歸。早期作品《玉米田之死》、《郝大師傳奇》、《在巨星的年代》裡，主角對於自己是否屬於台灣或多或少都有著徬徨猶豫，然而，《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裡雖然故事發生地點不在台灣，敘事者甚至非台灣人，對台灣的關愛卻是篤定的，對台灣的擔憂也是直率的，平路消化大量史料與新聞資料，呈現在小說裡的樣貌，文史密度「輕盈」，但對於台灣命運的呼喊「沈重」，三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裡面對大海或者面對陸地的抉擇只是參照，平路更關心的是現實台灣的命運，透過台商夫妻的故事、凱德磊案，關注對台灣最重要的兩岸關係與美中台三邊關係，務實碰觸現實問題。

平路曾說：

我覺得我們這樣的人，問到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個人應該要讀書而涉世，讀書與寫字是為了自己的愉快，可是另一方面，你絕對是有涉世的成分。我們不只是要想到自己，還要想到比自己大一點的部分。我唯一單純的想法是，希望台灣會更好。²⁸⁹

²⁸⁸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39

²⁸⁹ 蔡淑華，〈以小說拼寫傳奇——平路專訪〉，收於平路，《何日君再來》，頁241

可見她的文學信念裡始終抱持著這樣的使命感，《婆娑之島》卷頭所寫：「追尋過去，紀念我們的時代，並惋惜島嶼一再陷入的夾縫」，為兩書中的書寫下了註解，說明她回望歷史，關心當下，以不同的角度呈現這難解的歷史困境。

《婆娑之島》借兩個西方男人的口，歌頌這個美麗多愁的島嶼，在揆一呈遞給巴達維亞的報告裡，他反反覆覆寫著：「福爾摩沙不是一處邊緣的領土，而是朝向未來的起航點」²⁹⁰，「我們這些外來者懂什麼呢？轉了一圈，留下些微的遺痕，島嶼終有它本身的壯闊生命！」²⁹¹，毋庸置疑，這些句子裡寫的正是平路對於台灣的深情，這兩部互相闡發補足的小說裡，充滿深情又理性的思考，是創作者致台灣的獻禮，是她用文字為台灣留下的珍貴印記。

三、研究的局限與展望

《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新歷史書寫觸及大航海時代、以及兩岸關係、台美中關係，引發筆者對於相關議題的好奇。近幾年來，關於大航海時代台灣歷史背景的台灣小說卓然可觀，包括朱和之的《鄭森》、《逐鹿之海》、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紀》，以及巴代《最後的女王》、《白鹿之愛》，輕小說《福爾摩沙血妖奇緣》²⁹²。朱和之、陳耀昌與巴代重視史料，強調線性敘事系統，似乎可以被歸類在「傳統歷史小說」，延續中國早年講史的書寫脈絡中，但其刻意調高荷蘭人、原住民音量的方式，又與中國傳統講史中的單純漢人中心截然不同。

朱和之的《逐鹿之海》雖沒有太多個人意識的呈現，但可以看見他意圖打破過往單一論述的大歷史，重構那一個紛雜的時代裡，各方勢力各有立場，無所謂對錯，只是為了各自的信念而奮鬥，每一個族群與集團內亦有不同的力量拉扯，無法被簡化成單一樣貌。在他這樣的安排裡，已然充滿不預設立場的包容與體諒。

陳耀昌的寫作裡，除了上述概念外，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他想傳遞族群融合的意圖，小說中總是安排荷漢通婚或是漢原混血的和解者，除了反映現實外，也暗示對於族群融合的渴望。

²⁹⁰ 平路，《婆娑之島》，頁 267

²⁹¹ 平路，《婆娑之島》，頁 266

²⁹² 施特朗，《福爾摩沙血妖奇緣》（台中：白象文化，2018 年 8 月）

涉及兩岸關係的文學創作有葉言都科幻小說〈我愛溫諾娜〉²⁹³，小說中島國「布龍島」與大國「加西亞」之間隔著「永豐海峽」遙遙相對，布龍國的面積三萬多平方公里，類似於臺灣的三萬六千多平方公里，「永豐海峽」平均寬度是一百五十公里，與臺灣海峽的現狀相近，小說內容提及「加西亞」在沿海一帶屯兵，意圖攻擊「布龍島」，搶奪其領土。這些設定都與臺灣所處的現實相似，不同之處在於小說中的兩個國家分處南北，而台灣與中國則是位處東西。對照小說創作所處的歷史背景，可以明顯讀到〈我愛溫諾娜〉中流露對兩岸的局勢的擔憂。

王國安認為兩岸關係是過去被六、七年級作家所避開的主題，將來可能會成為小說中最常見的主題。

周丹穎《名媛練習》中，台灣女子與中國商人的戀情，便存在著可類比於臺灣與中國大陸權力關係的情節；何獻瑞《跳吧》也有著主角赴大陸後，與經濟雄厚的友人及其朋友間的理念之爭。二書是新世代小說中少數以兩岸關係入題的小說。²⁹⁴

此外，石芳瑜《善男良女》²⁹⁵主要關心的是台灣的民主發展進程，其中部分段落透過台商眼光觀看兩岸互動，反映台灣人對於如何與中國相處的不同態度。

筆者原本希望能夠以平路的歷史政治書寫為經，以其他作家對於相同歷史主題的創作為緯，清楚標出《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座標，然而，閱讀與書寫的過程裡雖有豐沛的感受，卻未能有效整理脈絡，條理呈現，因而調整方向，更加專注於文本梳理，卻顯得較為狹隘、失之瑣碎，期待未來有更出色的研究者，完整清楚梳理平路政治歷史書寫脈絡，或者能橫向連結同樣以小說思考台灣現狀的作家作品，找出不同的研究路徑。

²⁹³ 葉言都，〈我愛溫諾娜〉，收於葉言都《海天龍戰》（台北：知識系統出版社，1987年），頁113-159

²⁹⁴ 王國安，《小說新力——台灣一九七〇後後新世代小說論》（台北：秀威經典，2016年），頁368

²⁹⁵ 石芳瑜，《善男良女》（台北：時報出版，2017年）

參考文獻

一、平路作品

- 平路，《玉米田之死》（台北：聯經出版，1985年）
- 平路，《是誰殺了XXX》（台北：圓神出版，1991年）
- 平路，《五印封箋》（台北，印刻出版，2004年）
- 平路、張系國合著，《捕諜人》（台北：洪範出版，1992年）
- 平路，《行道天涯》（台北：聯合文學，1995年）
- 平路，《紅塵五注》（台北市：聯合文學，1998年）
- 平路，《巫婆的七味湯》（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
- 平路，《百齡箋》（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
- 平路，《何日君再來》（台北：印刻，2002年）
- 平路，《禁書啟示錄》（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
- 平路，《香港已成往事》（台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平路，《蒙妮卡日記》（台北：聯經出版，2011年）
- 平路，《東方之東》（台北市：聯合文學，2011年）
- 平路，《婆娑之島》（台北市：商周，2012年）
- 平路，《黑水》（台北：聯經出版社，2015年）
- 平路，《坦露的心》（台北：時報文化，2017年）

二、中文專書（依姓氏筆畫）

-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1996年5月）
- 王國安，《小說新力——台灣一九七〇後後新世代小說論》（台北：秀威經典，2016年）
- 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石芳瑜，《善男良女》（台北：時報出版，2017年）
- 朱和之，《逐鹿之海：一六六一台灣之戰》（台北：印刻出版，2017年）
- 李展鵬，《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台北：遠足文化，2018年2月）

- 沈旭暉著，劉永艷、爾雅譯，《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繁體中文版，2015年）
- 何迪、徐家寧主編，《中美關係 200 年》（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
-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重印）
- 周慶華，《故事學》（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年）
- 范銘如，〈由愛出走——八、九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
-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2008年）
-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2015年7月）
- 查繼宏，《中國崛起需要大國心態》（台北：崧博出版，2018年）
- 莊雅仲，《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學，2013年）
- 徐苔玲、王志弘譯，克瑞茲威爾（Tim Cresswell）著，《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2006年）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3年）
- 黃自鴻，《小說空間與台灣都市文學》（台北：學生書局，2015年）
-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2011年二版）
-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
- 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台北：遠流，2012年）
- 楊勝博，《幻想蔓延——戰後臺灣科幻小說的空間敘事》（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5年3月）
- 盛寧，《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6年）
- 張進，《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張京媛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 湯錦台，《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台北：大雁文化，2011年11月初版）
-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6月）
-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1月）
-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的通用詞彙編》（台北市：麥田，2003年）
- 葉言都，〈我愛溫諾娜〉，《海天龍戰》（台北：知識系統出版社，1987年）

戴寶村，〈擺盪於海路之間的台灣歷史〉，《海洋台灣歷史論集》（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8年6月）

謝肇禎，《群慾亂舞：舞鶴小說中的性政治》（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

三、西文專書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出版，1999年）

加斯東·巴謝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年7月）

葉蓁（June Yip）著、黃宛瑜譯，《想望台灣：小說、電影、國家中的文化想像》（台北市：書林，2010年12月）

揆一（C.E.S）原著；林野文譯，《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將決戰始末記》（台北：前衛，2011年）

Susan Shirk 著，溫洽溢譯，《脆弱的強權》（台北：遠流，2008年）

野島剛著，張惠君譯，《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7月）

甘為霖英譯、李雄揮漢譯，翁佳音校訂，《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台北市：前衛，校訂新版，2017年9月）

康培莊（John F. Copper）著，劉泰廷、許劍虹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台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年9月）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陳信宏譯，《決戰熱蘭遮》（台北：時報出版，2017年12月）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施道安（Andrew Scobell）著，何大明譯，《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台北：左岸文化，2018年）

王飛凌（Fei-Ling Wan）著，王飛凌、劉驥譯，《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的本質》（新北市：八旗文化，2018年11月）

四、單篇文章

王德威，〈想像台灣的方法—平路論〉，《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2002年），頁91-112

王德威，〈叫父親，太沈重？〉，《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7年）

- 王德威，〈序論：想像台灣的方式〉，收於《禁書啟示錄》（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
- 沈乃慧，〈島嶼的憂鬱夢境：評析平路的後現代台灣意象〉，《花大中文學報》第1期（2006年12月）
- 范銘如，〈逃離與依違——《何日君再來》的空間、飲食與文化身份〉，《當代》215期（2005年7月），頁122-137
- 范銘如，〈歸去來——《東方之東》序〉，《東方之東》，頁7
- 林耀德，〈孫中山／波利瓦 VS. 宋慶齡／平路——評《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第11卷第6期（1995年4月），頁161-162
- 南方朔，〈重塑革命者的血肉和心情——從馬奎茲《迷宮中的將軍》到平路的《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第11卷第6期（1995年4月），頁154-157
- 郝譽翔，〈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論平路小說之「謎」〉，《東華人文學報》第四期（2002年7月），頁163-180
- 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131-150
- 陳芳明，〈傅柯與新歷史主義〉，《文訊》雜誌344期（2014年6月），頁8
- 陳芳明，〈生命的繁華與浮華〉，《烈愛真華》（台北：聯經出版，2002年）
- 陳正芳，〈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形象建構〉，收於《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跨國流動與地方感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暨南大學，2015年9月）
- 陳耀昌，〈從《婆娑之島》一窺「平路式幽默」〉，收錄於平路《婆娑之島》（台北市：商周，2012年9月）
- 陳建忠，〈歷史敘事與想像（不）共同體：論兩岸「新歷史小說」的敘事策略與批判話語〉，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第五屆東南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2006年10月）
- 張雪姦，〈逃亡密碼：平路寫解構遊戲〉，《當代華文女作家論》（台北市：新銳文創，2013年5月）
- 梅家玲，〈「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〇、九〇年代台灣小說論》（台北：麥田出版，2004年），頁227-265
- 楊照，〈歷史的聖潔門背後——評平路長篇小說《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第11卷第6期（1995年4月），頁158-160

- 童振源、洪家科，〈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1988-2008 年〉（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2009 年 1 月）
- 劉亮雅，〈平路《百齡箋》中的性別、書寫和記憶〉，《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台北：九歌，2001 年），頁 197-227
- 簡瑛瑛、吳桂枝，〈華語語系女性歷史書寫與跨文化再現：從施叔青《台灣三部曲》到平路《婆娑之島》〉，《台灣學誌》第 12 期（2015 年 10 月），頁 1-15

四、學位論文

- 王鈺婷，《身體、性別、政治與歷史——以《行道天涯》和《自傳的小說》為考察對象》（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 王國安，《台灣現代小說的發展——從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做文本觀察》（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 李芳璇，《平路女性書寫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2010 年）
- 林秀蘭，《論李昂、平路與朱天心的記憶書寫》（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 林麗如，《歷史與記憶——舞鶴小說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 林欣筠，《論平路、李昂、虹影新歷史小說的書寫策略》（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 林韻芳，《平路小說的台灣歷史想像——以《婆娑之島》為主》（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2015 年）
- 洪英雪，《文學、歷史、政治與性別——二二八小說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6 年 12 月）
- 吳淑芳，《文學想像與歷史的重建——平路小說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 吳培毓，《平路小說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論文，2006 年）
- 唐毓麗，《平路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 徐仁鴻，《平路家國書寫的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 黃清順，《臺灣小說的後設之路——「後設小說」的理論建構與在臺發展》（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 黃柏維，《從《行道天涯》到《何日君再來》——平路小說的新歷史書寫》（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 郭蔚真，《平路小說女性書寫之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陳韋賓，《平路小說國族性別的權力解構研究—兼及其書寫形式》（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陳芹漪，《平路、李昂小說中的「政治女性」書寫研究》（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 張襄君，《從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平路小說中的空間》（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4年）
- 楊翠，《鄉土與記憶—七〇年代以來台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 楊雅涵，《80年代以降女作家在小說中的飲食書寫》（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6月）
- 蔡淑芬，《解嚴前後台灣女性作家的吶喊與救贖——以郭良蕙、聶華苓、李昂、平路作品為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
- 鄧美華，《平路小說對人生困境的省思——從自身經驗出發》（台北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五、報紙／電子媒體／訪談

- 平路，〈在父權的邊緣翻轉——「行道天涯」的女性情慾〉，《中國時報》第39版（1995年3月17日）
- 平路，〈電音三太子時代的鄉愁〉，《聯合報》（2011年05月27日），轉載自平路個人部落格 <http://mypaper.pchome.com.tw/lupingbox/post/1322233493>
- 盛浩偉，〈想像過去，創生未來——專訪平路〉，《文訊雜誌》327期（2013年1月）
- 蔡淑樺採訪整理，〈以小說拼寫傳奇——平路專訪〉，收錄於《何日君再來》，（台北：印刻，2002年）
- 葉佳怡〈你的未來包括所有過去：平路談新作《婆娑之島》〉，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619195>
-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台北市：中研院臺史所，2010年10月）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aparc.fsi.stanford.edu/people/Don_Keyser
https://aparc.fsi.stanford.edu/people/Don_Keyser

美國法院判決備忘錄 Memorandum in support of motion to Find Defendant in Material Breach of
Aggrement and to Release the Government From Its Plea Obligation .
<https://fas.org/irp/ops/ci/keyser070506.pdf>

